



天 扰

石青译

Atmospheric Disturbances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2009

21世纪
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
2009

天 扰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他在治疗患者的时候，自己的精神也发生了困惑和错乱，对自己和周围人的身份产生了无法摆脱的怀疑。小说扑朔迷离，使读者如入迷宫之中，深刻揭示了人类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一部分人群在精神上特有的荒诞感。

ISBN 978-7-02-007773-1



定价：17.00元 9 787020 077731 >

天 扰

Atmospheric Disturbances

[加拿大] 丽芙卡·戈臣 著

石 青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5571

Rivka Galchen
Atmospheric Disturbances

© 2008 by Rivka Galche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扰/(加拿大)戈臣著;石青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07773-1

I. 天… II. ①戈…②石…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5343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韩志慧 责任印制:王景林

天 扰
〔加拿大〕戈臣 著
石青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7 千字 开本 880×116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7773-1 定价 1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

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严谨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自 2002 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 2009 年,“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八届,共有十七个国家的五十一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 年度法国获奖作品的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荣获了 2008 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奖项。

自 2008 年起,我们开始与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政府合作,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进一步开发“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文化价值,在继续组织“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与出版的基础上,优中选优,增设了“微山湖奖”,同时组织各种文学活动,以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奖项。另外,自 2008 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我们相信,在新的平台上,“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并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海平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程朝翔	路英勇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马爱农 欧阳韬

英语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任

程朝翔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守仁 黄梅 韩加明 韩敏中 程朝翔

“微山湖奖(2009)”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陈众议 聂震宁 程大志 路英勇 潘凯雄

秘书长

刘 乔

《天扰》是一部既诙谐又严酷的小说,通过探讨一个精神病医生神智混乱,无法分辨自己和亲人身份的心灵历程,揭示了人类精神和人类关系的神秘莫测。作者丽芙卡·戈臣直指人的心灵困惑,编织出一个个谜,其中交织着爱、渴望、感悟和复原等深刻主题。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As a novel both playful and relentless, *Atmospheric Disturbances* makes a philosophical and comical exploration of how a psychiatrist suddenly fails to distinguish his wife as well as his own identity. It depicts the mysterious nature of human mind and relationships. Rivka Galchen really has a knack for designing psychological puzzles intertwined with love, longing, resilience and realization.

**Screening Committee of the Annual
Best Foreign Novels, 21st Century**

译者前言

“去年十二月，一个女人走进我的公寓，她看上去和我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故事由此展开。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资深的精神病医生和他的病人，年长的丈夫和年轻的妻子，多普勒效应和感觉失真，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美丽的冰川，49 位量子教父和风寒指数……等等等等。许多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情，许多甚为陌生的气象学和精神病学知识同时出现在这部小说里。

美国女作家丽芙卡·戈臣出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后来随父母举家迁到美国，一直住在俄克拉何马的诺曼。她的父亲是俄克拉何马大学的气象学教授，母亲是计算机程序员，在美国国家强风暴实验室工作。她是在一个环境宽松的家庭里自由自在地长大的，她的父母从不过问她的学校功课，任由她看电视，也不给她规定上床睡觉的时间，但是却像对待大人一样和她商量家里的大事。她后来能够在纽约西奈山医学院专攻精神病学，并在二〇〇三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应该与她的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天扰》是丽芙卡·戈臣的第一部小说。她将她熟悉的所有元素都放进了这部小说里：精神病学的知识，来自父母的气象学知识。为了实现父亲多年的心愿，她甚至把父亲的名字茨韦·戈臣——小说里那位神秘莫测的气象学家茨韦·戈臣——安排进小说里。

《天扰》希冀以复杂多变的天象来阐释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爱情。作者经由小说里的精神病患者哈维的口说出“我发现许多事情的中心问题就是爱”。小说里的49位量子教父就是因为被“爱情灼伤了”，才去操控天气。小说的男主人公“我”也是因为爱情生活中疑神疑鬼，才生出后来的一连串奇遇。

丽芙卡·戈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呢？她曾经说过，“促使我写这部小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到了丹尼尔·史瑞伯在一九〇〇年写的《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的影响。史瑞伯是一个有很高教养的德国地方法院首席法官，他因出现幻想而导致精神崩溃，几次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他以这段不幸的经历为根据写就的回忆录被广泛认为是出自精神病人之手的最清楚最详尽的文字。据说，弗洛伊德读了他的回忆录后，说了这样的话，‘这个了不起的史瑞伯真应该成为精神病学教授和精神病医院的主管。’

“在回忆录里，史瑞伯解释，他是如何开始相信这个世界是个庞大的神经结构，一个掠夺成性的神主宰了它，而且‘在神的国土上发生的一次危机’使他成为人类唯一的幸存者，独自生活在幻想和鬼魅之中。史瑞伯认为，这个世界可以通过他去势变性为女人而获得解救。他的叙述既好笑，又可怕，更令人心碎。

“我被史瑞伯的回忆录所感动，我想，这个男人觉得自己被

所有他熟悉的真实的事情抛弃了，他靠着撰写这部清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回忆录来对付这种可怕的感觉。他的回忆录如此引人入胜，部分原因是他在回忆录里一直都承认他的信念是很奇怪的，甚至承认这些信念也许是错的。回忆录里通篇充满了不可名状的悲哀和茫然。当你阅读这部回忆录时，你开始理解了史瑞伯的幻想，我们自己也有许许多多的幻想，他的幻想就如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的真实的有趣而生动的作品。我很喜欢这么一个想法，那就是用你所拥有的非常特殊的方式来表明你是错的。”

《天扰》是一部将虚构的故事和科学知识组合在一起的小说，如此写书丽芙卡·戈臣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写书的人有一颗智慧的大脑，能读懂它的看书人当然应该也是个有智慧的人。

石 青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于英国伦敦

第一部分

1. 一个暴风雨不太猛烈的夜晚

去年十二月，一个女人走进我的公寓，她看上去和我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这个女人很自然地将房门在身后关上，她手里拎着一个特大号的淡蓝色手提包——瑞玛的手提包，手提包里有一只黄褐色的小狗崽。我不认识这只小狗。真的瑞玛是不会在人行道上和狗儿们打招呼的，她压根儿不喜欢狗。空气中弥漫着干草清新凉爽的气味，这是瑞玛常用的洗发香波的味道。我眯起眼睛看着面前这个女人，看着这只小狗，我心里清楚，事情有点不对劲儿，非常不对劲儿。

她，这个女人，可能是个爱狗之人，俯下身去脱鞋。她的头发稍稍地遮住了脸庞，偏头疼影响了我的视力，但是我依然能看到：她像瑞玛那样拉开皮靴上的拉链；像瑞玛那样脱去同样缀着特大的深灰色扣子的淡蓝色大衣；像瑞玛那样把染成金黄色的玉米穗般的头发塞到耳朵后面；像瑞玛那样留着剪成一条横线

的前刘海,就和那些穿着土著服装的洋娃娃的前刘海一样。件件桩桩都是一样的,但这不是瑞玛。这只是一种感觉,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就像一场梦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有时候会低声地跟自己说,“我在做梦”。记得有一次从梦中醒来,在那个梦里,我的母亲——已经死了三十三年——坐在我的厨房桌子旁,一边喝茶一边看报纸,她看的那一页报纸的反面有一行大字标题“人是错的,名字是对的,谋杀案审判裁定”。我想要看看那篇字体比较小的文章,可是我母亲在不停地翻弄着报纸,闹出的声音就像一群鸽子突然飞起来。当我醒来后,我在屋子里上上下下地搜寻那份报纸,还到外面的垃圾箱里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

“哟!”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轻轻地说,似乎注意到了昏暗的灯光。“对不起。”她模仿瑞玛的阿根廷口音,惟妙惟肖。“偏头疼犯了?”她把那只瘦瘦的黄褐色小狗崽压在胸口上。小狗打了个哆嗦。

我举起一根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安静,也许我把肉体上的痛苦演得太过火了,但这个手势是真的,因为我害怕,我还不能很清楚地把话说出来。

“待一会儿,”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似乎是在跟她自己低声地说话,也许是在跟那狗说话,也许是在跟我说话,“你可以见见你这个温柔的新朋友。”然后,她开始惟妙惟肖地模仿瑞玛那种节奏稍微有点零乱的脚步,穿过房间,从我身边走过去,走进厨房。我听见她把开水壶放到炉子上。

“你看起来很奇怪,”我发现自己在对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大声嚷嚷。

“是啊，一只狗，”她在厨房里用单调的声音说道，依然在完美无瑕地复制瑞玛的外国人语调。而且似乎已经忘掉了我的偏头疼，她大声呵斥，一直在不停地说话，也许说的是那狗，也许不是，我无法完全集中注意力。她说了唐人街的什么事情，还有一个垂死的人。我看不见她，只听见她的说话声音，抑扬顿挫的，这使我觉得她真的是我的妻子。

过了一会儿，这个奇怪的冒名顶替者从厨房里出来，亲吻我的额头，我的脸红了。这个年轻的女人亲热地趴在我的身上——真正的瑞玛会随时走进来，看见我们俩这个样子吗？

“瑞玛应该在一个小时以前就到家的，”我说。

“是啊，”她说，高深莫测。

“你带回来一条狗，”我说，尽量不要流露出责备的口气。

“我希望你喜欢它，等你感觉好一点儿了，见见它，我把它放好——”

“我觉得，”我突然说，被我自己说的话吓了一跳，“你不是瑞玛。”

“你还在生我的气，利奥？”她问。

“没有，”我说，转过头去，把脸藏在沙发的靠垫里。“对不起，”我对着靠垫质地紧密的羊毛罩子咕哝着。

她从我身边走开。炉子上烧的水快要开了——我们家开水壶颤动着发出的上扬的声调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我伸出手拿起电话，拨打瑞玛的手机。从手提包里传出了沉闷的铃声，这个铃声显然没有和我手中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形成立体声。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抱着那狗从厨房里出来，走进起居室侧耳细听，这时，水壶吹起了口哨，确切地讲，是外面的警报器在哀号。

她冲我笑了笑。

那时候,我,五十一岁,男性,精神病医生,没有住院治疗的经历,没有相关的病史,社会史,或家族史。

*

*

*

待那冒名顶替瑞玛的女人睡熟以后(那狗睡在她的怀里,她们的呼吸是同步的),我发现自己在翻瑞玛那个淡蓝色的手提包,包里有一点点狗的气味。不过,当我注意到我正在做的事情——打开信用卡的收据,闻闻钱包里的味道,舔掉半块口香糖上的粉末——时,我觉得自己像是老电影里演的那种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我似乎认为这个女人的出现意味着瑞玛在骗我,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好像我盼着在她的手提包里找到剧院的戏票,或者找到一个刻着姓氏首字母的烟盒,或者一瓶砒霜。就因为瑞玛比我小很多,就因为我不一定时时刻刻都知道她在哪里,或者就因为她用西班牙语打电话时,我不一定知道她到底说的是什么是,电话里的那些人也许是我压根儿不认识的,但出于尊重,我从来不问。正因为我们关系中的这些非常正常的方面,要说她在过去,或者现在,爱上了几个,或者很多其他的人,这是不大可能的,根本不可能。然而,即便如此,这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为什么夫妻间的不忠会导致失踪呢?或者会导致出现假冒者呢?会出现狗呢?

2. 清晨两点

真的瑞玛还没有回家,我接到了一个传呼。一个身份不明

的病人——可能是我的病人——出现在精神科的急诊室。我没有打电话过去，没有再好好地考虑考虑，也没有进一步地了解情况，就决定立即前往医院。

很显然，这像是可以找到我的病人的一条线索。

我给正在酣睡中的女人留了一张纸条，尽管我不是非常确定这张纸条到底是写给谁的，像是写给真瑞玛的，又像是写给假瑞玛的。我只是要让她知道，因为一个紧急情况，我被叫到医院去了。就算事情不全是这样的，可是留一张纸条，哪怕只是为一个陌生人留下纸条——别管纸条上写的是是什么——这么做显然是正确的，考虑周全的，有责任心的。

我带上瑞玛的手提包——想起她的时候，可以拿它充当安慰品——离开了家，去查明医院里的那个身份不明的家伙。我的一个病人，哈维，他最近失踪了。瑞玛责怪我没有尽力去找他，也许我马上就会找到他了。

* * *

当我到达精神科急诊室的时候，那里很安静，一个夜班护士无精打采地用一只手托住头，在计算机上玩牌。他，夜班护士，一个俊朗的大男孩，非常瘦，皮肤几乎是透明的。一看见浮现在他额头上的血管，我就莫名其妙地想起了瑞玛脚面上的血管。我不认识这个人。我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地做着自我介绍，没有威严，目的含糊。

“你迟到了，”他说，打断了我的话，甚至都没有把脸转过来看看我。

过了一会儿，我想他说的是对的，我是迟到了。但是，紧接

着我想起来了,现在根本不是我的上班时间。为了穷追那条非常模糊的线索,我不顾资深医师的身份,来得太早了,其实那条线索完全可以等到天亮以后来处理。所以,我不可能是迟到了。大概他把我错认为是别的什么人——一个年纪比较轻,级别比较低,还得上夜班的医生。

“那是谁?”我问,朝单向观察镜的另一边点点头。在那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坐在轮椅上睡着了,腰部以下盖着医院的被单。

他不是我的病人,不是哈维。

那个表面上看起来举止得体的护士还在计算机上玩他的游戏,依然没有转过脸来和我进行目光接触,他开始快速地嘟哝起来,更多的是说给他自己听,而不是说给我听。

“没有确诊。很可能是精神严重变态。他在地铁的火车里吐口水,咆哮,谈论上帝,所以他们把他送到这里来。给他服了安度,现在睡着了,否则他会一直冲着我们嚷嚷,说我们偷了他的腿。我会把他留给上早班的医生。还得有一段时间,药效才会退去。”

然后,那护士转过头来,瞥了我一眼,瞪着——的确是瞪着——我。他的表情让我觉得好像我有病,好像要死了。

那先前没有一丝皱纹的额头皱了起来,现在说话说得比刚才清楚了一点,他问我,“您是瑞玛的丈夫吗?”

我在将工作人员和病人分隔开的单向观察镜的反光里依稀看到了自己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我注意到——想起来——我的手里拿着瑞玛的淡蓝色手提包。“是的,”我说,挺起了背,“我是瑞玛的丈夫。”

他突然放声大笑。

但是,这里并没有可以让他大笑的原因啊。

他前额上的那根血管——和瑞玛脚面上的血管一样——在他干干净净的奶油色的皮肤上跳动。“我不知道您上夜班,”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

现在我应该解释一下,自打我在医院里给瑞玛找了份翻译的工作以后,我开始明白了——从我和一些不认识的人的各种各样的互动中——瑞玛的许多同事非常喜欢她。她经常以一种非常私人的、意味深长的方式,成功地给人们留下了她爱他们的印象。我必须承认,我发现和她的那些可怜的追求者们周旋是相当讨厌的,那些人以为他们在她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比他们实际上扮演的要重要得多。我的意思是说,她几乎不跟我提起那些人,而那些人都自以为他们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夜班护士——显然是瑞玛的那些“士兵”中的一员——不是那么明显地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那么我也许会考虑,他是否能帮助我,我是否应该向他打听一些事情,他是否也许知道瑞玛失踪的背后,以及那个冒名顶替瑞玛的女人背后的一些情况,但是我可以猜到——我只是可以猜到——从这个人这里是打听不出什么来的。

“我们大概是拿走了他的腿,”我说。夜班护士的桌上放着病人的病历,摊开着,我瞥了一眼,注意到上面有高血糖的记录。

“什么?”那护士问,依然盯着我看,好像没有听见我说的话。

“我是说,这事挺可笑的,严格地说,大概医生的确是拿走了那个可怜的家伙的腿,”我解释道,说话的音量也许有一点点提高。“我们说‘截肢’,他说‘偷’,”在自我控制下,我把声音放低

了。“不过,这不是精神严重变态。这只是沟通上有问题。”

额头上的血管不跳了,那护士耸了耸肩。“明白。嗯,完全没有嘲笑的意思。”他又掉过头去,面向他的计算机。

“你不应该因为标签上写着‘精神严重变态’就粗心大意,”我说。就因为一个人穿了一双泡沫塑料拖鞋,我几乎是在给他的后背授课。不过,当我觉得一股怒火正从心里升起来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画面,是被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带回家来的那只神情紧张的小狗崽,小狗崽那吃惊的表情,于是我想起来,我还有其他烦心的事要关注。

就算这个身份不明的病人不是我的病人,不是哈维——既然我已经在医院里了,那么我认为就应该看一看哈维的病历,也许会从那里找到哈维可能去了哪里的线索。看到我在追踪这件神秘的事情,瑞玛会很高兴的。我有点相信,只要我在医院里待的时间够久,那么当我回到家的时候,瑞玛就已经在家里了,或许与那个冒名顶替她的女人打出了胜负,就像电子游戏里那样。瑞玛会战胜另一个瑞玛,然后我和瑞玛一起联手(在下一关,在另一个世界里)寻找哈维。

不管怎么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在后面的办公室,”我宣布。我承认,有一点儿怪怪的感觉。早先已经退去的头疼出乎意料地,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又开始了。

我从计算机里调出哈维过去的记录,仔细查看,尽管我无法确定寻找的方向。但是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与瑞玛失踪有关的线索,也许是个虚假的线索。那就是:我上医学院时的一个导师,最近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一直以来他都是个

鉴赏女人的“行家”——他的这个身份很是令人恼火,事实上,他曾经从我这里“偷走”了一个女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欣赏佩服他,并且急于让他见到我的瑞玛。看着他与瑞玛谈笑风生,我硬起心肠来对抗不可避免的嫉妒。当瑞玛穿上了一件合身的、既庄重又迷人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女秘书式样的连衣裙时,我保持了沉默。不过我所有的心理准备都是徒劳的。很奇怪,我这位导师对瑞玛似乎不是太着迷。他殷勤而有礼貌地对待她,仅此而已。这很不寻常。有一个细节,他拿选举开了个玩笑,瑞玛没听懂。也许,有那么一会儿,瑞玛在我的眼里失去了魅力。仿佛她不是我的瑞玛。我的瑞玛有本事让每个人都爱上她。比如:那个夜班护士。

不过,那时候的瑞玛的确是我的瑞玛——对于这一点,我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3. 也许是有重大关联的事情

我在前面提到了我的病人哈维,但是我没有好好地讲述他,讲述那个奇怪的巧合。他是在瑞玛失踪前两天人间蒸发的,或者说,他的消失和瑞玛的失踪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实际上,极可能不是“巧合”。回想起来,我相信,从我对一出错误的轻喜剧做出错误的判断开始,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

a. 皇家气象学会特工

两年以前,我第一次见到哈维时,他二十六岁,患有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碍,已经有九年了。他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有十

一个不同的精神病医生,两个德国的心理医生,三个针灸师,一个巫婆,以及一个生活方式辅导员对他进行过连续不间断的治疗,然而从来没有(据他母亲说)成功过。另外,哈维有酗酒的历史,对苦艾酒情有独钟,这使他身上具有一种颓废的、玩世不恭的、高贵的气质。

哈维的母亲在读了我写的一篇关于备受心理学界尊崇的上世纪左翼精神分析学家 R. D. 兰恩^① 的肤浅文章后,打电话给我。在我与她漫无边际的长谈中——实际上,我是被她硬按在纽约曼哈顿上东城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咖啡店里,她坚持认为那家的咖啡是“上乘”的——我很快就明白了,她完全误读了我的文章。(比如,我在文章中引用了兰恩的“本体论的不可靠”和“萨满教的流动”,她将此理解为我是赞成兰恩而不是嘲笑他。)不过我并没有想去纠正她的误读,那么做是很粗鲁的,而且我发现她儿子的病例很有趣。我可以想像出来,这个故事会把瑞玛逗笑的。还有,想到要告诉瑞玛,这个女人是在读了我的一篇文章后来找我的,也让我很开心。

*

*

*

哈维的主要问题——有些人也许会说,是他“与现实的大众观点的冲突”——来源于一个执着的不可思议的信念:他坚信他具有控制天气现象的特殊技能,因此他是作为一名特工,受雇于皇家气象学会的。现实的大众观点肯定了这个学会的确是存在

^① R. D. 兰恩(1927—1989),英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提出精神分裂的病因理论。

的(在那时,哈维能这么说,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据哈维说,皇家气象学会致力于维护天气的难以预料和随心所欲的要素。

“我想的刚好相反,”我说,这是我们第一次交谈。

“我们在这里说的每句话都是保密的吗?”哈维问道。

我让他放宽心。

他解释:与皇家气象学会对抗的是一个被称为“49 位量子教父”的地下组织(现实的大众观点不能确认这个组织的存在)。这 49 位量子教父在无数个并行运行的世界里,进行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气象实验。这个组织通过对农作物前景的投资来养活自己。农作物的前景,实际上取决于 49 位量子教父对天气的策划。

我要求哈维阐明什么是并行运行的世界。

“好吧。嗯,教父们可以在可能存在的世界之间移动,”他说。“就好比,他们可以去的那个世界,是同这个世界一样的,只不过庞贝城喷出熔岩的时间要比这个世界晚十年。可变的量被改变了。就好比,或许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就被一辆专用卡车撞倒了,而且我们此刻是不会在这里聊天的。”

大概我的催促使他兴奋起来。

他继续说,“在一个世界里,俄克拉何马的春天是多雨的,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俄克拉何马的春天却是长期干旱。”然而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自己正在试图减缓攻击。“通常各个世界之间始终是互相隔离的,但是为了把数据和能量从一个世界运到另一个世界,49 位量子教父开拓了那里的切线。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绘制那些切线的——我不知道。当然,要知道,

了解天气意味着赢得战争，所有对天气的研究其实是用另一种方式研究战争。”

我真的不懂这个，可是后来我阅读了有关的书籍。有人也许会说，他是夸大其词，但他还是——甚至根据大众观点——提出了一个程度的问题，不是徒有其名。

“不过，”哈维说，“我不打算增加我的工作量。我只是个最小的蝴蝶。我主要是处理中尺度天气现象。我主要专攻常态的地区性风模式。”

*

*

*

皇家气象学会通过《纽约邮报》第六版给哈维下达命令。这不是说他在报上看到了命令的原文或图像，那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是他看得懂专门用密码为他编写的命令。比如，前些日子有关珍妮弗·洛佩兹^① 离婚的传闻就把哈维派到了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区一带。可是，这些命令经常需要哈维不辞而别，到全国各地去执行任务。不过，要不了几天哈维的母亲就会知道他的行踪，那时候她会接到来自远方的一个急诊室或警察局的电话。哈维回到家，身上常常带着他无法解释的伤口和青紫的淤痕，甚至偶尔还会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的迹象，曾经有一次还伴有小脑功能障碍。

每当问起他的失踪时，哈维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总是说他“在大气压力下艰苦地工作”。

实际上，这些可疑的失踪危及了他的生命安全。

^① 珍妮弗·洛佩兹(1970—)，美国当红的女歌星兼影星。

“打从和你握手的那一刻起，”盛装打扮的哈维的母亲泪眼汪汪地对我说，“我就断定你和其他那些人不同，你是上乘的，你就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那一个人。”在我第一次与她的儿子见面后，她这么说。

嗨，仔细阅读着哈维的病历，我发现过去砸在他身上的那些药物都是徒劳的，这是意料之中的。就我所能查明的，除了他提到的那些想法以外，他没有幻听，没有幻视觉，没有明显的情绪变化，所以很难弄清楚应该如何对症下药。

在和哈维接下来的几次见面中，我试着对他做了一些现实性检验。我问他，他是否还见过其他为皇家气象学会工作的特工。我问他，他是如何获得操控天气的特殊能力的。

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就是皇家气象学会的首席特工。他说，他的父亲曾经单枪匹马地将一场意欲毁掉整个芒果收成的、范围较大的飓风挡在了墨西哥湾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哈维对我解释，49 位量子教父拐走他的父亲，把他藏在一个并行世界里的原因。

我决定不再继续跟他纠缠他父亲的事情。

我又做了几次艰难的尝试，慢慢地向哈维提出我的一些疑虑，这些疑虑是在了解了他的世界之后产生出来的——提出这样的疑虑是幻想症心理干预治疗的基础，也是回到现实的大众观点的途径。可是我失败了，不过我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众所周知，现实性检验对于精神分裂型是没有用的，而且如果做得太过分，只会进一步导致病人的孤立，深化他的那种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理解现实的信念。到那时候，向下的旋流就开始了。

在我第五次与哈维交谈后的第二天,他又不见了踪影。九天以后,在奥马哈的一家医院里找到了他。那里刚下过冰雹。

b. 最初的欺骗

我应该解释一下撒谎这件事。

是瑞玛建议我对哈维撒谎的。我自己没有想到这个主意。“你撒谎,”她强调,“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有好处。所以,这是个不违背道德的谎言。这样不好吗?你不是告诉过我,他们常常把精神病人的头按到水底下,让他们背诵《圣经》中的第五十一篇赞美歌吗?我说的这种治疗方法要比那种方法好得多。这是个善意的小小的谎言。”

接着,瑞玛干劲十足地当场策划起来(这是个绝佳的例证,在那个冒名顶替瑞玛的女人身上没有瑞玛的这种劲头)。她提出了一个计划,并加以详细说明。在这个计划里,我假装——就像哈维——是皇家气象学会的特工。但我——不像哈维——是个级别较高的特工。我这个级别较高的特工和另一个级别更高的特工保持联系。“精神病人是非常看重排名的,”她颇具权威性地宣布。

“是的,哈维的母亲也看重排名,”我加了一句,没有鼓励她的意思。

瑞玛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我会给你打电话,打到你的办公室,你接电话,非常严肃地听着,然后你向哈维传达命令,你要假装这些命令来自于一个资深的气象学家,那就是我。”瑞玛格外喜欢她是个资深的气象学家这一细节。

命令的主要内容是,哈维要在离他家很近的地点“在大气压

力下艰苦地工作”。在街角,在公园,在纽约市这个比较大的郊区里,处理非常重要的中尺度天气现象。

我记得,瑞玛一边吃着金橘一边给我解释这个计划。金橘上还挂着叶子,看起来特别鲜活。当听着瑞玛精心编织的谎言时,我的心里敲响了警钟。不过,在我的一生中,似乎总是有很多的警钟冲着我敲响,以至于几乎不可能说清楚一个特别的警钟所发出的信号是什么意思,也许是撤销警告,也许是无论如何都应该对警钟所发出的警告多加留意。那么,现在这个警钟很可能只是警告金橘的颜色——大概是某种返祖现象,对现在已经废弃不用的毒药发出了警告——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这么做不光是不道德的,”我对瑞玛说,“而且你的主意是不会奏效的。凭什么会奏效?如果哈维发现了这是个谎言,那么一切都完了。医患之间的关系:完蛋。”我的职业生涯可能也就此完蛋了,我没有说出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僵持了很久,我对这个计划的疑虑反倒促使瑞玛干得更起劲。

“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这么做是合乎道德的,”我对她说,仿佛我们俩是和谐一致的。“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个‘疗法’是有效的。但是,作为谎言而言,它依然存在着被发现、被揭露的可能性。我的每一天都要伴随着恐惧。我不能过那样的日子。”

“哦。”瑞玛微微地、不被察觉地耸了耸肩。“可是生活从来就是这样的,不是吗?”

瑞玛经常发表一些大胆的、夸张的、似乎又是很真诚的言论。不过,她一直都很神经质,这是千真万确的。她会花上一分

多钟的时间,将碰巧在她手上的任何一张纸片折叠成手风琴的风箱样子;在电影院里,经常还没找到座位,她就已经把票撕碎了。然而,她的焦虑有时近乎是精神严重变态。比如,有一次,我就病态的哀痛发表了一篇论文。作为对这篇论文的反应,我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信中说,我不知道丧失亲人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的,他——写信的人——可以教教我。对,我承认那封信里的措辞要比我说的更为激烈,但这也显示出写信人的思维相当紊乱。相信这样一个思维紊乱的人会采取伤害他人的行动,是很傻的,所以没什么好害怕的。我把信带回家给瑞玛看,主要是因为信里有几幅让人费解的,却又美丽异常的插图。没有回信的地址,可是我认为查找出给我写信的人也许是件有点浪漫的事情。我猜想,也许我可以找到一个像亨利·达戈^①那样的人。可是瑞玛说,如果这封信没有让我感到担心,那我就应该被关进庇护所。她开始准备搬家。尽管(1)这封信是寄到杂志社的,而不是直接寄给我的;(2)我们家的地址没有列在电话簿里;(3)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我们住在哪里,但瑞玛还是给经纪人打了电话。我认为,从书面恐吓到最后真正付诸行动,这方面的统计数字看来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我决定不引用这个统计数字来安抚瑞玛。但是,我告诉瑞玛,她对此事的反应是荒唐可笑的。我说,她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别的事情。我断定她有内源性差别婚姻症状。她说,她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婚姻,什么是内源性。她说我傲慢狂妄,说我这个人很可怕,还说了其他一些话。我喜欢

① 亨利·达戈(Henry Darger, 1892—1973),生前是个清洁工,他的大量的超现实主义画作死后才为人所知。

她的这些指责,并且发现她的指责挺讨人喜欢的,而且我认为她说的是对的。瑞玛哭了,好几天不理睬我。晚上,她躺在床上发愁。

但是,她能那么容易地就猜想到一个将我们俩分隔开的大灾难,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大灾难的确是发生了。

而对于向病人撒谎,由此给个人的事业和私人生活所带来的危险,她却视而不见。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不能撒谎,”我说。

“你选择失败,”她说。“在我的邻居中,我们给像你这样的人起了个名字:荷兰芹。”

最后——显然——我决定撒谎。做出这个决定后,瑞玛高兴极了,我们度过了一段甜蜜温暖的时光,就像是中世纪暖期那么温暖,在那个时代,酿酒的葡萄可以在比今天更靠北的三百英里处生长。那么,在那个时候我有没有想到这个计划会把我们卷进去?没有。我只考虑瑞玛。

c. 首次亮相

我同意瑞玛的计划以后,瑞玛建议我在皇家气象学会里找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名字,这是为了防止哈维查找我的上级的名字,也许他对学会里的成员已经很熟悉了。她说,我要强调我——像哈维一样——是个特工,所以我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学会成员的名单里。

“不错,”我说。“如果我们现在讲的是特工,那么就没必要把某个人的真实姓名扯进来。”

“真名字对欺骗取得成功有好处,”她坚持。

就这么决定了。

遵循瑞玛的建议,我搞到了一份皇家气象学会成员的名单。我任性地,或者我认为是任性地,选择了茨韦·戈-臣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好像是那种既不同寻常又文雅的名字,同时,不知道为什么,这名字显得既有权威性又很单纯。我差一点选了一个叫做凯尔文·德罗基米尔的名字,这个名字也挺有吸引力,有一种另类的美感。但是,我最终敲定了茨韦·戈-臣,因为我记得开氏温标^①是温度的标度,这让凯尔文·德罗基米尔这个名字看起来像是捏造出来的,尽管这是一个真正的名字。

d. 最初的担心(我的差别婚姻)

在尝试瑞玛的骗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几个简短的梦。在一个梦里,我无法让开水壶停止发出哨声;在另一个梦里,哈维是一只信鸽,待在鸽棚里(虽然实际上我不知道什么是鸽棚,但是在梦里我却知道);在第三个梦里,我穿了一条黄色的裤子,难看极了;在最后一个梦里,我在街上散步——我从高处看着我自己,好像是站在一幢大厦的太平梯上——我知道大家都讨厌我。

闻到瑞玛头发上清新凉爽的干草香味,我醒了。我把她的一缕头发放进嘴里。我努力安慰自己:我已经和瑞玛一起准备好了一个所谓的剧本,排练了一些千篇一律的回应,安排妥了电话。我还有个笨头笨脑不会飞的鸟——茨韦·戈-臣。我让自

^① 开尔文勋爵(1824—1907),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发明家,是现代科学的标准温标开氏温标的奠基人。

己放心,因为我可以想像得到,哈维站在椅子上,用法语大叫“我起诉”,但实际上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我把沾了口水的头发按在脸上,告诉自己,如果我在哈维身上失败了,那么我也失败了。不过他不会给我带来任何麻烦的。即使他告我冒充皇家气象学会的特工,那也没关系,这听起来更像是他干的事情。我认为,虽然我自以为害怕栽在哈维身上,但是我对失败真正的害怕,很可能与我的瑞玛有关系。茨韦·戈-臣疗法是瑞玛的,不是我的,不知为什么,我却毅然地承担起了实施这个疗法的责任。

我从床上爬起来(瑞玛还在那张床上睡着),因为我觉得那张床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欲望。

*

*

*

那天早上,瑞玛对我说,“你就要折断几条腿了。”^① 我记得,她隔着厨房的桌子坐在我的对面,整整齐齐地梳了个高高的马尾辫。这又让我想起来,我曾经以为和我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的肚皮会稍稍地变大一点,她会头发蓬乱地待在家里。我认为她不会像我母亲那样,总是那么刻意地打扮自己,仿佛还希望引起那些看不见的、想像中的男人们的注意。

“刚才那句话你说错了,知道吗? 我不喜欢你故意装出可爱

① 瑞玛应该说:“你折断了一条腿(You break a leg)。”而不是“你就要折断几条腿了(You're going to break some legs)”。对马上就要上台演出的演员说“You break a leg”,意思是“good luck”,但又不能说“good luck”,否则就是“bad luck”。因为“我”就要去假扮皇家气象学会的特工,这也是演戏,所以瑞玛才这么说,但她说错了。

的样子。”

“我没有装可爱。”

“瑞玛，我有个非常不好的感觉。”

对这件事有个不好的感觉，我应该这么说。我认为，这么说至少比只说“不好的感觉”更符合正确的语言习惯。但是瑞玛语言上的那种小小的特性已经渗入到我的全身上下，我再也无法非常清楚地分辨什么是瑞玛的语言，什么是正常的语言。

瑞玛的眼睛从我身上转开去，凝视着手里捧着茶杯。“昨天晚上你吃肉吃得太晚了。十一点以后才吃羊肉。这就是不好的感觉。这么一回事儿。你应该尊重我的想法。你应该尊重你的妻子。”

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记得，我想纠正她，告诉她加上“就是”两个字。难道不加“就是”这两个字就不是她说的意思了吗？我看着她把手指伸进茶杯里，然后把手指拿出来放进嘴里嘬了嘬，好像手指头上有伤口似的。她又这么做了一次，这是她的喝茶方式，非常慢。（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喝茶时好像渴得要命似的，好像有人会把她的杯子拿走似的。有几个早晨，她在三分钟之内就把第一杯茶灌进了肚子里，可是我经常发现，她的第二杯茶剩下一半，搁在一边放凉了。）

我过去很尊重瑞玛，当然现在也还是尊重她的。不过我知道，她不相信或者说不理解我会尊重她。我认为，这与她的自我怀疑有比较多的关系。她总是在怀疑她是谁，或者怀疑她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怀疑她没有做的事情。她没有所谓的“专业”，但我懂她为什么特别想要一个“专业”，好像她受到了美国式的身份观念的感染。在美国式的身份观念中，你是谁主要是由你所从事

的有薪工作决定的——这在我看来,似乎是很愚蠢的。如果我长得像瑞玛,如果我有她的那种气质,如果我不是个男人,那么我会认为,顶着一脑袋染过的头发,披一条绿色的围巾,穿上高跟鞋(稍微)一摇三摆地在路上走,那才叫够专业呢。比起这个来,还能给予这个世界什么更多的东西呢?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被普遍认为是惊世骇俗的。但是,最近我发现流行的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没有意义。当瑞玛抱怨人生没有目标,日子过得不顺心的时候,我告诉她,她生在了一个错乱的时代,她应该考虑的是,每天早上醒来后,要让自己够专业。我告诉她,她可以是我的伯爵夫人。她也许曾经把我说的话当作逗她开心,但是到最后她竟然选择——我认为用“选择”这个词是正确的——生气,因为她清楚地表明,也许她的问题就在于和我结婚使她感到太幸福了,而这种幸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已经足够了,如果她独自一人的话,或许她已经干了一些她自己想干的事情,哪怕是一些非常愚蠢的、非常多余的事情,比如当个税务律师,或者当个诗人,那样也不错,那样的话也能够说明她是谁。我说她是瑞玛。而且我说,我真的弄不懂,对她的税务律师和诗人的目标来说,我竟然扮演的是障碍物的角色,她说是的。我真的弄不懂,我就是那么明确地说,我真的弄不懂。但她说,是我弄不懂她。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不过,对于瑞玛的晚上十一点以后吃羊肉才会有“不好的感觉”的说法,我却认为,那是在会见哈维之前的特殊情况下,生出的“不好的感觉”,所以她的说法是不对的。尽管如此,我想她的这个大众的观点——我们怎么会误读了我们自己的痛苦呢——还是非常正确的。

e. 最初的(牺牲重大才得到的)胜利

在撒谎之前,或者在表明爱情之前,或者在做任何重大的事情之前,你真的要仔细地观察一个人。哈维那天的行头,我记得很清楚:灰色的裤子(有一点起球了)上吊着深蓝色的背带,印着竖条花纹的薄衬衫(袖口没有扣上扣子),在衬衫左胸上有一块黑墨水的污迹,衬衫袖子太短了,很奇怪的是,衬衫的领子竟然是浆过的,啪嗒啪嗒扇动着,看上去准备飞起来。我不知道,哈维是不是真的一只胳膊明显地比另一只胳膊长,可是他让人产生出那种印象。

我和瑞玛计划,在我和哈维谈话快结束的时候,瑞玛打电话进来。那时候我应该已经向哈维介绍了我是皇家气象学会的特工。但我没有那么做。我觉得太显眼了,那天(他的眼睛蓝得那么异常)在我看来哈维是真真切切的,在哈维看来我也是真真切切的,而且我的确知道,只要我的外表上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都是非常可疑的。那天,就像前几天那样,由于我的过度温和的询问,在哈维看来,我只是一股不值得注意的灰色烟雾。

我的那种感觉——我肯定——来源于意识到我的心里埋伏着一个荒唐的谎言。我不是个天生就会撒谎的人,所以我对自己的撒谎能力一点儿信心都没有。我并没有因为自己天生诚实就沾沾自喜,我没有把我的诚实看做是道德标准。既然我把道德看做是过分复杂的选择,我就从来没有刻意地去选择诚实,只是我从来都无法做出别样的选择。还是孩子的时候,为了避免对确实不用感谢的事情说谢谢,我会把脸埋进母亲的裙子里。一股羊毛的味道,衬裙摩擦着袜子的声音现在依然能勾起我的

激动。在极其罕见的时候,我不忙却说我很忙,我不喜欢某一款衣服却说我喜欢,我对某个人不感兴趣或讨厌他,却说对他感兴趣或不讨厌他,对于我的“无害”的谎言,我心里充满了过多的内疚。我想哭,我想坦白,我想卸下包袱。这有一点夸张,真的,仿佛我已经伤害了某个人,仿佛我那小小的不诚实是个很了不得的大事。当其他人撒谎时,比如瑞玛,我甚至有点喜欢,喜欢揭穿谎言,查出她认为值得撒谎的事情。

哈维在说一些有关厄尔尼诺现象的事情,还有关于死鱼的什么事情。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吓了一跳,哈维也吓了一跳,不过远没有我吓得那么厉害。

“喂?”

是瑞玛,她管我叫利本斯坦医生,问我穿的是什麼衣服,语气轻佻得不合时宜。

“啊,是的,你好,”我说,注视着哈维衬衫袖口上的竖条花纹,看着它们变得模模糊糊的。

瑞玛自由自在地聊着,她想要我去接她吃晚饭,劝我别吃便宜的鱼——每个人都在说鱼,还问我能不能找到她爱吃的杏仁饼干,她喜欢用这种饼干蘸着茶水吃,问我知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一种饼干。在整个通话过程中,我一直都是一本正经地点着头。

“那些厄尔尼诺风暴吧?”我问道。

瑞玛还在说,可以说,我不知道她那清脆动听的声音都说了些什么。她终于说要挂电话了。我说,当然,我会如实地把所有的指示都传达下去的。

“好啦,”我清了清嗓子,对哈维说,“很抱歉被打断了。但

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些相当重要的事情。你知不知道茨韦·戈-臣博士公开的工作?”

事先编好的话急急忙忙、结结巴巴地从我的嘴里吐出来,听着好像不是我自己说出来似的。我面红耳赤地坦白自己是个特工,接着就跟哈维谈起了戈-臣博士交代的任务——一股冷风正逼近曼哈顿。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目光盯在哈维衬衫胸口上的那块墨水污渍上,我进一步地把自己撕扯成了两半。这样一来,当我的一部分在同哈维说话时,我的另一部分则在琢磨一种淡绿的颜色,那种淡绿色恰好与报上发表的由天文学家演算出来的宇宙的颜色一样,之后又有一篇文章出现在第二个星期的报纸上,声明上次犯了一个数学上的错误,现在天文学家认识到宇宙的颜色——如果你能站在宇宙外面看的话——实际上是米色的。(客观对待绝对是正常的,是一种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褒奖的对应机制。只有不愿意客观对待才是需要担心的。)

我说完以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或许是长时间的——我确定不了是哪一个——沉默。

“你为学会工作有多久了?”哈维问道。

我告诉他,不允许我透露工作上的任何情况。

他问我,我是否可以告诉他,我有没有得过任何奖项,特别是西蒙斯金奖,或者是卡尔-古斯塔夫·罗斯比奖。

我说,怀揣秘密的人是孤独的,哈维大概懂得这种孤独感。

哈维害羞地笑了,然后以同志般的口吻聊了几分钟有关气象工作的困难和棘手。如果你是冷静的、克制的,别人自然会来填补你故事中的漏洞,对此我总是感到惊讶。哈维掏出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捋了捋眉毛,然后开始解释他的这个仪器。他说,

他可以用这个小镜子改变光幅和声幅。

我注意到遍布在他脸上的破裂的毛细血管,又细又长,像蜘蛛的腿。我清楚地记得那种成功之后沮丧的心情,我想把手伸向哈维,想要摸摸他的一只袖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做,说不清楚。哪怕是一个善意的谎言都会在嘴里留下金属般的味道。

我有没有想过,为了找到瑞玛,我甚至会与哈维搭档,但却不愿意与瑞玛联手去控制和欺骗哈维呢?我没有想过。

f. 与茨韦·戈－臣的非同寻常的友谊的开始

向哈维传达戈－臣博士的命令变得很容易,很普通,很家常。瑞玛打来电话,她经常会列出一张食品杂货的单子要我去买,然后我就会告诉哈维,戈－臣博士说高气压正从北面过来,哈维在本地的协助是很有必要的。

随着戈－臣疗法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十九个月里,哈维一次都没有失踪过。他严格地执行茨韦·戈－臣的命令,待在城里工作。他把潮汐风从哈得孙湾赶走;他妥善地处理了他家那条街道拐角处的一场即将来临的热带风暴引起的混乱。哈维的母亲经常给我送来手工制作的巧克力,每一块巧克力上面都刻着纺织品风格的图案,这让我对我自己很满意。

对于茨韦·戈－臣疗法的成功,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至少有那么一小段的时间,瑞玛也非常高兴,大概比我还要高兴。她开始称她自己为瑞玛医生。她常常握住我的手,把我的手背压在她的脸上。有一次,当天气预报打断了新闻节目的时候,她紧紧搂住我的胳膊,趴在我的身上,亲吻我,放声大笑。她的愉快让

我觉得她会爱我，只爱我一个人，永远。可是，或许就是这个成功的欺骗使她患上了欣快症。“为什么，”有一天晚上，我问她，“街角的小店里明明有金橘，你却说没有？”她疑惑地看着我。“我找到了你给我买的那件蓝色圆领衫的收据，”我说，“你把那件衣服的价格少说了八十美元。”她不理睬我，依然不受影响地沉浸在她的喜悦之中。不过，这样也很好。与我的本意相反，幸福的感觉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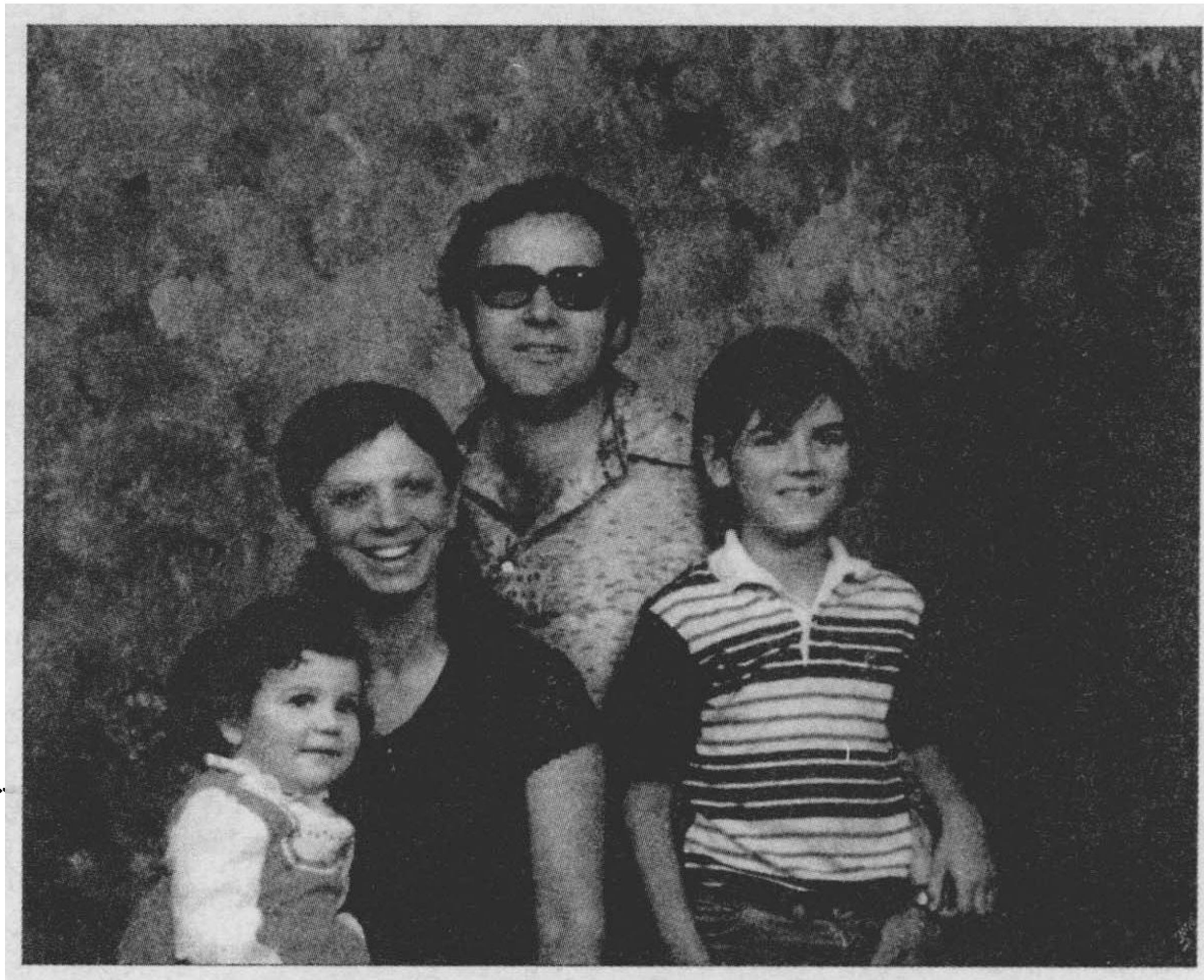
戈－臣疗法的语言走进了我们的家，刚开始是为了逗乐，但过了一阵子以后，谁能说得清楚是怎么回事呢？每当我和瑞玛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就会求助于我们的气象学家，“戈－臣博士更喜欢绿颜色的毛衣。”“戈－臣博士说不要模仿尼拉·韦弗斯。”有时候，说得更亲密，“你不穿袜子，茨韦会不高兴的。”“茨韦认为你应该把录影带还掉了”或者“茨韦觉得你应该胖一点”。瑞玛也许已经听腻了，但是，因为是她发明的疗法——不是我发明的——茨韦的幽灵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我把茨韦看做是个陌生人，这是肯定的，可是我感到这个陌生人正以某种方式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好像在我和瑞玛睡着以后，他才回到公寓里来，从冰箱里拿出吃剩的东西当夜宵，边吃边看电视，把电视的音量调得很低，喝完茶的杯子就扔在洗碗池子里。

一天下午，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我在戈－臣博士的网页上偶然发现了一张他和家人的照片，我把它传给瑞玛。瑞玛用医院的彩色打印机将照片打印出来，小心地把它藏在一个空的病历夹子里带回家，然后把它贴在我们家的冰箱上。

“干得不错啊，”我说。

“哦，我是为我自己做的，”她答道，有一点点不高兴。

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曾经就这个行为——把一张人家的全家福照片贴在冰箱上——做过一些解释。但是回顾从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现在看来那些解释似乎太过于简单了。我承认，我非常简单地把我们家里的这张照片解读成渴望要孩子的征兆。不过，我不敢肯定是瑞玛渴望，还是我渴望。或许这种渴望只是瑞玛自己平淡的童年生活的再现，抑或是她的童年生活的一件替换物。或许是渴望别的什么东西，渴望别的什么人。但是，不管那张照片是什么，我都不在意，它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它只不过是一张看着很有趣的照片而已。



茨韦衬衫上的蝴蝶式衣领,有色眼镜,他妻子裙子上的镂空袖子,儿子身上那件呆头呆脑的伊索牌翻领套头衫——通过这些服饰上的细节让时光倒流真令人愉快。还有那个干干净净、胖乎乎的小娃娃活脱脱就是个巴伐利亚人的模型,那可是个宝贝啊。“你为什么只注意衣服?”瑞玛问,仿佛发现了我在道德上的瑕疵。但是,当我催促她说出她注意到的东西时,她只指出那个母亲和儿子雪白的胳膊肘。有时候我对那个妻子戴的项链赞叹不已,另一些时候又对茨韦·戈-臣衬衫上的不可思议的淡蓝色方格子感到好奇。有一次,我和瑞玛就戈-臣博士衬衫上钉的是纽扣还是按扣争辩了好长时间,而且争辩得相当激烈。我认为那是按扣,根据的是照片的年代背景;瑞玛认为那是纽扣,根据的是看得见的细节,她认为那些细节我显然是看不见的。不过,仔细看看照在按扣上的那道光——其实那是一条窄窄的花边。

奇怪的是,我直到现在还在想那个扣子,我怎么就从来看不腻那张照片呢?

尽管我不相信外表,尤其是在照相馆里衬着杂色的背景摆出来的姿势,但是戈-臣一家人的脸上都呈现出幸福的表情。或许这样的表情不是特别的老练,不是特别的好看,或者说不是特别的时尚,但依然是幸福的表情。即使如此,我还是不知道那幸福的表情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那时候是否真的很幸福,但是,谁能够真正知道别人是否幸福呢?甚至谁能够知道他自己是否幸福呢?如果另外一个女人可以拥有瑞玛的外表,那么大概我现在对外表应该完全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那张照片显示的不止是外表,它也显示出一种情感,一种家

庭的情感。这种情感似乎是对外表以外的某种东西的回应,然而有时候这样的“情感”——这种大脑边缘系统的本能的反应——是最浅薄的,而且是不合时宜的。当一只小鸭子对一根涂着红色油漆的树枝的反应比它对自己母亲的嘴反应更强烈时,它肯定有这样的情感。

4. 神秘的指关节

这是与哈维有关的事情——他又失踪了——不过我没有立即把他最近的这一次失踪(或者把茨韦·戈-臣)与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尽管那女人刚刚睡着,我就收到了医院的传呼,我立刻(仿佛我的一部分知道是什么事,而另一部分不知道)想到的是找到了哈维。我从医院回到了哈维没有来过、瑞玛不在的公寓里,为了妥善保存,我把瑞玛的那个淡蓝色手提包放在洗碗池子下面。现在是早上五点,我的新房客还没醒。她盖着瑞玛那条又旧又难看的黄颜色的被子,只有一条肤色不太深的胳膊和几缕金色的头发露在外面。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她没有动。

看着这个外貌和瑞玛几乎一模一样的女人,我有一点儿怪怪的感觉。这提醒了我,在我真正认识瑞玛之前,我也常有这种感觉。我想起了那个冬天,那时候她还是个陌生人,我注意到了她,她每天晚上去那家匈牙利点心店,戴一副红色的连指手套,穿一件同样是红颜色的羊毛大衣,大衣上的扣子是特大号的。她总是点散装茶叶泡的茶,当她在我附近的一张桌子上坐下来后,我喜欢观看她从不锈钢小茶壶里往外倒茶,而又努力地不让

茶水洒出来,这么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茶水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角度从壶嘴往外流,一直流到桌子上。这时瑞玛会用餐巾纸去蘸桌上的水,然后站起来,再去拿一些纸来。每次都是这样,好像她总是不能够从一开始就预料到茶水会洒到桌子上,额外地多准备一些纸。玉米穗般的头发,稍稍笨拙的步态,不知怎么,那时候我就爱上了她。

离开那个还在睡梦中的女人,我在沙发上躺下,不幸福的感觉似曾相识,就在几个小时以前,我也是这么躺在沙发上,期待着瑞玛的出现。我想要闭上眼睛睡一觉。尽管电话铃没有响——过一会儿就会响的——但是各种思绪像是含有二氧化碳似的在脑海里翻腾。搅得我难以入睡:

- 朦朦胧胧地回想起儿时看过的一部电影,一个瞎子武士看不见追捕他的那个人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 约翰·多恩^① 在巴黎遇到了他妻子的魂儿,这预示了他的孩子的死亡

- 莫泊桑看见了他自己的魂儿,这预示了他自己的死亡

- 瑞玛在电影院里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

- 一阵讨厌的狂笑声

我告诉我自己,这只是一个我想要变得客观一点的问题。这大概就是一个装扮成陌生人的非常正常的问题。一个貌似离

^① 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21),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玄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

奇的普通的问题。我母亲过去常说,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泡个热水澡,喝一杯热茶,或者她所说的“去上个厕所”,可是她从来没有详细说明去厕所干什么。现在,我在想,小时候她的忠告不起作用的那些事情,怎么一件都想不起来了。我们的浴盆在我们家厨房的中间,厨房洗碗池子的另一边就是厕所。厨房和厕所的地上铺的都是犬牙纹的瓷砖。厨房和厕所之间只隔着薄薄的一堵砖墙,总能听见水在管道里流动的声音,冲水的声音,或者水烧开的声音。

我被什么声音吵醒了,像是瑞玛的脚步声,睡了还不到一个小时,睡得很不舒服,左手麻木刺痛。再次看到了那张显然不是瑞玛的脸以后,我决定不能假装一切正常,不能就这么干等着,我得去找真正的瑞玛。尽管我不完全知道寻找真正的瑞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要戴上一顶帽子,拿一个放大镜,去采集指纹吗?——但是我知道,这是我接下来要采取的一个适当的行动。

喝完加了蜂蜜的木槿花茶后,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至少,我向她提起了想要到外面走走。从窗户里往外看,又是一个阴暗的风雨欲来的天气。

“要去散步,太好了,”她满怀期待地说,那双温顺的黑眼睛隔着桌子看着我。“这话听起来,”她继续说道,“就让我高兴。你和我,还有可爱的狗,我们——”

“我想要一个人去散步,”我勇敢地打断了她的话。

“哦。”那爱狗的女人皱起了眉头。红色的木槿花把她的嘴唇染成了漂亮的粉红色。“我是出于好意才提出来和你一起去散步的。不过这天气看上去真的很糟糕。气象预报员管这种天

气叫什么？雨夹雪？听起来好像是晒干的樱桃、椰子和山核桃。其实根本没那么好。”

她说话的时候，两只手捧着杯子，我注视着她的手，注视着她手指关节上的皱纹，那几道皱纹就像小小的大象膝盖。我可以看到指关节上的一层皮，那皮上的纹路表明这手指是一个绳子和滑轮系统。盯着那指关节看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陌生，而不是熟悉。漂亮的手。漂亮的指关节。优雅地捧着杯子的姿势。

“雨夹雪，”我终于慢慢地说道，重复着那女人模仿的瑞玛的语言。在这期间，我的茶已经凉了。木槿花茶凉了以后，喝起来满嘴是丹宁酸的味道，让我觉得更加渴了。“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是吧？”我表示同意，努力使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很亲密，很随意。但是我不能和这个冒名顶替瑞玛的女人进行目光接触，仿佛我在欺骗她，不承认我打算出去寻找瑞玛。

“小狗崽呢？”我问。

“卧室里，”她说，不高兴地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它不是小狗崽。它是狗。它成年了。处在一个紧张的新环境里，特别需要关爱，”她说完话，走到一边去。

“你为什么要把它带回家来？”没有想到，我竟然拼命地大声叫喊起来。

“你为什么不把它带回家来？”她反问道。“你干吗什么事都不做？”她不看着我，快要走出厨房了。

她穿着瑞玛的绿色平脚短裤。她的两条腿很漂亮，也很长，大腿微微地向内并拢。像瑞玛。扔下这么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我为我自己的人格力量而自豪。我希望瑞玛能亲眼目睹这一幕。我希望她看到，我是那么不顾一切地，那么一心一意地爱

着她。

5. 首次搜寻

我怎么在这个城市里寻找瑞玛呢？我发现自己站在那家匈牙利点心店的前面，站在雾气蒙蒙的玻璃窗前，还没有孩子在窗户里用手指在玻璃上画画。窗户下面：色彩柔和的壁画上稍稍有点变形的天使。左边：擦在一起的白色塑料椅子。右边：一个男人托着一盘还没有烘烤的馅饼，正往下走进路边的地下室。我依然站在外面，玻璃上映照出的影子——有那么一会儿，我没有认出他来——是我：毛茸茸的手，歪斜的肩膀，不像我以为的那么高。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就这么找我的妻子？这大概是一个差不多可以肯定她不会来的地方。就像大多数侦探那样，我去的地方是我想要她去的地方，而不是她实际上会去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我走了进去——里面温暖而湿润，像是一间正在发酵的屋子。在点心陈列架边上，一个小男孩拍打着他母亲（我假定那是他的母亲）大衣的口袋，嘴里嚷嚷着“蛋卷！蛋卷！”一个瘦得像秃鹰的男人——他的眉毛很吓人——坐在桌子旁看着，他是个常客，是那一种傲慢自负的、与店员调情的人。有一次我偶然听到他说，他在沉思默想，而我认为他像是精神不健全。在后边不远处，有一群我所认为的“嵬嵬孩子”：两个乱七八糟的女孩子，总是像刚刚从一个中世纪的集市里走出来，身上破旧的衣服永远是天鹅绒的，或者是丝绸的，或者是蕾丝的；一个年轻的男人，没有洗过的头发，一只卡通熊的小鼻子，成天穿着一件不成样子的极短的皮夹克。这会儿他看起来挺伤心的，两

个女孩子在安慰他。我还看到了一个留着漂亮卷发的女大学生,两只胳膊裸露着。一个小男孩在她的桌子底下爬来爬去,从地上捡起一张淡绿色的纸片玩耍。

面对着一群人,而我对他们又一无所知时,我有时候会感到害怕。

“你说什么?”有人问道,也许是在问我。

“没什么,”我说,几乎是自言自语。

过去就在这个地方暗恋着瑞玛(她会把茶叶堆在一个小漏勺里,看上去像是经过修剪的花木)。我觉得,新涌上来的孤独感勾起了我曾经有过的焦虑的感觉,那时候我经常焦虑地看着店门,想要知道瑞玛会不会走进来,然后那种焦虑感又带出了瑞玛玉米穗般的头发,而这个难忘的美景又让我想起了第一天见到瑞玛的情景,她看着我,发现我注意到她在看我以后,很快地把眼睛转开去,所有这一切又勾出了她亲吻我的眼皮时的感觉,我浑身战栗。

这样非常不好。突然,我想要离开这里。

我要了一杯咖啡——一杯非常难喝的咖啡,它之所以招人喜欢,仅仅因为具有一个咖啡的名字,仅仅因为它是热的。我朝百老汇大街走去,走进地铁车站,登上开往市区的一号列车。每次有新的乘客上来,我都会满怀期待地注视着。在曼哈顿岛尽头附近,我下了车,从地底下爬到地面上,穿过马路,又下到地下,在站台等着,又登上一列开往近郊的地下火车。在第三站,一个男人进入车厢,大声地宣布:“我已经道过歉了,向你们这些不认识的人。”同样的话,他又说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所以,我知道他不是在与我说话,至少不是专门在与我说话。但我就

是觉得那个人的真正意思是,我应该表示对不起,我应该道歉。也许车上每个人都有我这样的感觉,他们是这一切的焦点。这就好像当音乐在中国餐馆响起来的时候,鱼在鱼缸里的随意游动突然似乎都变成了精心设计好的舞蹈动作,充满了含义;音乐停了,含义突然没有了。鱼似乎哑了,所有的食客似乎也哑了。

在一一〇大街站,我下了车,然后开始重复刚才的那个循环过程:从地下爬到地面上,穿过马路,又下到地下。后来,我在一家咖啡店里坐了几个小时。为几块方糖和一个倒扣在桌上的杯子画了几幅素描。还用洒在桌上的咖啡画了一幅画,当它被餐巾纸吸走时,像是一幅群岛的图画。

虽然首次搜寻的进展看上去,或者感觉上不像是进展,但是我相信这是一种进展,是一种原地不动的进展,是一种没有后退到绝望的进展。

6. 一个所谓的孤儿

走啊,走啊,最后走回了家。我安慰我自己,可能我很快就可以见到瑞玛了,她——几年前我在点心店里偶然结识的那个姑娘——可能就在家里,还有黄褐色的狗,或许没有黄褐色的狗。可能她在剥山核桃,或者在看报纸。可能看到了我,她会非常高兴。

我把钥匙插进锁里,听到门上有抓挠的声音,打开门,发现我自己正受到那条黄褐色狗的热烈欢迎。那狗解开我左脚上的鞋带。我听到卧室里有说话的声音,然后又听到挂断电话的声音。与此同时,那狗的牙齿叼住我的鞋带,拼命地前后摇晃脑

袋,看似嬉戏顽皮的举动,实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本能的动作,即咬断被逮住的动物的脖子,这是我们称之为聪明的表现。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已经非常成功地忘记了,我们对于牙齿的突然袭击,天生就会聪明地以微笑来掩饰。起码,这是我听说过的最可信的微笑理论。

这时,那女人从卧室里出来。我笑了笑。她也笑了笑。跟以前一样,还是个虚假的瑞玛。

“狗儿让你高兴了?”那貌似瑞玛的女人问道,除了说没有,我还能说什么?那狗丢下我(丢下我的鞋带)去找她。她把那狗抱起来,用过分夸张的动作将那狗搂在怀里,仿佛在舞台上表演。她告诉我,她不在乎我打算给那狗起个什么名字,她要自己给那狗起名字,用不着我。我说,我不介意她给那狗起什么名字。那狗正在巴结地舔她的脸。

“可是,我弄来这狗,”她对我说,“是为了你。”

那狗有一对黑色的湿润的眼睛,与这女人的眼睛很像。这时,我注意到她的脸上有细细的皱纹。那皱纹像小小的乌鸦的脚,不只是她在笑的时候有皱纹,因为我看到那些皱纹时,她没有在笑。我开始意识到,这个貌似瑞玛的女人并不是长得与瑞玛完全一模一样。好像是某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或者至少看上去去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在扮演瑞玛。某个漂亮的女人,但不像瑞玛那么漂亮。并不是说年纪稍大的女人有什么错,只是同我结婚的人不是她。

“你说过狗是很聪明的,”她说,激动地将声音提升到最高限度。“你说过弗洛伊德的狗会给病人看病。”

瑞玛之所以会知道弗洛伊德,是因为我对理想的精神病治

疗法的看法(在我的一些专门的文章里)。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还在继续说话,而我却在想:瑞玛是被绑架了,还是她自己愿意离开我?哪一种情况更糟糕呢?我决心不要因为激动而让我的嗓音变哑,于是我尽量避免说话。还好,在打破沉默这方面,这个貌似瑞玛的女人似乎具有和瑞玛一样的能耐,她继续说道,“你说过弗洛伊德的狗知道治疗什么时候结束,知道谁是精神病人,谁是神经病人,而且病人记忆力恢复时,狗会摇尾巴。你说你希望拥有这种洞察力,拥有狗的这种洞察力。它的洞察力会比你的洞察力更好,所以我把它从医院里弄来,这只可怜的小狗是个孤儿。这似乎像是个预兆,不像是随意的,就好像这狗是被送来给我们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救了它;对它来说,它救了我们。我知道这么说是很傻的,你就是看着我奇怪。”那黄褐色的小狗崽——我是说,狗——舔着那个好似瑞玛魂儿的女人脸上的眼泪。

“但是弗洛伊德的狗,”我说,“它们是中国种的家狗。”

我能想起来的说的就是这些了。我转过身去,走进浴室,用热水洗手。在天气比较冷的月份里,我喜欢用热水洗手,这样可以让我觉得稍微好受一点儿。我用暖和过来的手搓了搓脸。我平静下来了,这只是我做的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透过自来水的流水声,我可以听见那个酷似瑞玛的嗓音正在大声地叫那狗,听起来不太高兴。我想,瑞玛知道这个与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瑞玛有没有向她抱怨过我?我不能否认,我与瑞玛之间在有些方面存在着难以相处的问题——近来,许许多多这样的争吵都是隔着浴室的门进行的。

像瑞玛一样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说什么厌烦了她总是被贴上无理的、荒谬的和疯狂的标签。我也想冲她吼叫,她当然得

贴上那种标签。再说,我只说过她无理和荒谬,从来没说过她疯狂,是她自己把正常的评价转到那些标签上去了。听听,她都不能让男人安安静静地洗洗手,但是我制止住自己,什么话都别说。我心里想,这样的吵架是愚蠢的,这样的吵架是荒唐可笑的。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吵架,那就更加荒唐了。

这个替代我妻子的女人年纪比较大,不再能驾驭了。

我听到前门打开,然后又关上了。

7. 有人与我联系

一个人在浴室里平静地放完热水后,我从浴室里走出来,发现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和那条还没有名字的狗不在厨房里,不在起居室里,不在卧室里——她们出去了。这就是说,我判定,我可以安安静静地思考,安安静静地做计划。我采取倒卧在沙发上的姿势开始着手做计划,这意味着,我迅速地坠入了梦乡,但是并不知道自己睡着了,直到电话铃声把我从闹哄哄的睡梦中唤醒,我才发现自己睡着了。在睡觉期间,我做了个梦,梦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与现实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一样。因为我醒来以后,有一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我真希望,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只是出现在我的梦中,这是一个因消化不良、因一杯冷饮料、因脚抽筋而引起的噩梦。我想,现在我是处于丧失亲人的时期,就像某个人死了以后的头几天,那时候你弯下腰捡起每一块绷带,你都想知道,这个死去的人是什么样的,当你下次遇见这个死去的人的时候,也许她会说起她的死亡(或者说起绷带),你有一点点担心,这将是一场非常别扭的谈

话，一场与刚刚死去的人的对话。

电话铃又响了。

“喂，”我说，把冰凉的塑料听筒贴在耳朵上。

“利奥·利本斯坦。”

“是的，”我说，甚至没有从沙发上抬起身子来，因为我不想失去我在沙发靠垫里捂出的热气。

“利奥·利本——”

“是的，”我睡意蒙眬，但又提高了声音打断对方。

“你是谁？”电话另一头的声音礼貌地问道，有一种奇怪的口音。或许是在拙劣地模仿一种奇怪的口音。

我开始比较清醒了。“谁呀？”我问。

电话线的那一端传来了被捂住的争吵声，然后又传出了像是丢下电话的声音。就在我打算挂掉电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这次是个空洞的、沙哑的、豪迈的声音。

“我是皇家气象学会的。我们希望能邀请您成为我们的会员。您——”

“哈维？”

“先生，我是皇家——”我又听到电话那头的争吵声。接着我听到了瑞玛的声音，虽然我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我想，这个声音是通过电话冲着我来的。

“瑞玛？”我对着话筒大叫，把我自己吓了一跳。

“水壶！”瑞玛的声音答道——现在听得很清楚，声音来自卧室——我可以感觉得到电话发话器附近的热气，那是我自己的声音制造出来的。

“我们希望让您成为我们的会员，”我听见。“您明白吗？这

是一个非常——”

我挂断了电话。

我环视着房间：摇椅，划出道子的木头地板，电影《哥斯拉》^①的招贴画——我熟悉的生活。瑞玛呢？我走到卧室紧闭的门前，把脸贴在纹理粗糙的木板门上，侧耳细听。我只听得见把手挡在耳朵后面时发出的声音；只听得见在远方的大海上插着一面黄色旗子时发出的声音；只听得见我自己的耳朵组织击碎了自由活动的空气分子轨道时发出的声音；只听得见我的耳朵自己搞出来的一点儿宇宙的声音。突然，我觉得荒唐可笑——把耳朵贴在我自己家里的门上。我熟悉的空间渐渐变得陌生了，悲哀之情油然而生。

我放弃了耳朵贴在卧室门上听到的那些声音。我走进厨房，拧开煤气炉——蓝色橘红色的火苗蹿了出来！——把自来水灌进水壶里——自来水流进水壶的动听的声音！——把水壶放到火苗上。我喜欢水壶里的水在烧开的过程中发出的不同的声音。我喜欢听水壶震颤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我们家水壶的把手有点儿松动，它的振动给金属的颤抖又增加了另一层谐波。

“是谁啊？”有声音传出来。

我转过身，看见她，在厨房的屋顶下，穿着我的衬衫，小男孩的短裤，大腿稍稍向里并拢，用一只手抱着那黄褐色的小狗崽——狗。她从我身边走过去，靠着炉子边上的料理台。瑞玛总是喜欢靠在那里，就像这样靠着，这样她可以感受到热气，可以在水壶开始发出哨声之前就把火关掉。也许因为斜靠在台子上

① 《哥斯拉》(Godzilla), 1998年的美国科幻电影。

的那个姿势,我开始默默地同自己争辩:这一定是瑞玛,一定是她。跟过去相信瑞玛一样相信这个瑞玛。看看她,今天她比以往任何一天更奇怪吗?这头发,这眼睛,这长长的腿,一直到下面那双稍稍有点儿足内翻的脚。这还可能会是谁?就像过去相信瑞玛那样相信这个瑞玛。

但是,我知道我的推理是事后归因,另一个声音插进来,嘲笑我,提醒我事后归因推理是精神病人的安慰——在一个公理化信仰的影响下——耶稣基督,或者瑞典王,或者是完全用玻璃制造出来的信仰。

我为什么应该相信,这个女人就是瑞玛,我什么时候跑到了现象学的反面?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把头朝我探过来,就像小狗崽们那样探过它们的头。

一阵尖锐的疼痛,好像上千只小飞蛾,开始集中在我的额骨后面,不断加剧。有什么事不对头。我伸出手,希望我的手是放在她的腹部所在的位置上。因为我有一个感觉,我的手也许会穿过她的身体,仿佛她是一张全息照片,仿佛只有她穿的衣服是真的。可是我错了。我的手没有穿过她的腹腔,她的腹腔是真的,或者看起来是真的。总之,和我知道的其他东西一样是实心的。而我猜,人们会说这是个空空如也的空间像大教堂的出入口吗?不过不该把这个隐喻的延伸看得太过认真。

她看了看我按在她腹部上的手,然后眯起眼睛看着我,似乎在对着我聚焦。

“等一等,是谁打来的电话?”她又问道。

头痛已经发展成头晕,我在冰凉的蓝色瓷砖地上坐下,坐在

那女人的脚边,看着横贯在她脚背上的蓝色静脉。在医学院读书时,由于经常练习抽血和静脉注射的缘故,我的眼睛会不由自主地在脚上、手上、手腕上、肘窝上寻找鼓起的静脉。我很难做到不把手伸出去,将一根手指头按在那些静脉上,感受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好像在我们的身体里,血液里有一个幽灵,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的身体里有个东西——喜欢我们的血液,喜欢我们的肝脏,喜欢我们的性爱——那东西未向我们咨询,就干起了它自己的事情。我碰了碰瑞玛脚上的静脉。我觉得,我可以说,那只脚,至少是那只脚,真的是瑞玛的。或许大概不是真的。大约在我的心里,每只脚都变成了稍微有点不同的瑞玛的脚。瑞玛的脚完全像瑞玛的脚,光是她的脚就足以让我想起作为整体的她。我不知道,我感到非常困惑。

“利奥,”那女人温柔地对我说。“利奥,你没事吧?对不起,刚才我生气了。对于哈维的出走,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感情。我想事情可能就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不是你的错。只是你认为这是你的错。也许是我的错。是不是这样的?”

我抚摸着她那只小巧的脚。水壶颤动得有点儿剧烈。我能听见那小狗崽——那狗,在她的怀里,在我的头顶上方,喘气。

“如果我告诉你,”我问她——温和地问,因为就算她不是瑞玛,她也似乎还是个非常不错的人——“是皇家学会给我打电话,你会说什么?”我轻轻地按住她脚背上的静脉,看着它的周围变成白色。

“皇家学会?”

“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一个,”我轻轻地说,弄不清她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我俯下身,亲吻她的脚。她的脚是冰凉的,上面都

是灰尘,瓷砖地也是冰凉的,上面也都是灰尘。我舒展开身子,躺倒在冰凉的、满是灰尘的瓷砖地上。“皇家气象学会。”

“利奥?”

“茨韦·戈-臣是那个学会的会员,”我说,冲着冰箱点点头,虽然茨韦的全家福照片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不知道那张照片到哪里去了,本来就贴在冰箱上的。不像你想的在冰箱底下,因为我可以看得到冰箱的下面,我只看到一个卷曲的水果的标签,还有一个小孩的玩偶。

那女人关掉了烧水的煤气。根据声音判断,壶里的水还没达到接近烧开的程度。她放下那狗(它开始舔我的脸,打搅我的宁静),女人在我身边坐下。“笑话不好笑,”她对我说,“如果需要对笑话做很多解释的话,你是不是就会感到舒服了?你看起来很伤心,利奥。”

一根凸起的静脉艰难地穿过她的手背。我可以按住那根静脉,它会退成白色,然后又恢复到非常特别的蓝颜色。

她说,“你出去散步。你想告诉我散步的情况怎样吗?外面天上可都是乌云。”

她说得对,不只是说外面乌云密布,而是说当需要对笑话做出解释时,笑话便失去了幽默。我想,也许我已经成为一个笑话了,不是打来电话的皇家学会。后来,当电话铃再次响起的时候,我坚持我们俩都不去接电话。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我把眼睛盯在地板上,有一瞬间我告诉“瑞玛”我想她,我趴过去,轻轻地咬住她的耳朵,然后亲吻她的手,亲吻她的手腕内侧,那狗跑来跑去的。我悄悄地在心里向瑞玛道歉,因为我想搂住另外一个女人。我想你能够想像得出我的这些感受,而这些

感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8. 单多普勒气象雷达

在戈－臣疗法最有效的那段时间里，我喜欢看纽约 NY1 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节目，并且把茨韦当做是屏幕后面的那个人，一个没有人歌颂的英雄，他使用多普勒雷达技术，用记录的语速解释数据，同时为纽约市的五个行政区预测天气。这种想法很好玩。这个适当夸张的、幼稚平庸的想法伴随着我每天的神秘的生活。不是太过神秘，但也足够神秘了，足够到让其他人——我希望是瑞玛——把我设想成在干一些比较伟大的事情。但是我把陌生的茨韦设想成一个天气预报员，结果证明我的这种设想是缺乏雄心大志的，是最不具真实性的。

茨韦·戈－臣对雷达气象学领域的贡献包括一系列有关“恢复”的论文，所有这些论文提及的问题都是将多普勒气象雷达数据转变为现实世界所熟悉的信息，最终转变为实时的信息。但是茨韦特别关注如何用单多普勒雷达完成对价值重大的数据的恢复；在这方面，他主张与比较传统的恢复方法决裂，传统的恢复方法包括双多普勒雷达系统：两个雷达，互相隔得很远，从垂直的角度观察多少有点儿相同的定风量，这样就能通过三角测量来预测现实世界的信息。为什么要摒弃双多普勒雷达系统呢？茨韦是这样描述发展单多普勒恢复方法的动机：“两个完全耦合^① 的雷

① 耦合，物理学上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

达系统是十分罕见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而且“双多普勒雷达分析要求精确的雷达天线的标定刻度,以及两部雷达同步运转”。

而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比如,就像在因丧失亲人而哀痛的过程中,医患关系天生是不对称的。我猜,我已经让这种不对称全方位地渗透进了我的生活,所以尽管我有许多令人愉快的事业上的人际关系,但是在有关瑞玛的替代人这个问题上,我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征求意见的人;没有一个人,我可以像个朋友那样给他打电话。除了瑞玛,可是瑞玛不在。我承认,为了调整片面的观点和修正感觉失真,一般最好是向另一个人咨询咨询。比如,我想知道,“我看上去是不是很憔悴?”让另一个人的眼睛看看我,是很有用的;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也许我们能够把问题解决得比较接近真实。

但是我的处境的特殊性,证实了这是一个不合理的预期。所以,我得独自一个人走下去。

*

*

*

茨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有限的知识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对他的工作的理解,但是我开始懂得了基本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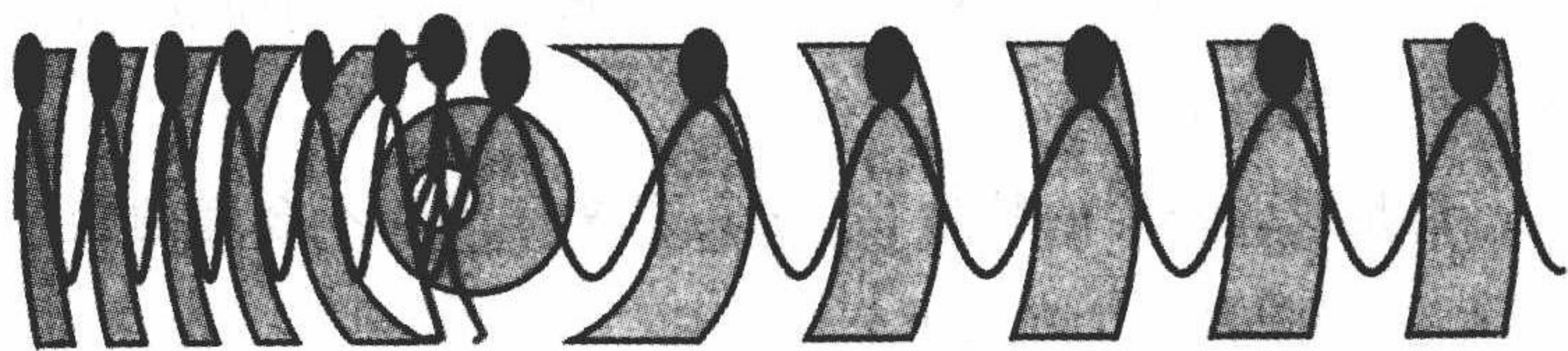
多普勒雷达依赖的优势被通称为多普勒效应,一个经常被误解的概念。多普勒效应描述了一种表面上的——与现实相反的——频率或波长的变化。这个变化被一个观测者发现了,这个观测者与波源在运动中产生了关系。教科书上的范例:当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逼近时,它发出的声音似乎在音调和频率上

都呈上升的趋势。但实际上,放射出的频率——汽车周围空气的振动——一点都没有改变,只是似乎改变了。

让我们想像出一个源头,每秒钟从那个源头里走出一个貌似瑞玛的人。

如果还有一个固定的源头,我就是那个固定的源头,这样每一秒钟就有一个貌似瑞玛的人从我的眼前通过。

但是,如果这个单独的观测者,那还是我吧,开始朝瑞玛们的源头走去,那么每一秒钟从我眼前通过的瑞玛就不止一个,尽管瑞玛们还是以每秒钟一个的精确速度离开源头。以我正在步行中的眼睛来看,瑞玛们现在的间距缩短了,波长因此受到了影响,瑞玛们精确的频率改变了,变快了。



或许还要考虑到我站在原地,瑞玛们的源头向我移动的例子。或者考虑到我和瑞玛们的源头同时移动。任何理论都会做这样的设想。如果根据运动向量的要点,瑞玛的源头和我互相渐行渐远,那么瑞玛们将以较慢的频率通过,感觉得到的瑞玛们的频率也将降低。(减速的汽车将发出比较低的声调。)

意识到感觉失真,使科学家们可以利用失真本身收集有关现实世界——不是感觉得到的世界——精确的数据。事实上,如果不存在失真,那么就能收集到更多更好的数据。多普勒效应涉及这些失真的感觉,而多普勒雷达的效用依赖于对这些失

真的解释,正确地理解失真能促进对现实世界更精确的理解。

大约,这是多普勒效应得出的最著名的结论,即宇宙正在膨胀。因为不管雷达指的是哪个方向,它测到绝大多数星系的光谱线存在红移^①现象。这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宇宙正全方位地离我们而去(当它离开时,看上去显然是米色的)。因为宇宙膨胀这样一个事实,我感到更加伤心和孤独,我不敢确定这种感觉是错还是傻。回到焦点:多普勒效应。以我对它比较个人的感受,我开始称它:多普勒魂魄效应。

9. 多普勒魂魄效应在实施中

她对我说,“阿纳托,我很担心你。”

阿纳托?有那么一会儿,我可以感觉得到我的皮肤变干了,我在点心店看到的那些人都是我自己,戴着假面具,在嘲笑我;我可以感觉得到水分子不是趋向沸腾,而是走向反面,在空气的挤压下冲撞在一起。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是,“什么?”我看见了红移。米色的星星带着红色的光环,正在向下滑落。

她用非常平静的声音答道,“嗯,我说,我很担心你。”

“你说阿纳托来着,”我说着转过身,抬起头看着她的脸。就这样从下往上看——我还是躺在厨房的地上——她的嘴唇像是雕刻出来的,夸张而怪诞。

“托儿?”她说。“没有,没有。我没那么说。”

我还能觉出那狗在屋子里,但是它仿佛在够不着的远方,仿

^① 指恒星光谱线的波长向红端即长波端所作的系统位移。

佛它的尾巴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有节奏地拍打着。

“你说的，”我又说一遍，“阿纳托。”

她的眼睛湿了。“没有，我没有说。我只是说，我担心你。”

“我听到你说阿纳托，”我再次强调，没有感到不安，因为，毕竟她是个陌生人。我从冰凉的、布满灰尘的地上坐起来，再也看不到冰箱下那个迷路的玩偶了，不知为什么有一点点痛失亲人的感觉。我坐在那女人身旁。“阿纳托。是那个夜班护士的名字吗？”

她非常安静地哭了，没有理睬我。

“他是你的男朋友？他参与了这件事儿？”

她用袖子擦了擦脸。“真傻，”我听到她咕哝了一声。

“什么？”我问道。也许有人会指责我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的痛苦，但我自己还处在震惊之中呢。

“不是，真傻。不是，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她含着眼泪笑了笑。然后，她从地上站起来，我指的是厨房的地板，朝卧室走去。

我没有跟过去，没有立刻跟过去。

*

*

*

我去睡觉了。我心里明白如果是我错了，如果她是真的瑞玛，那么到了早上，我们会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情况就是这样的。我喜欢这样，我们共同承诺为我们的亲密举动定下界线。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承诺是亲密举动的最高形式。这些日子以来，我经常怀念我们的一些非常特别的习惯，似乎总在讨论我以前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吃过的每一样东

西,穿过的每一件衣服。人们是需要秘密的。总之,那天晚上我就缩在床边上睡觉,那女人似乎并不介意。她睡觉时,背对着我,搂着那狗,没有碰我。

我也由她去了。

10. 我遛狗;狗遛我

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在为了给那狗起名字拌完嘴以后,在询问了阿纳托之后,那时候瑞玛还不是瑞玛,那时候还不知皇家气象学会给我打过电话还是没有打过,那时候还不清楚哈维是死了还是又一次失踪——我醒来了,那女人睡在我的边上,搂着一只新动物,我问她,我有没有在睡觉的时候说话。她嘟囔着:你现在在说话,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睡觉。我又摇了摇她,她说:但是我正在睡觉,请别烦我。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闻了闻她的头发,就是这个味道,我的眼睛湿了。我把手放在她的前额上,她的额头就是这个形状。我小心翼翼地伸出胳膊,搂住了她的腰,结果发现远离腰部的屁股,摸上去的手感就像是瑞玛的屁股,虽然也许有一点点大,或者有一点点小,或者别的诸如此类的感觉——我费尽周折地想明确表达出我的感觉,哪怕只是对我自己说清楚。我试图接着再睡,我想我是睡着了,但是这种睡觉,让人醒来后感到筋疲力尽,我相信肯定睡了没几分钟。

我彻底清醒了,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不在床上。

我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的字体比瑞玛手写的字体稍微小一点——用磁石贴在冰箱上,就是过去贴戈-臣全家福照片的那个地方。

在你离开之前,请去遛遛狗

嘿!我试图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寻找瑞玛——我一个办法都还没想出来,这可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知道,我不可能一整天光坐地下火车。虽然我还没有明确地依据单多普勒雷达恢复方法来考虑我的处境,但是我已经意识到需要超越我单独一个人的观点。我还无法想像如何以我有限的知识做出推断,就好像不懂得视差的知识就确定星星的位置那样。说得更准确一点,大概就像在未知速度和未知方向的情况下,以及在不知道事实上是我在移动还是物体在移动的情况下,试图确定一个物体离开我的实际频率。

我在壁橱里找到了那只神情紧张的黄褐色小狗,它把下巴搁在沾满灰尘的地上,一只爪子搭在瑞玛的黄色高跟鞋上。“好吧,可怜的孤儿,”我温柔地对它说。它看着我,无力地、笨拙地拍打着它那根细细的尾巴。“你不知道,”我继续说道,试着慢慢地弯下身子,免得突然吓着它,“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在家里。也许你觉得我的味道闻起来怪怪的。你知道吗,为了一起过日子,为了恋爱,彼此喜欢对方的味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就算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不错眼珠地盯着我看。我觉得我的瑞玛式的喋喋不休的唠叨让它平静了下来。“瑞玛身上有一股割下来的青草的味道,还有面包和柠檬的味道,”我说。

牵着小狗的感觉不对。

我陪着它走在圣约翰教堂的台阶上。它,那小狗,一路走来收到了很多的赞美。我收到零赞美。过去我常常坐在大教堂的台阶上,等瑞玛,等着她——偶然地——路过这里。这是我们一起生活之前的事儿。坐在冰凉的水泥台阶上,肯定像个最傻

的傻瓜——冬天，我的手上甚至连一杯热饮料都没有，我的心里甚至没有一个高尚的情怀来为我坐在这里辩解——等在这里，我的一部分恨透了天真的瑞玛，恨她占用了我的时间，占据了我的心灵；不过我的另一部分当然是爱她的，爱得神魂颠倒。为了许许多多相同的原因，对她表示深深的感谢，不只是感谢她这个人，还感谢我迷上了她。因为对她的迷恋把我从不停地前进、没有停顿的日子里解救了出来，把我从我的公寓里弄了出来，逐渐改变了我的习惯。有时，我真的看见她了，就是那么一瞥所看到的瑞玛都值得我付出全部的爱。她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那小狗似乎对攀登台阶不感兴趣。在我看来这些台阶所蕴含的意义，对它来说没有什么意思。我们继续遛着，尽人皆知的男人和尽人皆知的四脚兽。然后在一家韩国人开的干洗店的窗户玻璃上，我看到了一条挺可爱的狗领着一个老头，那老头的大衣扣子扣错了。

我必须刻意地检查自己，我决定。不是偶然的。

我把扣错的扣子重新调整好。

我又看了看窗户上的玻璃，看到了一个比较体面的男人。

玻璃窗户上的这个影子与我是看着同样问题（我的生活）的两个观测者，实际上两个观测者没有重复茨韦在对单多普勒雷达恢复方法的研究中提到的解决办法。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在我真正理解了茨韦·戈－臣的解决方法之前，我就在利用他的方法，好像他的主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流淌进了我的血管。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那个念头好像是从牵狗的皮带涌进了我的手里，就做我以前对我的病人们做过的事情。我要积

累数据,查一查文献检索。虽然我不敢完全确定。我要模拟另一个雷达——即使不是完全耦合的——加入反应式里。有两个我们。我还不如说,我和一个我,如果我觉得这么说比较酷的话。就像拉康^①把笛卡尔的有关思考与存在的名句“我思,故我在”里的逗号换成分号。我思;故我在。

总之,那是我的决定,至少那是我的希望。

我给办公室打电话,要求取消我与病人的预约。我说我病了,病得很厉害。然后,我前往公共图书馆研究我所面临的情况。

11. 词 形 变 化

在平庸之辈看来,我进行研究的方式使我失去了可信性。我应当承认,我一直都很喜欢纽约公共图书馆。那天我去那里的动机是非常不纯的,不单是为了找到更多的资料,也是为了到那里寻求安慰,为了看看从宽大的窗户外涌进来的日光就像从巨大的电影放映机里投射出的灯光,落在地面上呈现出宽阔的扇面形。也许——真的是最谦卑的也许——当我看到在光线中飞舞的闪闪烁烁的灰尘时,我在追逐儿时的感觉。那时候的图书馆总是暖暖和和的,我觉得在这个庞大的不可知的怪兽的肚皮里,我是安全的。那时候我十岁,或许十一岁,我母亲几乎每天都带我到图书馆来。她在图书馆里研究与驱逐房客有关的法

^① 拉康·雅克(Ja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的精神分析家,哲学家。他从语言学出发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学说。他是自笛卡尔以来法国最为重要的哲人。

法律诉讼程序,或者是在研究一份家谱。我记不清了,大概这两件事都有吧,只不过是不同的时期里。她一直相信有一宗特大的遗产正在寻找她。她经常站在报摊前,在报纸分类广告的“寻找”一栏里搜寻,然后把报纸重新叠好,放回架子上。

但瑞玛懵懵懂懂地代替了我的母亲,好像不是为了追随什么流行的弗洛伊德学说;回想起来,瑞玛无心之中所做的任何一件我母亲会做的事情,其中是否隐隐透出一种原始的爱。

那天在图书馆里,我知道,我所熟悉的推理法肯定会让我失望的,我要采用新的方法去寻找瑞玛。可能有一些规则被认为还是要遵守的,不过只是在一系列非常特定的条件下,而这些特定的条件,甚至近似于特定的条件都已经迅速地离我而去。在我的新世界里要遵守什么规则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做事一向都是很有逻辑性的,相当传统。比如,我把最不常穿的衣服放在柜橱最底层的抽屉里,因为底层的抽屉用起来最不方便;我办公室的地毯是淡蓝色的,因为淡蓝色是少数几种能让男性和女性马上都能接受的颜色;我第一次拿到瑞玛的电话号码时,为了防止频繁地给她打电话,我故意不把号码存进我的手机里,而是把它用胶纸粘在冰箱上,这意味着我可能丢失它——它可能从冰箱上掉下来,被扫掉——可是我知道这种冒险是不可少的,所以我认为这么做是理性的。

不过,我熟悉的这些推理法突然变成了古董——为了一些仅仅是还说得过去的新方法而抛弃了它们。

*

*

*

我坐在图书馆的一张长条桌子前,拉了一下台灯上穿着珠子

的细绳子，凝视着闪亮的绿色灯罩。我不是在等着想起一个主意，而是等着一个主意想起了我。这副样子持续了有一会儿，我不能肯定多久。我坐在那里，试图静下心来，这时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比通风系统发出的声音还要轻，是两种声调交替响起、韵律不规则的声音。环顾四周，看不出来是否还有其他人听到了这种声音，或者被这种声音所打扰，或者是否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

沿着长桌子放了一些铅笔和米色的卡片。我看着自己在三张卡片上分别写下了三个名词：利奥·利本斯坦（我），活人的魂儿，皇家气象学会。铅笔按在卡片上能感觉得到笔芯很软，这不可避免地让我想起了瑞玛描眼线的样子，她的眼睛忽而向上翻起，忽而向外瞥。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任意地挑选出一张卡片，然后以卡片上指定的方向开始我的研究。我再次强调，因为我认识到我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所以为了确定如何开始是最好的，我需要一种新的推理方法。

然而，我并没有放弃实验控制的理念。我很快又写了三张卡片：苍鹭，羊毛的处理加工，色素性肝硬变。这些都会是我的熏鲱鱼。也许我已经朦朦胧胧地在脑子里选中了苍鹭。不管它了，我把这六张卡片翻过去，把它们掣在一起，像洗牌那样洗了一遍，然后把它们摊开在桌子上。我很难相信我自己会不知道哪张卡片是哪张，于是我又把卡片拢成一堆，然后起身去上厕所。在厕所里，我用泡沫丰富得可怕的粉红色肥皂液洗手，用质地很脆的擦手纸把手擦干。

挑选卡片必须是真正——而不是表面上看来——随意的。要不然，我会有被方法引导的危险，那些方法似乎是我自己想出

来的,但实际上是由一些已经传播到空气中,并且侵入到我脑子里的念头确定的。

我回到桌子旁,又洗了一遍卡片。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双下巴、留着大胡子的男人,他看都没看过我一眼。他的左手一直在耳朵后面随意地移动,揉着那里的什么东西。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感到局促不安,尴尬,别扭,好像他是我。我把卡片撒在桌子上,又从椅子上站起来——椅子磨擦地板的声音在这个不可知的怪兽肚子里回荡。我沿着长长的过道走下去,看着靠在对面墙上一排书架上的一本书的书脊《斯堪的纳维亚名人录 1950—1970》,摸了摸烫金的字母,然后回到座位上。

那个大胡子男人又把手放到了耳朵后面。他的耳垂很大,颜色很淡,可是对耳屏却红得发亮。

我又洗了一遍我那张有意思又没有意思的卡片,又重新把它们摊开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终于,捡起了一张卡片。我把它翻过来:皇家气象学会。

不是苍鹭。

于是:我要查看皇家气象学会的文献资料。

12. 第二次搜索,目标不明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认识到,除了现在已经失效的卡片目录以外,我知道如何使用的一个参考文献数据库竟然是 Medline。我感到非常好笑,不过好笑的感觉持续的时间非常短。

我想起了我和瑞玛第一次一起去旅行,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从一个小木屋走到另一个小木屋。我告诉瑞玛,我“多

多少少”懂得一点儿德语。实际上,我曾经上过一个为期两个星期的德语班。或许我还记得四个句子:*milch bitte*, *Ich bin ein Berliner*, *die Zukunft einer Illusion*, 和 *Arbeit macht frei*^①。当我说我“多多少少”懂得一点儿德语时,并不完全是在跟瑞玛撒谎,因为我的确觉得,一旦我去了奥地利,我就会“想起”德语来。我们需要为撒谎开发一个比较好的描述性词汇,开发一种能够区别故意撒谎和非故意撒谎的办法,以及开发一种区别于撒谎者本人相信的谎言的办法,那些撒谎者本人都相信的谎言可能被比较精确地理解为是做梦。谎言制造了一个相当好的小小的多普勒效应,比起撒谎者失真的自报家门,谎言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撒谎者。好吧,我会记得德语的,尽管从来没有真正忘掉它,尽管还是孩子的时候从来没有——隐隐约约地觉得好像——听过德国的广播电台,没有说过德国话。可是,就像有什么东西悄悄地放入了我们的行李中,但这些东西根本不是我们的,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错误的感觉。有一天,我和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讲起了这种放错行李的感觉,跟她解释她怎么会真的觉得她是爱我的,仿佛她实际上就是瑞玛,不仅仅是“瑞玛”。不管

① 四句德语:

milch bitte 一种零食。

Ich bin ein Berliner “我是柏林人”,引自 1963 年 6 月 26 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德国西柏林发表的著名的《柏林墙下的演说》中的一个句子。

die Zukunft einer Illusion 《幻象之未来》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之一,写于 1927 年。

Arbeit macht frei “劳动带来自由”,1872 年德国民族主义作家 Lorenz Diefenbach 将“劳动带来自由”作为一部小说的名称。二战期间纳粹将这句口号挂在几个集中营的入口处,可能是以此来羞辱犹太人,或是给犹太人以虚假的希望。

怎么说,那天晚上在我们的养老金服务台,我张开嘴,大为震惊地发现没有一句德国话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帮忙找一找?”我说,趴在图书馆的咨询台上。

“论文集?”一个温文尔雅、像蕨类植物的女人问道。然后她在计算机上敲敲打打,然后记下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从一个图书编码系统转到另一个图书编码系统,然后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然后几乎是拉住我的手,交给我五大本蓝色布面装订的论文合订本。这些合订本是皇家气象学会过去二十年里年度研讨会的论文汇编。

“我永远感激您,”我说道。

那蕨类植物礼貌地点了点头,不过我可以看得出来,她对我的研究一点兴趣都没有,她甚至都没有问一问我是不是气象学家。她慢慢地走开,仿佛已然把我忘掉了。

我的蕨类植物朋友走了以后,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于是我拿起一本合订本,坐到地板上。灯亮了,我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好像有个定时器控制着电灯的开和关。我开始一边哼着瑞玛的小曲——歌词想不起来了,一边翻看着用薄薄的新闻纸印的论文,越看越多,稍微有点儿随意地,不是一页一页地翻看——我相信人们管这种看书方式叫草草翻阅,我的一部分对我的另一部分说,好像要通过聊天,通过音乐,通过任何方式减轻不祥之兆的感觉。字体小小的标题,窃窃私语的斜体字摘要,自豪得意的栏目,谦逊的数据图。听着那些薄薄的纸张从我的指缝间滑过去是那么安逸舒适,我几乎忘记了来这里的本意。几乎忘记大概也是一种舒适。

我认为你不再那么爱她了,我的某个部分讥笑我。我的某

个部分是那么的刻薄。

突然,我看到了一件美丽的东西。或者在我看来是美丽的,虽然我说不出原因。那件东西具有震撼力的形状,我不知道应该将这种形状归为哪一类。强迫人接纳的美丽,就像瑞玛玉米穗般的头发——不必人人都承认的美丽,线条状的,长短不一的,有时候是油腻的——一种难以抗拒的、没有解释的美丽。实际上,这是一个刺激物。一个超出范畴的、起刺激作用的东西——叹为观止,通俗情节剧可能会这么说。

我可以在这里复制这幅图像。但是我不能复制印象,这幅图像带给我的印象是,嗯,神奇的,就好像那些洋娃娃,她们的眼睛似乎跟着你在屋子里转悠。我以前好像见过这幅图像,震住我的,是它的美丽,或许是它的叹为观止,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我好像正在看一张等高线地形图。有一种和谐的、意味深长的感觉。一个令人费解的图案,一个有分格式水平线的图案。我想:如果我看到我自己的 DNA 在一个培养皿里发生了变形,我会感到脊椎上轻微的刺痛吗?如果我在街上从我父亲身边走过去,会怎么样?我会认出他吗?他会认出我吗?或者我们只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这种感觉我们也许破译出来了,也许还不曾破译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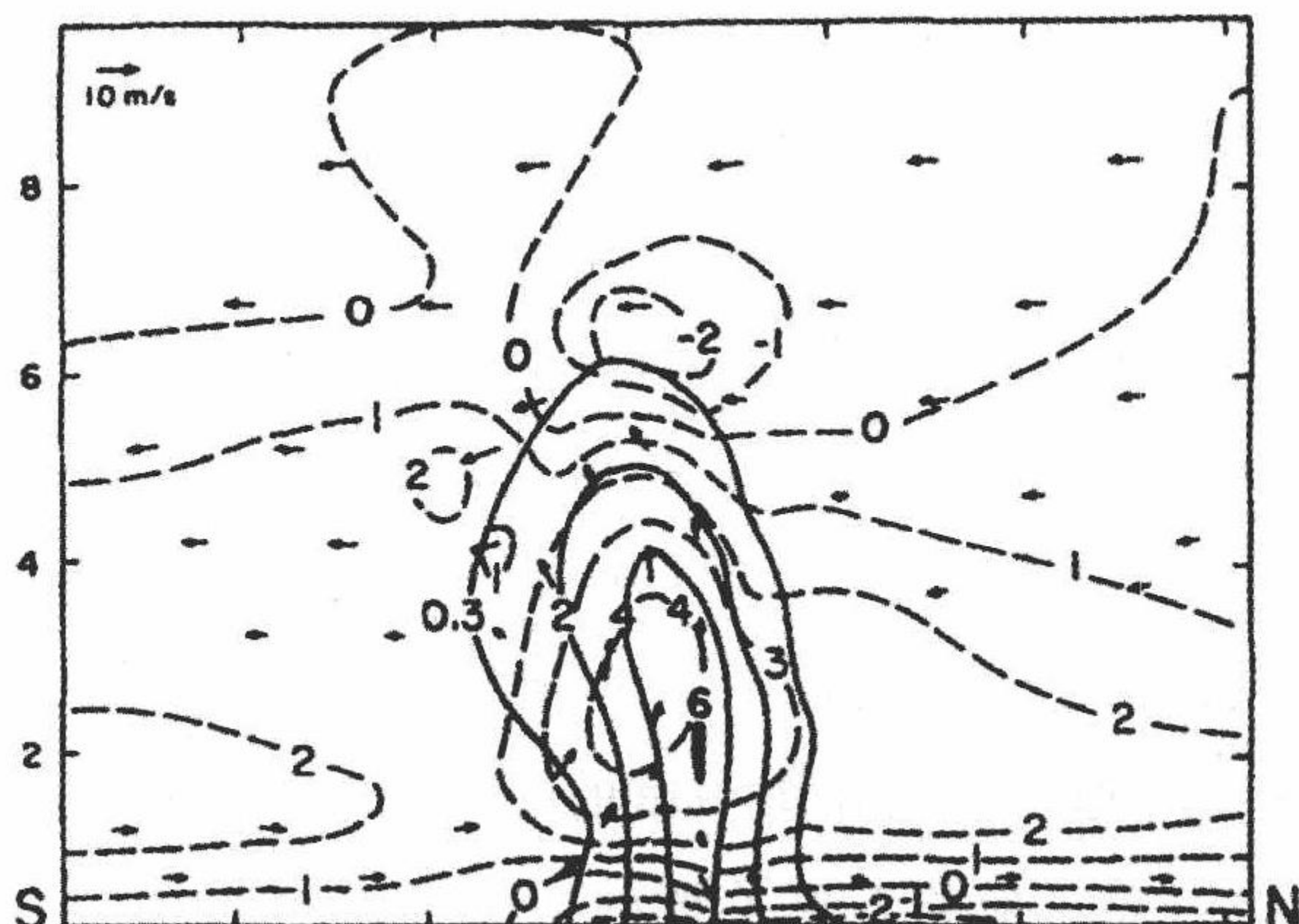
总之,我很好奇,这幅图像会让其他的人想起什么来。

不知盯着那幅图像看了多长时间,我听到从旁边的过道上传来了脚步声,我往回翻了几页,翻到了这篇文章的封页。

第一作者:茨韦·戈-臣。

这篇论文首次被提出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研讨会上。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瑞玛的故乡。



而茨韦·戈－臣就是茨韦·戈－臣。

这篇论文讲的是恢复理论。特别是：“在强对流云之中热力变量的恢复：在三度空间的实验。”

我的心跳加快了，手指变冷了。这时灯灭了，我顺着架子摸过去，把灯打开。我知道普通的事情常常貌似非常特殊的事情，如果你把三十个人放在一间屋子里，其中两个人的生日是同一天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当你在学习一个新名词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这个名词似曾相识，这是因为你开始注意到它了。在学习 cathect(精神专注)，还有 Rosicrucian(玫瑰十字会)时，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体会。也许这就是我的发现。就我所知，茨韦·戈－臣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也许是两个很普通的词汇，而我只是碰巧发现了巴德－缅豪夫^①现象的两个例子而已。但是那

^① 巴德－缅豪夫团体(Baader－Meinhof Group)，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德国的一些思想激进的学生组成的一个恐怖组织。

么多的要素结合在一起——有时候这种情况真的会发生，曾经将一块橘子皮，一根项链，和一个关于卷心菜的笑话结合在一起，来揭示女朋友的红杏出墙——使我确信，我看出了什么事情是真的，我在任何方面都不糊涂，只是我的世界突然变糊涂了。

我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要回到瑞玛的源头，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为什么瑞玛可能是往南走——她是不是被带到那里去的，她是不是还在那里，她与茨韦·戈－臣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在图书馆的那个下午，在布满灰尘的过道上，在电灯总是威胁着要关掉的情况下，我只知道，非常肯定地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就好比，在大雾弥漫的夜晚传来了非常清晰的收音机信号，而且是来自看上去不可能的远方。

13. 我们吵架，不愉快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一堆小扁豆，熏肉和菠菜，在这堆菜上面放了一个煎荷包蛋，我一直都喜欢乱七八糟堆在一起的大杂烩——我说，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她问，我为什么要离开；我说，因为事情有了变化，我需要离开。她问，我说的离开是什么意思，我意识到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决定说话小心一点，于是我说我要给自己放个假。这些短语：事情有了变化，我需要离开，给自己放个假，不是我的话，是电视里说的话，是电影里说的话，是飘浮在空气中的花粉。甚至不是来自我内心里的外星人的话，而是来自外部的外星人的话。行李比较多。她用一個胳膊肘支撑着头，举起手里的叉子，叉子上没有东西，问道，我所说的“变化”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我

还没找到合适的话来解释它。她问道,我到底要去哪里?我对她说,她似乎是个好人,她是个好人,但告诉她我要去哪里,我的确觉得不舒服。“还不能说,”我澄清。“而且也许永远不会说。”

她把叉子的齿尖搁在下嘴唇上,然后按下去。她表现得非常清醒,非常冷静,非常不像瑞玛。

“你看上了什么人吧?”她问道。这让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我喜欢的,哪怕是喜欢一点点呢。

也许我露出了一个紧张的笑容。我摇了摇头。

“你是在开玩笑吧?”她问。

我又摇了摇头。

“这事儿和,嗯,你和,唔,昨天有关系?”她问。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诚实的答案。

“或者同哈维有关系?”

“我不这么认为,”我又说。

“那么我就不懂了,”她说,放下叉子,叉子碰在盘子上,发出清脆的叮当声,然后叉子的齿尖消失在小扁豆里。

“我也不懂,”我说,也放下了手里的叉子,以示尊重,尽管我还没吃饱,但我有一点点高兴,因为我有了一个计划。我差不多已经弄懂了由绳子和滑轮组成的手指的工作方式。手指里的绳子和滑轮协调一致的工作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而使另一个瑞玛的生活变得更糟了,于是我心里生出了把绳子朝我这边拉的想法。

我们沉默了一小会儿。我看着她,然后当我看到她在看我的时候,我把目光移开,低下头看着我的盘子。那天晚上我们吃的小扁豆里加了西班牙的塔拉贡纳甜酒,我直到闭上眼睛,躺在

用杂色布片拼缝成的被窝里，咳嗽着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会想像自己在撒谎时，才想起那种酒的味道很像甘草的味道。我想知道，对于沉默（或者对于塔拉贡纳甜酒）的感觉，瑞玛或者她的魂儿是不是和我的感觉一样。在我看来，沉默就像是潮湿的气味，就像没有原因的咂嘴声，就像幻觉驱走了病痛，就像眼睛附近的一股空气，就像青草高高地堆在大地的某个地方，或者堆在整个大地上的感觉。关于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问过瑞玛。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离开她的椅子，坐到沙发上；那黄褐色小狗和她坐在一起。“你想，”她说，根本不看着我，“让我说，我爱你，央求你和我睡觉，可我不是来这里给你演戏的，你尽可以独自去做你关注的那些事情，然后隔着那些事情和我说话。”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沙发上，还没有名字的小狗坐在她的身边。她的手指直立着抚摸灯芯绒裙子凸起的条纹，然后把手指放平了摸，然后又直立起手指摸。看着她的手指移动，我可以感觉得到灯芯绒面料上的纹路，它让我想到了形成我的指纹的纹路；它让我想到了茨韦·戈－臣论文里的那张像指纹的气象图；它让我想到了有关指纹的神秘的故事，所有的指纹都是一样的，这是我记得的父亲告诉我的少数几件事情里的一件。那么雪花呢？我问他。啊，雪花啊，他回答我。

那黄褐色的狗哼哼着，用疲惫的目光看着我。

“你打算，”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说，“什么话都不说吗？你不是真的要离开。你只是在模仿我演的戏，一出也许是我演的戏。”

尽管形式上的确是这样，我还是非常不确定，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个女人是个冒名顶替者，或者大概是个候补的。就我所知，

她也许像个候补演员，被别人欺骗，而且相信只在星期二演戏，而她是真正的唯一的明星。或许这个女人也感觉到了有什么事不对头，她和错的利奥在一起；或许她像我一样，无法明确地表达出来什么事不对头，但是她又不像我，她不相信她的感觉。也许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地方，另一个瑞玛和另一个利奥在另一个完全并行的世界里，在一个像哈维经常谈起的世界里，高高兴兴地生活在一起。这是可能的。

那狗的鼻孔又喷火了。

我发现自己在对这个另外的瑞玛说话，在房间的另一边大声叫她，我想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她——这种说法也太老套了。

“好吧，”她说，又把目光转向我。

那么惜字如金。这个细节清楚地告诉我，我不是在同我的瑞玛说话。但是尽管如此，那瑞玛的魂儿，那天有一种冷冷的美，像刚用砂纸打磨过的木头，皴裂的，玫瑰色的。就算她不是我的妻子，我还是觉得对不住她。我的心总是向着美女的，我知道这样很不好，但不管怎么说，我的心已经去了别的地方。至少，不像昨天，我没有想要拥抱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的感觉。不过我很惊讶，或许还有一点点生气，她竟然不试着勾引我，哪怕像是要个花招呢。但是，一旦意识到我不想拥抱她，我知道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了。她还在等着我的解释。可是我不知道“全部的真相”是什么。我绞尽脑汁想要找到一个解释，一个能让人觉得是“全部”的解释，就像一首被遗忘的诗，但愿我能想起开头的一两个字。可是我无法摆脱掉混乱的思绪：要么告诉她，她不是真正的瑞玛，而她认为我疯了；要么告诉她，她不是真正的瑞玛，她不认为我疯了，因为她已经知道了她不是瑞玛，要是这样的话，我为

什么要说出来我知道她不是瑞玛？从逻辑上讲，这些不是仅有的两个选择，但是我被那个三段论推理法束缚住了。

“你不说话啊？”她问。

假使这女人前额上的血管以前没有突起来过，那么它现在突起来了，变成了鬼一般的蓝色，就像她的那个可能的情人，那个夜班护士。

这时，电话铃响了。

14. 乐 趣 没 了

我第一次真正地同瑞玛讲话：在那家匈牙利点心店，她就坐在我的前面，我朝那头发探过身子，其实我是拍了拍她的肩膀，可是如果她转过头来，我该说些什么呢？我没有想好。

她真的把头转了过来，从她的侧面可以看到微微凹下去的长鼻子，还有脖子上的青筋。

我发现自己在问她，她是不是匈牙利人。

接下来的是沉默，不知沉默了多久，在这期间我把目光放在她的额头上，因为我不可能直视她的眼睛，终于我听到：你为什么盯着我看？声音清脆悦耳，伴着拉长元音字母的口音。

在煮牛奶的声音中，我担心地问道，“我盯着你看了吗？”

“你是匈牙利人？”这是她问的问题，这回说话的声音大了一点，像是银器被挑挑拣拣时发出的声音。

“不是，不是。”

“噢。”

“不过我母亲是。”

“噢？”

“不过，我不是。一个错误。”

“一个错误？”

“这些蛋糕是你做的？”突然，一个小个子女人在柜台附近大声嚷嚷。

我记得，那时候我想起来（因为我的误听几乎已经变成了谈话的技巧）我有时候听不太清楚——我有截断声音的毛病——这对我的工作是有利的，因为人们流露出来的苦恼的迹象，比他们实际说出来的话要重要得多。但是在我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我的这个“特质”让我成了个废人。

“那么你是哪里人呢？”我问道。不知为什么，在这个话题上，我们的谈话是磕磕绊绊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乐意同我说话。那时候她到这个国家的时间不长，我相信她一定感到很孤独，而瑞玛是不会沉浸在孤独中的，她对她感兴趣的人有点宽容，至少会宽容那么一小会儿。

“真的？”瑞玛说，当我说出我是个精神病医生的时候。“阿根廷人均拥有的精神分析学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你知道吗？”

其实我知道阿根廷，知道那个国家的精神分析学家。但是，我说：

“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这可太有趣了。”还有：人们通常把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医生混为一谈，这让我极其恼火——我永远不可能当个精神分析学家，那些人很讨厌，他们还是消极进取的独裁主义者，而且，没错，都是疯子——不过当瑞玛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时，我没有生气。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边——是愚昧的，”瑞玛解释道。“他们大概会这么对你说，没有吗？你看啊，这里是瑞瓦达维亚大街，它穿过整个城市，从南到北。当东西走向的街道穿过瑞瓦达维亚大街的时候，它们的街名就变了。从北到南，伊斯梅若达变成了皮耶德拉斯，雷康奎斯塔变成了拉迪凡萨，佛罗里达变成了秘鲁。很逗，是吧？”她做了个把头发从脸上擦开的动作，其实没有头发垂在她的脸上。

她说话的方式有一点狂躁，说话的频率和节奏加快，不过音量没有加大。还有，她两边鬓角上的头发翘翘的，不容易压平。看着她，我很想把对一个美人不得不说的话告诉她，那就是，她真的什么都不需要说，什么都不用担心，不只是我一个人会无可救药地仰慕她，根本不会在乎她说的是是什么。但是我没有把这些话告诉瑞玛。美女实际上不爱听这种话，我发现。

“甚至整个阿根廷，”她还在说，“就是一个情绪化的国度。南方的巴塔哥尼亚是个野蛮的、荒凉的、愚昧的地区。大家都这么说。我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鲁德镇。”她对我笑了笑。“你一定认为我说的话很傻。”她垂下眼睛看着餐巾纸，开始把那张纸叠成三角形。“我也认为我说的话很傻；也许就因为这样，我才想要离开那里。每个人对他们自己的感觉都很有兴趣，对他们到底是谁这样的问题感兴趣；连报纸上都刊登精神分析的文章。”接着：“你去过吗？阿根廷？”

我对瑞玛实话实说，我没有去过。我想说说博尔赫斯^①，可

①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 阿根廷诗人和小说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是我知道,我有一个自命不凡的毛病,我担心提出波吉斯可能会显得太炫耀,尽管每个不爱交际的男生都读过波吉斯的书,然而在这个时候提起博尔赫斯所要表明的意思还是相当暧昧的。我一般不愿意提到博尔赫斯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讨论的过程中会得出他没有激情的结论,我讨厌听到这种说法,因为这个结论是非常错误的,我不想参与这样的讨论。回想起来,我知道瑞玛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但在那个时候,我要防止瑞玛说出任何也许会让我不喜欢她的话来。

“如果阿根廷人都长得像你这样,那么它一定是个可爱的国家,”我说。话一出口,立即就后悔我说的这些陈词滥调。

“你得去,”她坚定地说。

“哦,对不起打搅你了,”我说。

“我是说,你以后得去阿根廷。可惜我现在不能去,他们大概不让我回去,知道吗? 什么叫容易进去,容易离开,但几乎不可能返回去?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想,类似人生,或者爱情这样的问题,挺傻的。在我看来,这就是阿根廷。”

她的前刘海分在两边的发式让我想到了油墨刷子。

*

*

*

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去过阿根廷,瑞玛和我——真的没去过。现在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忍不住地想知道,瑞玛是不是故意不对我提起阿根廷,好像她把阿根廷当做是另外一个情人的信物藏了起来。但是瑞玛不会藏起一个完整的国家,她藏起的是非常小的东西。我想起了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吃比萨饼的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有点变形的天使壁画前,那家匈牙利点心店的壁画

前,瑞玛和我决定去吃一点东西。她问,我们去哪儿吃呢?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在强迫她,也不想让我自己显得是上了年纪的样子,就说,我们可以去科罗内特比萨店。她说,行,我怎么着都可以。对此,我从来都是从反面来理解她说的话,而她的意思的确确是相反的。然后,她停了一会儿——那天她穿了一件黄色的无袖连衣裙和深蓝色的羊毛衫,看上去像某个东欧小航空公司的空姐——说,哦,我不想去那里,我们能到别的地方去吃吗?我说,我们可以到皮纳科尔去吃比萨饼——她说,她不喜欢那里的比萨饼——要么到法米哥利亚比萨店去——她说,她也不喜欢,那里比萨饼的面饼太厚,奶酪“不舒服”。她接着说,“对不起,你瞧,我说我怎么着都行,实际上是说反话,我从来不会满意的。”我的脸红了。我耸了耸肩。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瑞玛的这些性格从来没有惹恼过我。我总是把我自己的脑子比喻成是一个难以驾驭的议会,这个议会里有一个不成熟的领导者,几个疯狂的极端主义小集团,所以我不会轻视与我相同的其他人。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性情”的意思。我母亲也是这个样子:她经常一边放着洗澡水,一边烧水准备沏茶,然后几乎在同时又出去散步。每当她这么做的时候,通常都是我关掉浴缸的水龙头,在烧水壶发出哨声之前关掉煤气。于是,瑞玛和我在人行道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瑞玛说,“好吧,那我们去科罗内特吧。我喜欢那里。只是我吃不完一片,我觉得我在浪费东西,有时候我会有一点点伤心——这样很傻,是吧?不过我今天晚上很饿,我肯定可以吃完的,那里的比萨饼的面饼又薄又好,而且我喜欢在那里工作的人。”

我很想知道,瑞玛是不是在躲避什么人,因此导致她神经过

敏,经常改变主意。

那天我们去了科罗内特,去了最初我打算去的那家比萨饼店。但是,由于先前放弃了这家店,然后又选择了它,所以好像去的是一个新的地方。如果我早一点没了兴致,肯定会对这个同意和我一起消磨时间的女人感到失望。现在我又被她迷住了,通过我对爱情的标准计算,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稳定性,也就是瑞玛现在是一个新的瑞玛,一个永远会自动更新的瑞玛,她的组成部分决不会完全被加在一起。我能说些什么呢——为什么我应当期望我的内心活动与别人的不一样呢?

瑞玛要了一块奶酪比萨饼,拿了一副塑料刀叉,我注视着她切她那块比萨饼。然后我拿起刀叉切我自己的那块比萨饼。我把整张饼都切成了小块,再一小块一小块地送进嘴里。瑞玛和我坐在柜台前,那里有一面镜子,我偷偷瞥了一眼我们俩——我们俩在镜子里的影像,我们看起来像是幸福的一对。

我们曾经有过如此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注意瑞玛,但瑞玛总是夸我,好像她注意其他的男人只是为了要指出,和我比起来,那些男人是多么的苍白。一个人也许长得英俊潇洒,但不够聪明;另一个人够聪明,但是不够男人;另一个人够男人,但没有深度。她亲手做一些小礼物给我——手工折的精致的纸盒子,没有用处的小枕头,绣着我的姓氏首字母的袜子。她总是匆匆忙忙地给我做这些小礼物,好像时间不够似的,好像我们的关系就像自然灾害似的,会无法预料地突然结束。

多奇怪,现在想起来,她是爱我的。

15. 对象不会是永久的

我转过身子，背对着那个在抚弄灯芯绒裙子的貌似瑞玛的女人——她正等着听全部的真相——我拿起了响个不停的话。

电话线的另一头把电话挂了。

胡闹。

可是在一连串的挂断电话后，我想，这可不是什么胡闹了。

“谁的电话呀？”她问。

“你认为是谁的？”我说。

可能她在等阿纳托的电话。或者那个夜班护士的。或者皇家气象学会的。

“全部的真相，”她厌恶地说，站起来打开电视。很明显，她不相信我会离开，不相信我识破了她。

我承认，我也不完全相信我自己。我是否抬起头看天花板，看到了水滴状的天花板那里有一个箭头指着门——嗯，那么我就认为，我正把一个自我欺骗的秩序弄得乱七八糟。我是否在地上看到三粒从衣服上掉下来的扣子，就把它们理解为是一个三角形，而这个三角形正指向一个特别的方向——我不会再相信我的理解力了。我是否听到了声音。我是否发烧了。或者有任何神经病的迹象。或者有一种庄严的感觉。或者是否报纸上的所有文章在我看来似乎都具有特别的含意。甚至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打开电视时，是否已经在播放天气节目了，我是否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了——甚至在那时候，我都怀疑我自己，对我所注

意到的事情感到纳闷。

“你像变了一个人,这两天,”她说。“也许好几个月了。”对形势的确认,不可能有比这个更大胆的了。是否是个战术。一个新的幻象浮现在我眼前:我在机场服务台——比实际上的我要年轻一些,形象要更好一些,漫不经心地要求搭乘“最近的一班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机”。匆忙地敲打键盘,打一个交涉的电话,派一个下属到登机口,请他们别关门!一想到成为一出悲剧或喜剧里的演员,一颗幸福的种子落在了我的心里。想必我是万分激动的,可是,我们的脑子会玩诡计,我们会用面具、袜子、羽毛掩饰我们的情感。那是很有用的。觉得有点儿高兴真让人高兴。

我等着那女人睡着,这样我可以安静地离开。我迅速地收拾行李箱,把我的衣服装进箱子里,还有几件瑞玛的衣服,我可以把衣服带给她。我亲了亲那狗,道一声再见。在机场,我给医学院的导师打了个电话,就是去过我们那里,对瑞玛的反应非常奇怪的那位导师。我的意思是有点奇怪。我想问问他对瑞玛的看法,他是不是认为她有点儿“怪”。我尽量不显山不露水地问。但他对我说的是:“你过去就总爱嫉妒。现在你把你的嫉妒转化为精神胜利,以为所有的人都想要你所拥有的东西,陶醉在所有的人都想要和你老婆睡觉的快乐之中。你应该长大了。这样是不健康的。”

他的答复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一时冲动,这番话出自于他以前对我的看法。思维的习性是真相的死亡。我的思维超出了我的习性。他——他说错了。

16. 我和第三者通话

在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里,虽然精致的天花板给了我一种信心,但是我的行李箱(瑞玛的行李箱)还没有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的行李传送带上。机场值班员——一个瘦削的男子,脸上的皮肤布满了痘痕,头发略长,一个瑞玛似的鼻子,一件极薄的牛津布衬衫,透过那衬衫可以看到他的内衣——告诉我不要等了,明天早上再来,在这之前什么事都解决不了。

“箱子里有我重要的东西,”我说的是蹩脚的西班牙语,还带着口音。听起来好像我在谈论我的心情。这第一句西班牙语就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找不到比较准确,或者比较礼貌的话。

“我懂,”那值班员答道,彬彬有礼地撒谎。

“不应当开始追查吗?”

他重申我应当明天再来。“你的这个经历是很正常的,”他强调,然后越过我的肩膀,看着站在我后面的那个女人。

*

*

*

空着两只手,我动身前往市区。为了找到瑞玛,我制定了一个最直接、最有道理的计划:打电话给她的母亲。一个比较大胆的举动。我从没见过瑞玛的母亲玛格达,而且据我所知,她甚至不知道瑞玛已经和我结婚了。她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瑞玛与她母亲的关系很疏远,或者说她母亲与她的关系很疏远,或者她们两个人互相疏远。我真的不清楚这个事情,瑞玛没跟我说起

过。(瑞玛不提她的父亲,我从来没问过。我推测这是若干家庭变故中的一个。我不是那种鼓吹让沉默保持沉默的精神病医生,也不会把表白和亲密混淆在一起。)

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那个电话亭是学伦敦电话亭的模样,是玻璃和涂着红色油漆的金属框架的组合。走进电话亭——为什么阿根廷看上去那么不对劲?那些美女都上哪儿去了?为什么这里的建筑物看上去像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楼房?我从电话簿里找到了玛格达的电话号码——太容易了!然后我往玻璃上哈气,接着把哈气抹开,然后再往玻璃上哈气,再把哈气抹开,如此这般,我在被哈气涂污的玻璃上看到了一个失真的影像。当我举着不可避免地存有成千个陌生人的细菌的电话时,起码我有东西——我的失真的影像——可以看。

一个女人接的电话,我介绍我自己是“瑞玛的一个朋友”。

电话那一头,“什么?”

我省去众所周知的客套话,直奔主题,“听着,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告诉我您最后一次见到瑞玛是在什么时候?”

她问,“您是哪位?”

“我是利奥。我是一个朋友——”

“什么,”她声音焦虑地打断了我的话,“你问瑞玛?”

“我现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说,然而我想不起来要向玛格达打听什么;我只记得——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多么讨厌在电话上说话。“而且——”

“你知道瑞玛在哪里?”她问道。

“是啊,”我说,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点得意,“我相信,就在三天前我还见到过她。”

“在这里？”

“不，在纽约——”

“哦，是啊，是啊。这个我知道。你是美国朋友？”

“对，是的。”

“可你现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是的。实际上是在这个奇怪的红颜色的电话亭里——”

“那么，你是瑞玛的朋友，”她又说。重复似乎削弱了陈述的真实价值。也许瑞玛没有把我看做朋友。这是很可能的。“好吧，”玛格达接着说，这一回的说话声音像新鲜的香草，“你应该过来。什么时候过来都行。你应该马上过来。你愿意马上过来吗？我们可以来一杯咖啡，点心——”

“好吧——”

她给了我地址，描述了她家房子正面的模样之后，她的结束语是，“别担心那狗，”她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别在意外表，它是很可爱的，没有理由担心。”

每个人都有狗。

17. 固有的瑞玛

漫步走在玛格达居住的社区，一路上看到的狗，比我习惯于看到的狗要多得多。许多狗看起来没有人陪伴；一些狗和另一些个头差不多大小的狗在一起玩耍。散布在街上的这些狗好像是为了减少瑞玛的魂儿带回家的那条狗的原始线索而设下的圈套。但是也许——很可能——这里就是有许多狗。因此路上就有许多狗的粪便。有些粪便显然是被人踩过了。与这些粪便形

成对比的是，低层楼房墙面上新奇的涂鸦和阳台上的盆栽植物。当我几乎无法躲开一堆雕塑似的粪便时，我想到的是，现在住在我的公寓里的那只小狗是谁训练的。是某个已经死了的人？

*

*

*

不久，一个女人——蹬一双高跟鞋，一袭高腰的奶油色连衣裙，腰间系一条深蓝色的腰带——用手捧住我的脸，左右亲了两下。她身上有一股凡士林和爽身粉的味道。

“瑞玛，”我说。

“是啊，”她说，引起误解的确认。

“瑞玛？”我说。

“她来了？”她说。

“没有，”我说，意识到了什么。

那女人大声笑了起来。

还好，醉态持续的时间不太长。我很快清醒过来，进入了真实。这个女人虽然看上去比瑞玛年纪要大，但又不是大很多，这里除了容貌的关系以外，更因为她的头发比较整齐地往后梳，用一个宽宽的发夹夹住。她的眉毛修整得比较完美，嘴唇被涂成丘比特弓箭的模样，像四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她的身边站着一条高贵的长腿的灵缇犬。

“它的名字叫杀手，”玛格达大笑。抓住我的手，玛格达领着我走进屋里。这个家与我想像中的瑞玛孩童时期的家完全不一样——过道太窄，镜子太少，香料的味道太浓，而且不是百花香料的味。

我想喝什么，要不要来一杯酒，在把我一个人留在一个堆满

流苏靠垫的天鹅绒沙发上之前，她这么问我。每件东西看上去都很有年头了，天鹅绒上的绒毛稀稀拉拉的，像打着补丁似的。瑞玛大概碰过这些东西，我想，好像我打算采集指纹似的。接下来，我想起了瑞玛爱唱的一首歌里的一段歌词：我在你的口袋里，缩在一张钞票里，你的怀表链子绕在我的脖子上。我抚摸着光滑的沙发套子，想到了细细的灯芯绒条纹。

那灵缇犬趴在地上的织锦缎垫子上，监视着我。

玛格达端着一个托盘回来。托盘上有一个茶壶，两个巴拉圭大杯子，两个比大杯子小很多的盛着水的玻璃杯，一个盘子上堆满了曲奇饼，饼干上印着不同的几何图案，有些饼干外面裹了一层巧克力。她问我，“那么，你是瑞玛丈夫的朋友啰？”

我没说话。杀手把它的目光转向玛格达。

玛格达放下托盘。“Actualmente(西班牙语)？”她的意思是“最近”，但我听成是“实际上”。

我肯定没有把我自己介绍成是瑞玛丈夫的朋友，我是说我是瑞玛的朋友。我不知道玛格达是否知道瑞玛结婚了——大概她不知道。于是，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不得不泄露我可能不该泄露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个常见的“局面”，在我执业行医期间，我发现自己经常面临这样的局面，我在病人亲属的逼迫下泄露了不该泄露的事情。可是，这次与玛格达的会晤是很特殊的，很复杂的，因为我不知道到底什么事情是我不该泄露的，我只知道我正试图发现什么事情。我坐在破旧的天鹅绒沙发上，我的无知——对玛格达，对瑞玛——似乎具体到了我衣服上的味道，严格地说来，不是衣服脏，而是热过头了，衣服散发出它自己的味道。

那么，你是瑞玛丈夫的朋友？我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杀手——它看上去像是瑞玛魂儿带回家的那只狗的翻版，只是它的个头比较大。

“好吧，”我开始说。“好吧，好吧。没错，我是他的朋友，”我决定这么说。我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得不说出一些真实的情况，这让我感到很宽慰，因为继续一个谎话，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我就是这么认识瑞玛的。实际上是通过他。”这句话的真实性也还是有疑义的。我伸出手去拿我的茶，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是马黛茶，茶叶放在一个葫芦状的特殊容器里，冲下热水，插上一支银制吸管，小口地吸取茶水。瑞玛经常在家里给她自己泡这样的茶。虽然我知道南美洲好几个国家的人都喝这种茶，但我总是把那葫芦状的容器和银制吸管看做是瑞玛个人的怪癖。“不过，当然啦，”我说，嘬了一下吸管，“我现在，最近——实际上——也是瑞玛本人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马黛茶难喝极了，有一股袜子的味道。我的眼睛盯在堆得高高的巧克力曲奇饼上，过了一会儿我抬起眼睛望向那女人；茶几上的烛光把她的影子投射到天花板上，她的影子隐隐地罩在她的头顶上方。“我很想，”她说，“听听你对瑞玛丈夫的看法。”

我把我自己——我的全部——从谈话中抽离出来，只有几个细胞在听玛格达说话，而我的整个部分却专注于时间是不是过去得够久了，我能不能优雅地伸出手从巧克力饼干堆里拿一块饼干。“嗯，”我发现自己在说，好像那话在我心里形成了一口满满的井，“他很不错的，不是吗？”我开始朝曲奇饼移动，意识到我的半真半假的陈述已经与我的调查纠缠在一起了。

“我只见过他一次，”她说，没有看我，伸出一只手去抚摸杀手的头。“不过，说实话——我看人看得很准的，我是化验员——我不喜欢他，一点都不喜欢。”

没想到饼干里面还有焦糖，我忙着对付那柔软的焦糖，尽量做到举止得体。她是在说我吗？或者是在说另一个我？或者说的是别的什么人？我用袖子擦了擦嘴——没办法，她没有拿来纸巾——我擦嘴的时候，想起了你有没有爱德华的消息？——又是一首瑞玛常唱的歌，我想不起歌词了。此外，我过早地把饼干咽了下去，心脏一阵疼痛（当然啦，这疼源自于食道），我抹掉嘴边的饼干渣，恢复了镇静。口水争先恐后地向焦糖致意。“喔？”我小心地问道，“您什么时候见到他的？他长得很帅吧？”

这另一个丈夫知不知道那个瑞玛魂儿的狗，那狗就像是玛格达的灵缇犬的翻版？

“你可以告诉他我说的话，”玛格达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不在乎。这不是秘密，是我的感觉。我不是会保密的那种人。不会为这类事情保密的。”

“什么时候，”我又问道，“您说什么时候——您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没关系。你犯不着难为你自己，喜欢一个人没什么错，至少是未必有错，”她说。

“这狗跟您有多久了？”

玛格达仔细看了看我，或许是第一次仔细看我——或许我脸上也有饼干渣子——她似乎没认出我来。“你这样穿衣服，很少见，”她说。

“我？”

“你穿着厚毛衣。现在是夏天,你穿错衣服了。”

“哦,是的,气候不同。我来的那个地方现在还很冷。”

“我应该道歉,”玛格达说,把头发撩到肩膀后面。“为我的行为。我太无礼了,没有多问问你的情况,光谈瑞玛的丈夫了,让你觉得不舒服了。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主人,”她说着,孩子似的笑出了声,很开心的样子。“我去拿一点开心果来——”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她的影子吓了我一跳。

“不用了,这样就挺好的,”我说。

“你不喜欢开心果啊?”她问,在她那畸形的影子下伤心地噘起了嘴。

“噢,我喜欢开心果,”我说,显然是夸张的。

“那就好,”她说,再一次消失在过道里。

那狗决定不跟着她,留下来监视我。

太明显了,她在回避另一个丈夫的问题。

可是我也在回避,可能我关注的方向错了。多年以前,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患有黄疸病的病人,他从来不操心他的皮肤颜色和眼睛颜色的变化,却为了一颗微不足道的痣,焦虑不安地跑到了医院来。那个肤色变黄的男人,把他的担心转移到了毫无意义的症状上。在玛格达离开的那么一小会儿时间里,当我在担心开心果时,我想到了那个男人。瑞玛真的还有一个丈夫?或许她可以欺骗我,我以后会承认这一点的——我可以承认——但是,每天晚上睡在我的床上,瑞玛怎么才能欺骗他,他究竟是谁,阿纳托,或者不是阿纳托,我的意思是我的朋友?在我的心里——我知道就在我的心里——我听到了可怕的笑声。我又吃了一块饼干,接着又吃了一块,还没来得及把前面

那块饼干咽下去,我就又往嘴里塞了一块。

*

*

*

玛格达拿着一碗开心果进来,是那种染成红色的开心果。没等我说谢谢,她就开始说话了。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瑞玛了,”她说,“她每个月肯定会给我打一次电话,可是不给我她的电话号码,也不说什么正经的事儿,只是说说新闻里的事情,都是一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最近她说什么新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好像这些都是私人的事情。我不能说任何现实的事情,不能说任何私人的事情,那样的话,她会冲我嚷嚷,然后把电话挂掉。你一定认为我很厉害,所以她躲着我,其实事情根本不是那样的,我只是不会进行那些让她感到轻松愉快的谈话,我谈不来,那样的谈话对我来说太不愉快了。当你说你在最近还见过瑞玛时,嗯,我不想在电话里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因为我怕你会不愿意到这里来和我谈谈,你会产生一个可怕的错误的印象,那么我就会失去机会——”

我可能注意到了玛格达是哭着说那些话的。人们经常在我面前哭,因此我有很多机会去考虑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局面。我承认,在应付感情的事情上,我不是非常和气的。显然,你可以用胳膊搂住另一个人,或者伸出一只手,或者满怀同情地低声细语,或者干脆闭上嘴。站在专家的位置上,在上述那些选项里,我选择最缄默的那一项,我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哪怕就是一个单字也能将几滴眼泪转变为山洪暴发,而你肯定不想打开拦住洪水的闸门。于是,我默默地坐在那里,假装没有注意到那女人的——瑞玛母亲的——眼泪。我垂下眼睛,把目光移到

一边,好像玛格达没穿衣服似的。我这么做,是为了让她恢复尊严。当然,这是个下策。比起我来,狗儿能提供更多的安慰。不过,在这个策略里,还有这样一个效能,当你看着某个人哭的时候,能完全解除你想要做同样事情的冲动。

“你不是阿根廷人,”玛格达终于开口说道,清醒过来了。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那上面沾上了染在开心果上的红颜色。突然,我想到,她在哭的时候,我大概弄出了很大的动静:捏碎开心果的外壳,嚼着嘎巴脆的坚果,嚼掉沾在手指头上的盐。

18. 固 有 的 我

我从来没有,连一分钟都没有,认为自己是个气象学家。我不想让我实际上所做的某些让步破坏了对我所处的窘境的精确理解,除了遁入那种类似欺骗的创造发明,或者精神严重变态以外,我没有什么选择,这就是我的窘境。因此我才不怕费事地详细叙述我初次会见玛格达时的所有看似不相干的事情。我喜欢我在那时候受到的重视。想一想:我不知道我的瑞玛在哪里;我不知道要把我的真实身份向玛格达透露多少;我被一条陌生的狗监视着;再加上瑞玛另外有个丈夫这个没有预料到的、稍微有点无法接受的信息。更不用说:我的行李还没找到;我家里响起的神秘的电话铃声;我的病人离家出走了;有人声称是皇家气象学会的,表示要给我一个会员资格;一篇早年的气象学研究论文,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似乎在同我对话。除了这些之外,一个颇具姿色的女人在我面前哭天抹泪,而我穿着被汗水湿透的衣

服坐在那里，手上沾染了开心果的红颜色，裹在开心果上的盐把我的嘴角弄得生疼。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会不坠入第二次无伤大雅的、自我保护的谎言之中呢？

“对不起，你是怎么认识我女儿和她丈夫的，嗯，他呢？”玛格达问道，她已经冷静下来了。

我点点头，举起一根手指，好像是在说“等一等”，然后把更多的开心果放进嘴里，又呷了一口可怕的马黛茶，然后又吃了一块饼干，这是倒数第二块。不像瑞玛，我天生没有编故事的能耐。事实上，相当不会编故事，我几乎不会讲一段真实的奇闻轶事。除了提问题以外，我发现讲话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这就是在任何聚会中我总是第一个吃完饭的部分原因，因为每当被问及问题时，我的主要的拖延战术就是吃。

透过体内磨碎开心果的喧闹声，我听到玛格达在替我说话：“你是她丈夫的同事？你也是精神病医生？”

我发现自己摇了摇头——这个形体动作可以表示否定，也可以表示正往下咽嘴里的东西。没有几个同事是我喜欢的。

“不是？”她温柔地问道。

我发现自己在说话，在一个我想要取得她信任的女人面前；“实际上，我是气象学家。”紧接着：“是做研究的气象学家，”谎言的惯性驱使我接着说下去，“不是电视里的那些家伙。大家总是这么问我。”

我猜，在那一刻，我想到了茨韦·戈－臣，又没有想到茨韦·戈－臣。很简单，气象学家是第一个从我的脑子里浮现出来的职业。但是我想再次强调：我不相信我说的这些话。我从来没有打算过要说那些话。我大脑议会里的某个最难驾驭的成员

——然而，必须承认，这大概是一个具有洞察力的机灵的成员——偷偷站到演讲台上，说出了那些无法更改的话，大脑里的其他议会成员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护那张假脸的工作中去。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那时候这个谎话的效果还挺好。我采取的这一个手段，既维护了我的隐私，也保持了彬彬有礼。

“气象学。这很有趣，”过了一会儿，玛格达答道。“我以前认识一个气象学家，”她说。“在一次晚宴上。”说完这句话以后，好像她突然做出了什么判断——看起来是一个肯定的判断——她迅速站起来，坚持道，“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住在这里。在我把屋子租出去之前，你可以住在这里。你可以问瑞玛。什么都可以问。我肯定她会告诉你这里有多好。或许她会来见你。或许你打电话给她。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

19. 卷入噪声

我的确要好好地想一想。每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经常这样好好地想一想。为了好好地想一想，我走进了一家咖啡店。一个冷漠的漂亮的年轻女服务生——她的大拇指附近有一粒可爱的黑痣，她的腰像瑞玛的腰——给我端来了曲奇饼和咖啡，虽然我没有要饼干。并不是说我还要吃饼干，不必理会这个小小的变化，我在咖啡店里通常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免费的饼干——这让我有点儿意识到了我的处境，提醒我不要那么傻，不要只靠一种办法——同瑞玛的母亲交谈——来寻找瑞玛。我还有一条线索。我拿起一块饼干在咖啡里蘸了蘸，掏出

茨韦·戈－臣论文的影印件，开始浏览：此处（和其他地方）论述的数字模型被系统地阐述为初值问题，一个给我带来麻烦的词组，因为我压根儿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初值问题——好像我可以推测出来，然而我的推测看起来都错了。于是，我把那篇论文——那一篇里没有图像——抽出来，放到一边。在我和瑞玛的关系中，从“初值问题”中延伸出来的隐喻会是什么呢？我继续读下去：非弹性方程初始化的方法；关于使模型与观察数据相吻合的推论。“非弹性”让我想到了精神病的脆弱性。我接着读下去。建议采用一种算法，联合运用云动力学方程和观测到的风力，由此密度和气压波动的唯一的确定将是可能的。波动。是的，这个词似乎是对的。“唯一的确定”，一个必须接受的爱情的价值观。但是我知道，我的脑子急于从中领悟到命令，所以在承认任何真正的和谐一致以前，我不得不一丝不苟——要不然我就会像从《纽约邮报》里看出气象学会的命令的哈维那样了。还没有任何东西能像那幅图像那样让我大吃一惊的，那幅像大拇指指纹的图像来自那篇关于恢复理论的论文，恢复——它是那么的精确，那么的直截了当，那么的坦率——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不把波动仅仅看成是与表面上有关的东西。在第三篇论文的中间，语气和内容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可否认这是一条线索的信号。这篇论文从阐述数值预测模型开始，然后，突然写道：声称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只是现实世界的图像，柏拉图显然是第一人。很明显，在一篇雷达气象学的论文里，这是一个没来由的句子。求助于古人，嗯，求助，对，但是把这种华丽的辞藻，悄悄地塞进这样一篇文章里是相当不寻常的；显然它暗示着什么事情；如果硬说那么做是有别的原因，这是很傻的。为什么要

用“显然”二字？在这一段里还有，构造了用于预测的数学理论，高斯显然是第一人——这个理论讲的是，我们观察的不精确妨碍了对未来情况的精确推断。又是一个“显然”。在用渗滤壶煮咖啡的噪声中，我继续读下去：在高斯的研究工作中，把观察和模型结合起来预测一个天体的轨道——这使我想到了提及瑞玛时的一个相当不恰当的方式，尽管我立即因为我的一根筋而责骂我自己，但是我想大概有数不清的天体，它们的运动需要受到跟踪，然后我进一步考虑“气象学”这个词。气象学首先必须要提到流星的研究，研究从天上掉下来的物体。

茨韦的文章继续写道：大气模型在计算上是非常复杂的，迫使人们去寻找要求不那么高的、非最优化的近似方法……精确的研究途径需要给一个秩约为 $10^5 \times 10^5$ 的矩阵求逆，但是矩阵是稀疏的，因此许多计算法，从理论上讲，是可以并行运行的。非最优化的近似方法。计算上的复杂。矩阵稀疏。这些词汇开启了我意识里的某段音乐，某个时间段，但还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大规模并行运行的超级计算机的发展（比如，一千台克雷超级计算机协力工作）可以——

突然，我的黑莓手机响了，我想都没想，甚至都没有查看一下是谁打来的——我糊里糊涂地迷失在一千台克雷超级计算机里了——我就接了电话。我在接电话时，一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猫迅速地瞥了我一眼，就跟那个腰像瑞玛的女服务生一样——它很漂亮，异乎寻常的漂亮。一个坐在柜台后面的男人，穿着一件绿色的足球运动衫，运动衫的后背上印着白色的数字9，他也看了我一眼，我不由得低下头，看了看我的鞋，那上面有一层米色的尘土。我觉得，当我沉浸在茨韦的那些文字里的时候，

好像每个人都在观察我,就好像在一个四面墙上都是镜子的大厅里,或者在一千台克雷计算机的屏幕上,我看到我自己在繁殖。不过,我认为这只是个透视的问题。

“喂?”我对着手机说。

“喂?”

“喂?”

“喂?”

我不知道我在和谁通话,但是我心里充满了激动,什么都还没想就激动了,而且我看到了图像——灯芯绒的细条纹,油墨刷子般的前刘海,脚面上青蓝色的血管,黄色羊毛衫,马黛茶,弄脏的报纸,一个滑轮,脖子上的青筋——一个名字浮了出来“瑞玛”。

“我想你”突然从我的嘴里冒了出来,来不及思考,来不及盘算。对一个你不知道她是谁的人说我想你,这很可笑。“你在哪里啊?”

“利奥,我在我们的公寓里,你在哪里啊?”

她的话使我崩溃成了小一号的我,成了一个可知的号码,成了一次不愉快的晚餐。我走到外面,站在一棵桉树下,继续我的谈话。

“瑞玛,我爱你,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爱你——”

“我也爱你——”

“爱其他的人其实就是爱你,现在我明白——”

“利奥,你在哪里呀?”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

“你什么时候离开的?”

“是不是他们强迫你离开的，或者是你跟着他们一起走的，因为你知道你不得不走？我没有碰那个女人。”

“利奥，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谁都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也不接电话。你扔下你的病人不管。你不认为这很奇怪吗？你不是有心事吧？”说“有心事”，而不是说“烦恼”，这是瑞玛的语言，除了在非常累的时候，瑞玛早在几年前就不犯这种错误了。我说：

“你是带那条长腿狗回家的女人吧？你就是那个女人吧？”

“你心里不舒服——”那声音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带回家的其实不是灵缇犬。”一道阳光移到了我的头上，我觉得头脑清醒了。“而是看着像灵缇犬的小狗。就像玩具小狗。和我说话的人就是你吧？带着那条小狗的女士？”

“你是和什么人在一起吗？”

“你做的事可不够礼貌，”我心虚地说道。“把一条狗带进别人的家里。万一那狗有病呢，或者有虱子。它可能会让我生病的。”

“利奥，我真的希望知道你在哪里。”那女人吸溜着鼻子——人人都含着眼泪——这个样子根本吸引不了人。“你现在在哪里？为什么呀，”她哽咽着说道，好像噎住了。我得承认，真的动了感情。“我只是觉得心事太多了。”即使她不是瑞玛，我也应该尽量对她好一点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不喜欢那狗。

“如果你想要哭，”我对她说，“你就哭吧，绝对没问题。”

“你撒谎，”她说，呜咽起来。“你讨厌我哭。”

“不过，真的很对不起，”我说。我为什么要那么说呢？好吧：有时候我闻到了一股瑞玛常用的洗发香波的青草香味，但那味道却是来自从我身边走过的另一个女人，那时候我心里就会

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我听到电话里的那个声音，也是这种感觉。我发现自己在继续说，“不光是你，其他人哭我也是这样。玛格达哭的时候，我也不知如何是好。”提到玛格达的名字是个错误。即使我是在和真正的瑞玛说话——声音听起来像是她，显然我的一部分的确愿意相信那是她——这样的泄露很可能是个大错，因为家庭问题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最好是别沾它。

我说的话果真让那女人停止了哭泣。“你什么时候和我妈妈说过话？”她问，干瘪的玉米穗的声音。

我突然觉得口干舌燥，觉得浑身发冷，即使在外面太阳底下站着，还是觉得浑身发冷。“我不一定非要把我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吧？”

“你跟她都说了些我的什么事？”那声音问，不哭了。

没什么事可说的，我没说话。不管怎么说，除了提到我是个气象学家，我跟玛格达的确没有说太多的话。“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我说。这是一句没有意思的客套话，是它自己兴冲冲地从我嘴里跑出来的，什么意思都没有。玛格达也许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也许不是，但我没有心情去注意这种事。与我透过窗户看见的那个腰像瑞玛的女服务生比，玛格达肯定不如她有魅力。那女服务生的确很漂亮，美得让人心烦意乱。

“她喜欢你吗？”那声音问。

我没说话，看着那个腰像瑞玛的女服务生擦桌子。

“她高兴吗？”那声音沮丧地轻轻问道。

我还是没说话。

我的脑子随意地找了一个叫阿莉斯的名字来安慰它自己。说是随意地，但也不是真的那么随意。我想起来了，当我坐在玛

格达的起居室里的时候，浮现在脑海里的那些瑞玛喜欢的歌曲的片段，是一个叫《阿莉斯》的唱片集里的歌。“听着，”我终于对电话里的那女人说，“对于发生的这些事情，我真的感到很抱歉，不过我最近一直有一点压力。我一直在忙着一件相当紧急、相当重要的工作——”

“你给我留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纸条——”她开始说，我把电话从耳朵边拿开，“——如果你说没有别的女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利奥，你的脑袋撞在什么东西上了？是不是——”

趁着那女人太过荒诞的哀诉出现一个停顿时——我眯起眼睛看着阳光，假定此刻她正站在寒冷的北半球瑟瑟发抖——我问道，“你那里在下雪吧？”然后冲动地说，“要知道，这里可是夏天。”

“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我妈妈在一起？”

我不看窗户里的那个女服务生了。“你知不知道，”我继续说，觉得另外有一个声音从我的气管里爬出来，“只是讨论一下当前的事态，别说什么预测未来，是不是计算上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要解决它，哪怕只是大致上解决，也需要一千台克雷协力工作？”我说着，同时注意到错乱的图像突然大量出现在我头脑里的雷达屏幕上，说它们错乱，是因为我虽然明明知道克雷指的是超级计算机，而我却把它们想像成上千只长脖儿鸟。伸长它们的脖子？克雷是一种鸟？或者我想到的是鹤？像苍鹭？“忽略了，”我接着说，“预报工作，连临近预报都是不可能的。”当我听见那个假冒瑞玛的说话声音时，出现在我脑际中的一连串瑞玛的图像是正确的吗？或者莫名其妙地错得很巧妙，一系列错误的图像已经开始了消灭我的真正的瑞玛的真正的图像的过

程？如果我描述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的脸，会怎么样？为了使我所拥有的图像不致变得苍白，根本什么都不看，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不管怎样，我想到了，也许有关克雷计算机的知识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当今计算机的功能比过去要强大得多；大概这样的计算现在可以实时进行；茨韦的想法不是已经变得多余，就是始终是多余的。他的想法已经成为一种方法，一种用来暗指别的什么事情的方法。一种密码？或许我产生过与茨韦·戈－臣联系的想法。所有这些想法以不确定的速度，从不确定的方向涌入我的脑子。在嘈杂的电话声中，我默默地和自己争论，与茨韦·戈－臣联系是很荒谬的，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不是那种相互的关系。我们是被连接在一起了，是的，但这样的连接仅仅是出自我的目的，而且是以一种稍微有点想像的方式，将我和他连接在一个构想出来的世界中，连接在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世界中。别变得形而上学，别过度地用隐喻，我默默地警告自己，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还在絮叨。我提醒自己，只有哈维相信那个骗局。事实上，茨韦和我互相不认识。

“我们可不可以明天再聊？”我请求道，尽可能地有礼貌，给出了具体时间。

“如果我说可以，怎么办？”那声音说。“如果我说我知道预报和一千只小龙虾^①的事情，怎么办？你有没有拿走我的衣服，利奥？有没有拿走我的钱包？你知道，有许多电话——”

我开始有一种特有的紧张的感觉，好像一个不该有的想法正稳步朝着周期性偏头疼前进，有一种上涨的水灌进了肺里的

① 克雷计算机(Cray)和小龙虾(cray)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

感觉。于是,我挂断电话,彻底地把黑莓手机关掉。这么做是最恰当的。我得回到咖啡店里去:那里有女服务生,那里的灰尘在自然光线里闪闪发光,像无数颗最小的流星。

我向那腰像瑞玛的女服务生要了一块苹果馅酥饼。酥饼的味道像是真正的苹果的味道,而不是苹果香料的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我看来,这倒使得酥饼的味道像是人造的,因为我知道我小的时候苹果的味道,而且喜欢酥饼包在塑料纸里的样子。

20. 以数据配平方程的最小二乘法

我几乎是跑着回到玛格达的家。她热情地接待了我,并领着我看瑞玛的照片——她家的过道是个名副其实的画廊,我边看边哼着瑞玛喜欢的曲子。瑞玛裹在一件婴儿洗礼长袍里,两只大手将她举起来,看不见托着她的人。在沙滩上,瑞玛出落成肤色浅黑的女子,坐在一个沙坑里,穿着绿色和蓝色的比基尼。一张黑白照片的背景就是这栋房子,小瑞玛站在前门的台阶上,光着脚,手里拿着一双拖鞋。年纪稍大一点的瑞玛,看上去很无聊,或者是很生气,在嘉年华会上,一个镶着小亮片的假面具推在前额上。瑞玛第一次领圣餐,穿着淡蓝色的衣服。穿高跟鞋的瑞玛,迷人的发型,坐在一辆拖拉机的顶上,两腿交叉,眯起眼睛,看着一边。瑞玛穿着暗红色的学位袍,闪光灯打在她的脸上,显得脸色很苍白,她的头上戴了一个满天星发饰。瑞玛坐在摇椅上,一条浑身長有斑点的灵缇犬蜷缩在她的大腿上。

只是:这些照片似乎是其他的瑞玛们的照片。我不知道瑞

玛年少时的样子。但是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而且不知道拿这个不安的感觉怎么办;我不知道这种不安是不是一种普遍的每天都会有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那里面没有瑞玛的结婚照。

没有男人。没有一张照片里是有男人的。

“只见过一次,您说的,”我对玛格达说。“您只见过一次她的丈夫?”我问道,尽量显得很随便的样子,好像我的问题是个最不具有好奇心的问题。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看上去像是那种会发胖的美国人。他是不是发胖了?我可以从他的下巴上看出来。”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不知为什么希望她说的不是我。然后:“我想跟您租一间屋子,”我脱口而出。

她紧了紧拢到脑袋后面的低垂的马尾辫。散发出一丝柑橘的味道。“我一般是一个星期收取二百七十比索,”她说,脸涨得通红。“不过,我把你当做客人,当然——”

“不,当然不可以,”我打断了她的话。

我们俩都觉得(可能是我自己那么想)比较尴尬,更加觉得空间狭小。

*

*

*

之后不久,尴尬的问题又冒出来了。我问去机场的最佳路线时,向玛格达提到我的行李找不见了,她说,这么说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模棱两可地耸了耸肩。或许我脸上流露出了如丧考妣的表情,但是我真的——至少在那个时候——没有想另外的那个丈夫,没有想那个夜班护士,甚至连瑞玛都没有想,我

只是在想我的行李箱,实际上是瑞玛的箱子,那箱子是淡蓝色的。玛格达把手放在我的后背上,她的触碰是那么温柔,令人感到宽慰。这样的触碰很容易营造出一种家庭生活的气氛,产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别的任何东西能精确地复制出来的,除了那个患有自闭症的女人为了让奔赴屠宰场的牛儿们安静下来而设计出来的拥抱机器之外。玛格达递给我一块手绢。她静静地在我身边站了一会儿,也许是好几会儿,然后挽起我的胳膊,坚持要借给我几件衣服。她说,她有一些非常好的男装,而且她确信那些衣服和我的尺寸大小差不多。

“真的不必了,我没事儿的,”我说。

“不行,”她说。

我再次婉言谢绝了那些衣服。

“外面天气这么热,”她说。“你还穿着冬天的衣服。起码今天晚上你有衣服换了。还有明天早上的衣服。”

我接受了她的好意。她打开了一个里面几乎是空的衣橱,衣橱推拉门下面的轮子已经生锈了。衣橱里面:衣服挂在铁制衣架上,衣架外裹了一层塑料皮,像是干洗店的衣架。浅色的薄衬衫上缀着按扣,按扣的外面镶了一圈窄窄的花边。考究的裤子别在裤架上。一个小抽屉里有内衣和袜子,一个鞋拔子,一个眼镜盒。那天晚上,吃完一顿非常晚的晚餐后,我很想知道玛格达为什么会有男人的衣服。那些衣服可能是谁的。又一次想知道瑞玛的另一个“丈夫”是谁,或者瑞玛的曾经的“丈夫”是谁。这可能与她的失踪有关,或者与她的替身有关,或者与我有关。我承认,我不完全清楚我的调查应该在哪个方向着手进行。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穿上那些衣服竟然是那么合身,连裤子都是那

么合身。这既让我感到吃惊,也让我感到不快。

我穿着另一个男人的衬衫睡觉。

21. 一件神秘的事情解决了

我必须承认,用区区小钱租了玛格达的一间屋子让我松了一口气。尽管如此,一刻不停地想着我的不定期的回程机票搅乱了我的睡眠。可是当我成功地摆脱掉我在购买机票上挥金如土的想法后,我就着手反思我的小气吝啬。接受如此便宜的价格,我担心,我占了我妻子的母亲的便宜。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天早上,我一边吃玛格达送来的早餐——咖啡和牛角面包,一边看报纸。我有点鬼鬼祟祟地浏览报纸上的广告,这样我可以判断出我付的租金是否合理。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因为我看不懂缩写字母的含义和地址编码。

在离广告栏目不远,在小报的最后部分,我偶然发现了看上去像是七十年代的肖像照(长发,瘦长的脸,有色眼镜,艳丽的印花布衬衫)像广告那样分别放在画着花边的框子里。在那些照片的旁边是姓名和当天的日期,只不过年份不同:一九七七,两个一九七九,一九八一。然后是类似这样的短句:你的奋斗依旧令我们感动。你活在我们的心里。

看着这些照片,让我想起了戈一臣的全家福照片。一看到那些照片我就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熟悉的感觉。我花了好一会儿时间——神经元的触处得行走在一条非常迂回的小径上——才意识到,这些照片不光是七十年代末期的怀旧照片,几乎可以肯定是阿根廷的失踪人员的照片,在失踪的周年日刊登出来。

自从“肮脏战争”^① 结束,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觉得“肮脏战争”这个专用名词是对大屠杀的太过于委婉的说法,“战争”这一个词误导人们以为政变上台的军政府的偏执性幻想是真的,不过这是另一个时期的问题)。我承认,我没有想到战争带来的创伤依然是那么明显地存在着。现在我明白了,我不该感到惊讶——以我的经验,我是指专家的经验,我特别不应该感到惊讶。深陷在个人的悲剧中,人们自然会患上重复症,这种重复症对谁都没有好处,对活人没有好处,对死人也没有好处。我指的是,我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经常不断地想到死人,不单单是有效地运用时间的问题。不是我冷酷无情,对于我必须这么说,我深感抱歉。我知道,从某种立场上来看,乐观的精神具有超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冷淡、不在乎的性格有关,对于真正的永恒的爱来说,这种力量让人感到不舒服。可是让活人与死人共同葬身在柴火堆里,难道这么做就更好吗?诚如我曾经所写的,“丧失亲人的哀痛是致命的。”而且我认为,值得考虑一下,为什么纪念死者的文字都是那么令人难过,为什么那些文字在表达丧失亲人的心情方面是那么失败。至少我认为是完全失败的。那些含糊的、诚恳的话似乎是那么卑微,那么不像话,就像陌生人听见你上厕所的声音。

看着这些纪念的文字,所有的文字旁边几乎都附带着一张模模糊糊的照片,像是把一个个具体的孩子烫到了T恤衫上,我觉得恶心。为什么恶心取代了……嗯,悲伤?有些笨蛋精神

① “肮脏战争”(Dirty War, 1976—1983),阿根廷历史上的一段时期,阿根廷军政府镇压左翼持不同政见者。有人权组织称,这一期间阿根廷至少有一点五万至三万人因遭到绑架、暗杀而“人间蒸发”。

分析学家会这么问我。当然是悲伤,但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觉得恶心,我觉得偏头疼又要开始了,我想说的主要就是这件事。社会或许应该比较认真地考虑不谈论丧失亲人的应对机制,至少不要公开地谈论。我认为,有效的应对机制应该净化杜撰的痛苦。我知道,在我的领域里,我的这些观点是异端邪说。但考虑到我的同仁们,我并不为我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感到羞愧。

我听到其他人的说话声音,也许是我的一些同行,指出沉默是健康的奥威尔^① 自然法则。我的应答是:好吧,我们不要用格言来讲话。或许从政治层面上讲,是的,国家应该记住他们,世界应该记住他们,但用不着非得记住个体的受难者。让受难者们走吧。在任何忧伤抓到他们之前,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死去的机会。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如果瑞玛,这么说吧,已经死了,而不是失踪,那么,我就不会没完没了地去想这种解决不了的痛苦。无法解决的神秘的事情应当让它静悄悄地过去。如果瑞玛死了,我一点儿都不会去想她的——至少,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忠告。现在我要面对的是,瑞玛的失踪是个近乎难解的谜,但不是真的难解,不是真的没有解决希望,这就是我允许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因为有希望。

*

*

*

我坐在玛格达的对面,穿着她借给我的七十年代的淡绿色尖领衬衫,读着报纸上的分类广告和纪念栏目。我吃了两个,然

①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

后三个牛角面包，咖啡喝得太快了，强忍住不让自己打出嗝来。我打算向玛格达打听纪念栏目是“规定”的，还是常常能见到的，就在这时候我注意到她凝视着我穿的衬衫的袖口，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意识到，我对我要问的问题并不感兴趣，我还有其他更紧迫的问题要问。

我张开嘴。

这时我的黑莓手机——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颤动起来。

玛格达举起一只手按在胸口上，好像警报器响了，被吓了一跳似的。

“这不是瑞玛，”我突然说，大概很唐突，我不知道为什么。

“哦，不是，当然不是啦，”她说，然后接着说，“请吧。”朝正在振动的黑莓手机做了个手势。“不要拘束。”

这是一封标示着“紧急”字样的电子邮件。我已经为这些有“紧急”字样的电子邮件设置了程序，就是在手机关机的时候，它也会响，当我的病人被送进医院时，我通常会收到这样的电子邮件。

玛格达把头转开去，拿起一块曲奇饼，放进茶杯里蘸了蘸，期待地看着，好像等着看看这块饼干是不是会碎了。

这封紧急的电子邮件是哈维发来的。

亲爱的利奥医生，

我给戈－臣博士写信，报告对抗49位量子教父的工作进展。

我还没有得到他的回音。

你有没有他的消息？我已经发了三封信给他。

我在俄克拉荷马中部，买不到《纽约邮报》。这里的国家强风暴实验室是不设防的。

请把戈一臣博士的电话号码传给我：紧急。

——哈维

我低下头看着两只手，报纸把手指肚弄脏了，触碰到了黑莓手机的屏幕，留下了一个指纹。我抬起头朝玛格达望过去，注意到她已经化上了浓妆，这是早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不该感到惊讶的。粗粗的眼线使一个女人看上去非常动人。虽然有浓妆的遮盖，我还是可以看见她眼睛下边细碎的皱纹。她的脸颊上有一抹微微发亮的红晕，好像筛上了一层细小的沙粒。

“谁的电话？”玛格达问道。

“有没有失踪的人又出现的事情？”我问玛格达。有那么一会儿她没有理睬我，好像我不是在跟她说话，而是在跟我的手机说话。“对不起，”我说，其实我觉得应当她对我说这句话，因为她的粗鲁无礼。“我正在想报纸上的这些纪念照片。”我不打算让她知道哈维。“我是说，那些照片，知道吗？我只是好奇，会不会有人可能被认为是失踪了，但他其实只是离家出走，可能是精神失常了，可能是一时的记忆缺失。可能一天以后，可能几年以后”——我一直说的是“可能”——“那些人突然回来了，或者被找到了。我听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错误。知道吗，最近我在另一份报纸上看到，在苏格兰的一个小渔村里，发现一个无名的流浪汉在小教堂里弹奏音乐大师德彪西的钢琴曲；我认为那人说的是德语；问他的名字时，他说不记得了；消息传出去，好几百人——严格地说，是大约几百人——都说，他们确信他们知道他是谁；他们来看他，希望找到他们失去的兄弟，或者孩子，或者朋

友——”

听到这里，她打断了我的话：哦，真的吗？我认为她的反应是不耐烦的敷衍。我觉得一股热气涌到脸上，我还得接着说下去：

“有人可能是对的。有人可能找到了自己失踪的人。”

我在说类似这样的故事时，努力不让我自己盯着玛格达动人的妆容看，努力不让她提出与我刚收到的电子邮件有关的问题，因为我还没有把故事编好。

不过：起码有一件神秘的事情开始露出了端倪。哈维没有死，他在俄克拉何马。

22. 可能性最大的方法

有一段时期，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关心精神疾病的人都会得精神病，在哈维的消息传来时，那个念头——有传染性——从过去伸出了它苍白的手碰了碰我的头。

我考虑与茨韦·戈－臣取得联系。

哈维居然已经去接触他了，或者至少试图去接触他。

可是，我们谈论的不是同一个茨韦·戈－臣。这就是我与哈维完全不同的原因。

玛格达朝我的空咖啡杯做了个手势，我吓了一跳，朝我的黑莓手机做了个手势。

“是我的一个同事，”我说，尽量显出很随便的样子，朝咖啡杯点点头，玛格达又为我续了一杯。“谢谢您。”

“她没事吧？你的同事没事吧？”

“是个男同事，”我说。“没事，没事，当然没事。他很好，比好还要好。”

玛格达又坐下来，用两只手捧着杯子。她的手——比瑞玛的手显得老多了——很瘦，十指尖尖。

“我这个同事，”我说，试图让玛格达，或者实际上是让我自己，放松下来。“他就喜欢把最好玩的消息发给我，总是这样，”我笑了笑。事实上这是哈维发给我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我总是能从他那里收到最精彩的电邮，”我说。事实上，除了瑞玛，我没有别的朋友会给我发精彩的电子邮件；我的电子邮件都是业务方面的，很沉闷的。“他很会逗大家开心，”我继续过度发挥，编织谎言。

我把报纸叠起来，像叠洗好的衣服那样。我清了清嗓子站起来，不顾玛格达的反对，收拾起桌上的盘子，然后开始洗盘子，玛格达要我停下来，她说我拿错了洗盘子的海绵。

我告诉她，去机场办完事以后，剩下的时间我要去大学，好像那是搞研究的气象学家每天该去的地方似的。

“哪一家大学啊？”她问我。

我不知道。于是，我只好说，“再次谢谢您的早餐。”然后，走了出去。

23. 不是瑞玛编造的托辞

我给机场打电话，电话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很有把握地告诉我，我的箱子已经找到了。我花了很多钱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但是他们拿给我的箱子连颜色都不对。我的箱子——瑞玛

的箱子——是淡蓝色的，婴儿蓝。他们拿给我的箱子是长春花的颜色，我猜，有的人管这种颜色叫蓝色，有的人管它叫紫色，到底是什么颜色，这两大阵营都会不遗余力地坚持他们自己的主张，瑞玛和我经常将这个问题看成是黑和白的问题，曾经为此争论过。可是他们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想，长春花的颜色是不是在所有的文化里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不是在有些文化里，很多事情要依据蓝色到紫色的光谱来区别，以至于发展出了非常复杂和精确的语言呢？

总之，这是一次质量极差的交流。

我往回走，走进那腰像瑞玛的女服务生工作的咖啡店。女服务生不在。站在她位置上的女服务生也很漂亮，但没她那么有魅力。我要了一杯咖啡和曲奇饼，确定了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答复哈维的电子邮件，在这个答复中要适当地提出挡在我和戈－臣博士之间的障碍物。

在这之后，我可以（我告诉我自己）头脑清醒地回到最重要的事情上来——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出来这两件事的关系——寻找瑞玛。

我拿起笔，开始写了起来，事先没有想好打算说什么，只是希望会有一个主意找到我的头上来。以下的文字是我亲手写下来的：

亲爱的哈维，

很高兴地获悉你的工作做得很好。

有一些新的情况：茨韦·戈－臣和我被调到不同的军团，再也不能直接联络了。我只能把新的情报呈送给我的长官，他会与他的长官联络——可能——然后他的长官或

许会决定与他联系,不过没有人能够确定。你不应该再试图与戈-臣博士取得联系。谁知道情报是否能送出去,以及什么时候送出去,或者情报是否会被拦截?我们必须始终对49位量子教父保持高度警惕。

这些乌云不会投下阴影,它们会撒下光明。

我会有一段时间不去我的办公室,时间多久还没定,不过请保持联系。

利奥医生

极其做作。很不可信吗?我为什么要用“军团”那个词?为了强调军队的介入使我的处境变得很为难。要是瑞玛帮忙就好了,她会编出一些让人不得不同意的理由来。

我吃着一块曲奇饼——淡淡的杏仁味——考虑是否要把我的回信输入到手机里发出去。我把信发出去了。很快,哈维给我发来了一些相当惊人的消息。

24. 一九九〇年,茨韦·戈-臣发表了 《干线混合层能产生浮力吗?》

穿着借来的衣服,我坐在南半球瑞玛家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那腰像瑞玛的女服务生不在,写给哈维的那封拙劣的回信已经发出去了。时间以不确定的速度移动,太阳光连绵不断地从窗户外面涌进来,我的后背渗出了一层挺大的汗珠。在某一个时刻,我低下头看了看略微有点反光的黑莓手机的屏幕,我看到了——除了我自己的畸变成猩猩模样的前额之外——哈维的回信,不太好的回信。

他把一封来自 tvzi@galchen.net 的电子邮件转给了我。

亲爱的哈维，

谢谢你的赞美。对不起，我把给你的回信发到了你电子邮件的信箱里，没有用普通邮件的地址；我知道，你说你很担心，不过请你放心，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电子邮件作为通信的一种方式是非常安全的。

按照你的请求，首先允许我说，作为一个为皇家气象学会秘密工作的中尺度技术员，你全身心地倾注于你的工作，对此我并不怀疑。出于这个和其他的原因，我同意你的意见，就你的任务而言，你的确应该享有更多的自由。是的，纽约会变得很沉闷，特别是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说。我也喜欢平原地区的强风暴季节。总之，从现在开始，把你自己做是有自治权的；我（和我的长官，必须隐其姓名）完全相信你的判断。

再次感谢你在大气压力下的艰苦工作。

茨韦·戈－臣博士

又及——对了，请向利奥医生转达我的敬意。

一丝微风吹进咖啡店。我抬起头，看到一个秃顶的老头走进来；我拿起放在面前的鲜榨橘子汁，抿了一小口；然后不知怎么搞的，我把橘子汁的玻璃杯碰倒了，果汁在桌子上蔓延开来，果汁里的橘子肉洒在桌上，像用马赛克拼出的图案；那腰像瑞玛

的女服务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手里拿着几张印有淡蓝色条纹的白色纸巾;她身上有一股宝宝润肤油的味道;我用纸巾轻轻沾去黑莓手机屏幕上的果汁,但是还有小片的果肉残留在上面,看上去像是把从脸蛋上刮下来的细胞抹在了显微镜的玻璃载片上。

但是在那些细胞的下面,茨韦发给哈维,然后哈维转给我的电子邮件依然没有改变。

咖啡店的门关上了;微风似乎从来没有进来过;那个秃顶的老头已经找到座位坐了下来;带着汗珠的后背上依然还能感觉到一阵寒意;那腰像瑞玛的女服务生又消失了。

回想起来:在我生命的那段时期里,我知道的那个茨韦·戈-臣其实是瑞玛。瑞玛,瑞玛,瑞玛,瑞玛。这个茨韦的语言似乎不像是瑞玛的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封信看起来像是个线索。把文字输进我那个沾上了橘子肉的黑莓手机,我觉得这不安全,不过我在口袋里找到了一张旧的,非常旧的收据,于是在收据的背后写下了下面这些疑问:

没有名字的狗?

阿纳托?

皇家学会?

瑞玛的丈夫?

茨韦·戈-臣?

然后我把收据折起来,折了好几次,折成一个坚实的小纸块;这样我把手伸进借来的裤子的口袋里,可以在又长又窄的口袋里摸到那个纸块的轮廓;我想像着,那个小纸块会帮助我坚持

我的想法，坚持我的搜寻。

25. 拙劣的告发

“你在这里啊，”一个声音说道，我抬起头，想了一会儿，是瑞玛，还是那腰像瑞玛的女服务生，可是这既不是那腰像瑞玛的女服务生，也不是瑞玛。是玛格达，在咖啡店里的玛格达。

“是啊，我在这里，”我说，突然有一种孩子逃学被抓住的感觉。在我想起来邀请玛格达坐下之前，她大概在我的桌子旁边已经站了好一会儿了。她没有拒绝我的邀请，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坐了很久，我摸着口袋里那张承载着线索的收据。我扮演气象学家，这是一个坏的开端。

玛格达向潮湿的黑莓手机点点头，打破了寂静，语气尽可能平和地说，“那是新东西。”接着说，“在今天早上之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是啊，这是一种新玩意儿，”我说。

“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又说了一遍。

“不过，这东西是很普通的，”我说，决心用这个小小的电子玩意儿掩饰我没有去大学的骗人的解释。

然后，又安静了下来，起码在我们两人之间是安静的。我想，店里还有其他的声音——大概有蒸牛奶的声音，刀叉叮叮当当的声音，翻动报纸的窸窣窸窣的声音——但是我没有注意到。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玛格达问道。我没有主动提供我的猜测，我不敢猜。“瑞玛的头发，”她说。“我在想，她现在留的是什么发型。”

我一定是很奇怪地看着玛格达(不是因为她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的手摸到了那个皱巴巴的线索,我在心里跟我自己详细叙述茨韦和哈维的事情,以及其他所有的事情),因为玛格达开始解释,“我们过去常常因为她的头发吵架。她几乎不梳头,就让头发垂在她的脸上,你看不见她那张可爱的脸,她把自己弄得很粗俗。这是主要的冲突,我们俩之间的。她真的把她的头发弄得很难看。”

我小心地说,“她现在的头发看上去很漂亮。”总算有机会说一些真话了,但是不像我想的那样能让我松一口气。我咳嗽起来。仿佛瑞玛的玉米穗般的头发在我的气管里拉上拉下。

“那么,现在——嗯——现在她留的是什么发型?她看上去漂亮吗?”玛格达问,转动着眼睛,嘲弄地笑着。我想,她是在笑她自己,不是在笑我。

“她很漂亮。瑞玛很漂亮,”我对玛格达说,但是——我刚想起来——我怀疑,我简直是在告发我自己。

“我闻到了橘子的味道?”玛格达说。

我说,“对不起。你会喜欢她的头发的,我认为。它现在的样子,非常整齐,颜色很漂亮,金黄色的,像玉米芯的颜色。她总是梳一个很低的——”我用手势比划了一个马尾辫。“用一个金黄色的宽发夹夹住头发。头发很长,但很干净利落。夏天的时候,她用精致的小发夹把头发别在后面,那些发夹不是黑色的,跟头发的颜色是一样的。但还是有些松散的头发没别住,她把那些头发的颜色染得特别浅,或许她故意要那么做。我妈妈过去常用柠檬汁那么做,就像那样只染一点点头发。”我的手指肚放在黏糊糊的桌面上,看到印在那上面的螺旋形的指纹,看起来

就像茨韦的研究论文里的那幅图像。“多少有点儿像那样，不管怎么说吧，她的头发就像那样，”我立即接着说。“我的意思是，我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瑞玛，谁知道她平时是怎么弄头发的。”

“你爱她，是不是？”玛格达问道。

我把手指肚又按在黏糊糊的桌面上，然后又从桌面上拿开。我轻轻拨弄盘子里的饼干渣，盘子里已经没有饼干了。我认为我什么都没说，眼睛不知往哪儿看。不过玛格达，就像瑞玛，知道如何填满沉默的空间。“如果我让你感到了不舒服，很抱歉，”她说。“请相信，在这些方面我不是小心眼。看到你爱她，我很高兴。知道她有一个爱人，我感到很高兴。我之所以说你好像很爱她，部分原因是，嗯，她的丈夫：我从来没在他身上看到这种爱。我从来没看出来他爱她。这是你来看我的原因，因为你爱她？”

我发现那腰像瑞玛的女服务生又从店堂后面冒了出来，在收拾旁边的一张桌子。

“瑞玛，”我申明，“不是那种不管什么时候都有绯闻的人。”

从那女服务生的后背上看不出有什么反应。

我放下勺子，我没有意识到我手里拿着一把勺子。我伸出手拿起黏糊糊的手机，把它放进口袋里。在这之后不久，玛格达离开了咖啡店。

我爱你，付账的时候，我在账单上写下这句话。这么写仿佛是一个测试，万一那个女服务生真的是瑞玛呢？

26. 劳 拉

那天晚上,看了电视上的天气预报,令人放心地,或者是令人失望地,不清楚是哪一种感觉,没有从天气预报里收到信号——我需要不断地向我自己证实,我没有看到实际上不存在的图案和信号——最后我给皇家气象学会打了个电话。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有点失去了对谈话的控制。最后证明,我的失控大概是注定的,或者至少,我不如说,是定好了的。

我拨了一个像是电话总机的号码。“喂,我要回复一个电话。”

“你打电话是因为婚姻关系紧张吗?”

“有人给我打电话。”

“是的。你知道你的当事人的分机号码吗?”

“哎,我说了,我要回复一个电话。我是那个电话的客体,不是主体。”

这里有一点儿混乱,因为实际上我不知道我要回谁的电话。于是我提到我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打的电话,希望那个接线员能想到我打这个电话要花很多钱。我们的“交谈”进行得不太顺利,我一时冲动说出了哈维的名字——立即就后悔了——突然,话筒里传出了轻柔的钢琴曲,我的电话被转往某个分机了,然而,突然地——

“你是要问狗的事情吧?”一个颤抖的、几乎像电子琴一般的声音大声地问道。

“是的,”我说,相当惊讶,“我想是的。”

“但是那份工作是在巴塔哥尼亚地区，不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在莫雷诺冰川那里的艾卡拉法特城。你知道那里，是吧？我想招工广告上写得不是很清楚。”

“你说什么？”

“艾卡拉法特城，”她生气地颤抖着声音重复了一遍。“在巴塔哥尼亚。”

“那狗就在那里吗？”我问。

“听着，连着打四个电话是没有用的。我们有你的电话号码——”

“可是，我现在不再用家里的电话——”

“不过，就像我要解释的那样，如果你愿意待在巴塔哥尼亚，那么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是不是与会员资格的提议有关系？”

“听着，”她说，降低了声调，“事实是——什么是事实——好吧，事实是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打电话来问问题。在你之前的那个人问我，我们怎么知道能从黑洞里找回信息。那是在开玩笑吗？为什么问我？他是在挖苦我吗？这不是我的日常工作；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我真的觉得顶不住了——”她说，声音沙哑。

“听你这么说，真对不住，”我真诚地说，因为这个陌生人所处的境地感动了我，她说话的音色和颤抖的声音感动了我。“真的，真的很对不住。”

“不，对不起，”她说，显然是哭了——最近每个人都冲着我哭——在同一时间里甚至也会笑一笑。“多可笑啊，”她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她说。

“没关系的，”我说。“哭一哭是可以的，”奇怪的是，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并不觉得对她的痛苦负有责任，而我却的确确实觉得哭一哭远远不止是可以的。说实话，我发现哭泣的人一般是很讨人厌的。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症状。我继续说道，“哭就像把臀部上一个脓包里的脓液挤出来。我的意思是，听着，有些伤口，如果你去清除它们，它们只会变得更大，更容易感染，但是对于其他的伤口来说，也许这是唯一的选择。这是要冒风险的。你可不想被伤口缠住吧；你不想每天刺破脓包，把你的皮肤弄得一塌糊涂……不过对着电话里的陌生人流几滴眼泪……嗯，大概是没问题的。”

在我即兴作类比期间，她一直咯咯地笑个不停。“你真的挺可爱的，”她说，声音听起来蛮有魅力的。“我已经觉得好一点儿了。你真逗。”她加了一句。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也应该哭吗？然后她打破了沉默，好像突然拧开了水龙头，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听着，我想我们已经处理好了你打来的电话。你是不是说过，你现在有另外一个联络的电话号码？你把那个号码给我，等管事儿的人回来后，他们会找你的。”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劳拉。”

我把电话号码给了劳拉。

她接着说，“我真的认为，没有多少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好去巴塔哥尼亚的准备。显然，本来应该去的那个人在最后一分钟放弃了这份工作，所以有一点儿乱。我觉得，你得到这份工作的机会挺大的。不过，听着，我真心地建议你不要总打电话

过来。有些工作人员是很小气,很爱发火,那样会对你不利的;我甚至见过他们故意把人家的简历放到别的文件堆里,就这么着让那些简历丢失了——好啦,听着,再见了,亲爱的,”她最后说道。

我谢过了她的忠告,挂断了电话,莫名其妙地又高兴又困惑。

没有任何进展,我告诉我自己。这让我想起了波德莱尔^①的交换床位的观点,他认为生活就是一家医院,在医院里每个病人都有交换床位的愿望。并不是说我真的病了,或者要交换女人,或者把感情从一个空间投掷到另一个空间,或者心怀不可实现的愿望——只是与劳拉的交谈让我感到不安。在我寻找瑞玛的过程中,有过一些进展,但是我和劳拉的通话似乎是最具有价值的进展。那个女服务生,电话里的那个模拟瑞玛的女人,甚至瑞玛的母亲——她们都给我带来了接近目标的感觉,但是,劳拉的电话显然更有希望。

27. 遛狗的男人

我出去散步,为了思考,为了消磨时间,为了不觉得孤独,为了不去注意到玛格达还没有回家,连杀手都不在家里。我躲避着人行道上的狗,一条高大凶猛的罗特韦尔狗在围栏后面狂吠,两条瘦骨嶙峋的杂交小猎犬友好而又信赖地凑过来。然后,在

① 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的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

不知不觉间，我转到玛格达家对面的那条街上，我看到：马路对面聚集了十几条大狗，都拴着皮带，所有的皮带都连接到一个温和得令人不安的男人手里，他正靠在墙上抽烟。

狗儿们：个头比较大，欢蹦乱跳，看上去都很健康。没有一条看上去是袖珍灵缇犬，就是貌似瑞玛的那个女人带回家的小狗。

可是，这一群狗让我——这个反应是完全正常的——感到非常紧张。我的脚不肯往前走了。

那牵狗的人冲我点了点头。

我也冲他点了点头。

然后，他隔着马路冲我大叫，“这家伙是你的，啊？”

我没有回答，也没有点头，只是看着他站在那一群杂种狗中间。我没有跟劳拉调情。也没有跟那个女服务生调情。

“La senora,”他说，这一回声音更大了，把重音放在 senora 的第二个音节上，“no esta?”

玛格达的狗，灵缇犬杀手：我发现它被那群乌合之众围绕着。

我抬起头，竟然立刻就看到了天狼星，你相信吗？天狼星，大犬星座中的主星，天空中最亮的一颗星星，它看似一颗星星，但实际上是两颗，或许是三颗。

这时，从马路对面，靠近那群四脚兽的地方，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结果证明是玛格达的声音。她在那牵狗的男人的两个脸蛋上各亲了一下，然后招手叫我过去，好像那里不是个危险的巢穴。所以，如果我打算保持礼貌的话，除了穿过马路，加入到那边的人类和动物中去，我还能做什么？

“我向你介绍我的朋友，”玛格达说的是英语，把“介绍”的重音放在前面，于是成了“礼物”的意思，然后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勇敢地在狗儿们的头上把手伸向牵着狗的那个男人，他没有去握我的手，而是一把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拉了过去，我几乎要摔倒了，幸亏他像老狼抓幼崽那样抓住了我。我感觉到他那厚厚的粗糙的嘴唇压在我的脸颊上。我的姿势很别扭，身体向前倾斜，悬在那群狗的上面，我想像着它们都抬起了头看着我。致意完毕，在我恢复到正常姿势时，又险些摔倒。

这件事给我精神上的回报：为什么那么多的狗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狗不是你的亲密朋友。”那人对我说。

“是的，我喜欢狗，”我说。“我真的喜欢狗。有一些狗。温和的那一种。”

玛格达和那个男人大声笑了起来。我想到了那个夜班护士前额上的血管。在这个不愉快的时刻，我认识到，我从来没有被迫与过去可能亲吻过瑞玛的男人打过交道。至少，我认为，回到家里我不用惦记这种事情。我见到瑞玛的时候，她到美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在我和她约会之前的好几个月里，我只是看着她，和其他的人一起看着她。然而，就在那个她无法决定我们去哪里吃比萨饼的晚上，我曾经很想知道她是否在躲避什么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认为她可能亲吻过，或者爱过这个牵着一群狗的大块头男人。他有一双毛茸茸的大手，比我手上的毛还要多很多。他用西班牙语对我说着什么，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于是我只能报以微笑。我猜，有人会说他长得很强健，很英俊。

“非常非常高兴认识你，”我说，然后走进房子里去。独自在屋里，我重新审视挂着瑞玛照片的画廊。我再次确认，瑞玛的身边绝对一个男人都没有。不过有一张玛格达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照片，就一张，那是一张结婚照。也许这个男人是瑞玛的父亲，也许不是。我真的不知道。

*

*

*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在起居室里遇到了玛格达。她穿了一件长至脚踝的高领的维多利亚式睡袍，不知为什么那件式样极其端庄的睡袍看上去却是不端庄的。“他也是精神分析学家，”她对我说，我低头注视着她的睡袍底边上细小的针眼。“他之所以替人遛狗，是因为再也没有人能付得起做精神分析的费用了。他让他的病人只是象征性地付一点钱。”

听起来真令人愤怒。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花钱请人替他们遛狗，却没有人能花钱做精神分析？长长的睡袍，精神分析学家沉重的负担，玛格达表面上没有男人的生活——我发现这一点相当可疑。然而，那个男人——不管他叫什么，不管他的经济状况如何——是早先对瑞玛产生了吸引力的对象，而我或许——对她来说——只不过是他的反射物。为什么？就因为我们都有一双毛茸茸的手？我不能抛开这个荒唐可笑的、陈腐平庸的假设。

这与你的调查无关，我大脑里的一个议会成员对另一个议会成员说。

我抬起头，注视着玛格达还画着眼线的眼睛。“那个遛狗的人，您认识他有多久了？”

“那个精神分析学家？”她说。“很久很久了。他的医术很不一般，”她要谈论性的问题了，我突然又感到了不安。“他的大多数工作是对付失踪者的亲属。你应当能理解，他是非常非常受人尊敬的。他现在替人遛狗，是为了能够继续为他的病人看病。而且他也喜欢狗，他真的喜欢狗，”她说，仿佛在强调他的道德高于我。

“是吗？他是不是特别喜欢——”我不知道灵缇犬在西班牙语里是怎么说的，或许就叫“灵缇犬”。“嗯，有没有一种特别的狗是他特别喜欢的？”

“有没有一种狗是你特别喜欢的？”这是她的回答，伸出两只手——像猫爪子——放在睡袍上，据我推断是放在她的大腿上。

可是我很讨厌反射；我特别厌恶那种凡是我说的有关我的事情都是秘密的想法。于是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玛格达接着说，“我应当想到——他也认识美国人。我应当想到这里的因果关系。你们俩都认识一个人。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我要去睡觉了。”

她不相信我喜欢狗，但那天晚上她的狗跑过来，和我睡在一张床上。

28. 茨韦·戈－臣会做什么？

我的确很喜欢温和的狗。第二天早晨，我摸了摸杀手天鹅绒般的头顶，用手指拎起它的一只丝一般柔软的耳朵，像捏着一块绸子，她抬起眼睛看着我，这又让我想到了，为什么我那么强烈地怀疑人们爱狗的动机，人们爱狗是因为它们的忠诚，以及由

忠诚带来的顺从和谦卑。或者至少他们的爱看起来像是那样的，因为我拼命地想要相信这样的一种爱。

我的裤子搭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那个记着笔记的小纸块掉到了地板上，看上去就像是一般的垃圾。我对自己的粗心感到惭愧。我穿上外人的裤子，捡起弄皱的纸条，以适当的姿势坐在书桌前。杀手蜷起身子，把它自己安置在我的脚边。我打开纸条：

没有名字的狗？

阿纳托？

皇家学会？

瑞玛的丈夫？

茨韦·戈－臣？

现在还要把劳拉和遛狗的男人考虑进去。不过，很可能是完全相似的对应物：遛狗的男人可能是阿纳托，劳拉可能是茨韦·戈－臣。而茨韦、劳拉和皇家气象学会也许就是一个范畴的。或者茨韦和劳拉只是皇家气象学会的子范畴。那么哈维属于什么？

可是，这个“体系”让我一事无成。我敏锐地感觉到，我甚至，比方说，还不如《惊狂记》^①里的哈里森·福特，连一个可以翻一翻的箱子都没有。我的生活——乏善可陈，缺乏条理。可是我知道，这么想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完全跑题了，是软弱的缘故。我有了皇家气象学会劳拉的这条线索，有朝一日肯定会发

① 《惊狂记》(Frantic)，又译《亡命夜巴黎》，1988年美国摄制的一部惊悚影片，哈里森·福特在其中扮演一位医生。

现什么的。然而,我在寻找瑞玛这件事上似乎什么都没做,这时候我听见在我的心里——我知道就是在我的心里——一个瑞玛的声音在悄悄地说:茨韦·戈一臣会做什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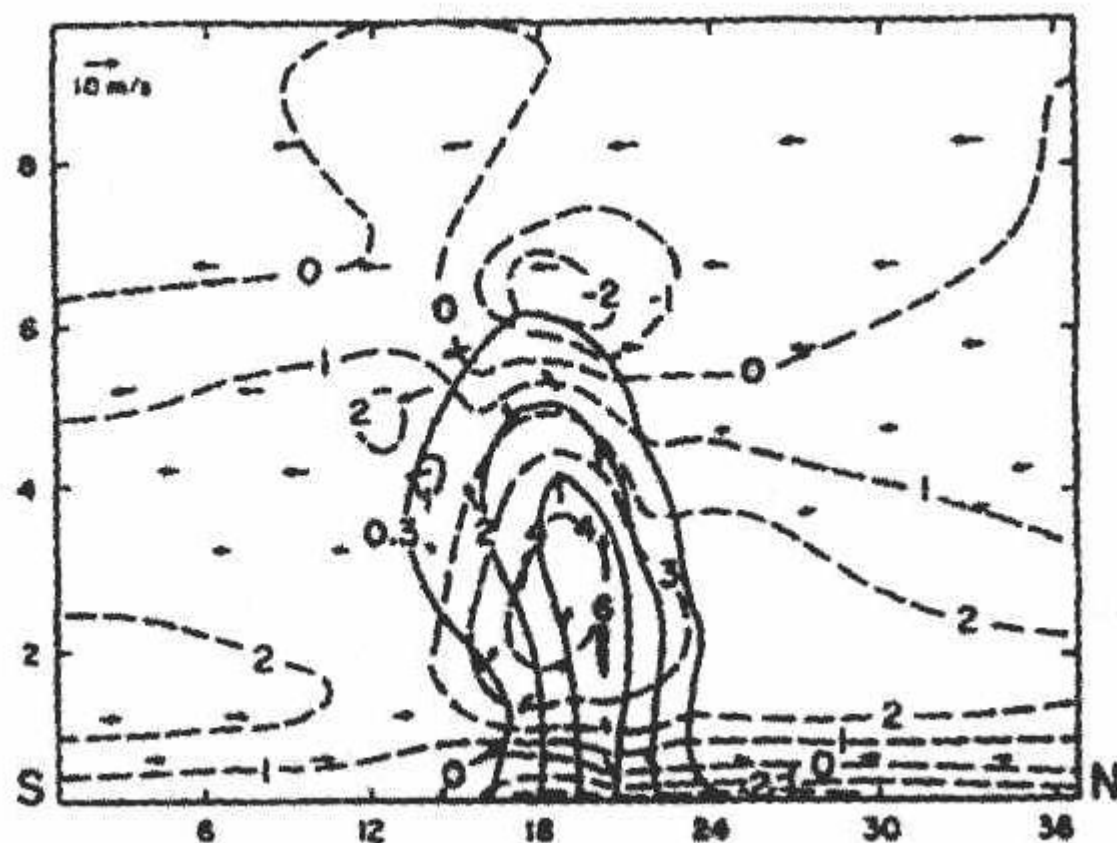
*

*

我决定再仔细地看一看茨韦的论文,“有关恢复的理论”,一项声称恢复“强对流云内的热力变数”的工作。当我详细查看论文时,我想起了过去的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带瑞玛去看《哈姆莱特》,但是戏里说的是古代英语,她几乎一个字都听不懂,所以那个晚上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我向她道歉,没有考虑到语言的问题。不过我说,对于这出戏来说,这种语言大概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出戏讲的是,当你过度评价所发生的事情时,就能心想事成。她说,不对,这出戏真正讲的是已经死去的父亲的长远的影响力。她说,她喜欢这么去想这出戏。我想起了,我们小小的妥协,她的些微的愤慨,我太想她了。尽管有语言上的困难,茨韦的论文相当惊人地向我暗示了我和瑞玛的处境。茨韦的论文为大气模型引进的两类误差的有效性辩护:白噪声指的是“在任何可分辨的范围内的误差”,而蓝噪声专门指的是“在最小可分辨范围内的误差”。他认为,这些误差增加了“被恢复范围的现实性”。

茨韦是不是知道那些“在最小可分辨范围内的误差”是活人魂儿的特性?他是不是知道这种误差与恢复有关?他肯定知道克雷计算机的通力工作可以解决日益增长的量值的问题。这就好比我是一台克雷计算机,他是一台克雷计算机,然后……嗨,我为什么不向茨韦求助呢?

我第一次在图书馆的戈-臣论文里看到的那幅图像,除了让我想到瑞玛的玉米穗般的头发之外,在我看来它也是个孤独的男人,站在外星球上,回首一望,仿佛在问有关某个人的什么事情。



“或许我得给茨韦写信,”我对温柔的杀手说,它似乎没有反对。“我大概需要在中尺度上取得进展,那是人类的尺度。”于是,坐在我岳母房间里——一个我几乎不了解的岳母,一个几乎不认识我的岳母

(她想要了解我,而我给她的信息是错误的),我打开黑莓手机,将它转换到静音模式,尽量显得很专业,很直截了当,很真诚。首先感谢他给哈维写了回信,然后我写了:那个错误的瑞玛;想要恢复我自己的瑞玛;莫名其妙闯入我的生活里的狗儿们;我最近与皇家气象学会的接触。最后我问,他的研究工作很英明地把我带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于我在恢复这方面如何才能有所进展,他是否有什么建议。

29. 不可思议的虚假的陈述

亲爱的利奥·利本斯坦,医学博士:

对不起。我想这是我的错。实际上我不认识哈维。这里面产生了一些混乱。我深感抱歉。你妻子的事情让我感到很不安。可惜我不知道任何有关她的事情。或者她的行

踪。我再次表示抱歉。对由我引起的任何混乱,我深感遗憾。由于一些原因——其中没有一个原因是你个人应当承担的——我认为,我不会再就此事给你写信了。

我几乎是立刻就收到了茨韦的回信。

我思索了一会儿,也许茨韦已经得到了瑞玛。这封回信不过是表示愤慨而已。

对于这个冷冰冰的答复,比较好的解释是:也许茨韦,就像我一样,他要独自一人工作,因为他不知道是否可以相信我——毕竟,他是第一次收到我的信,那上面除了我电子邮箱的地址外,对我这个人,他一无所知,而且在那个电邮地址的后面可以是任何一个人。我母亲去世好几年了,我还会收到寄给她的邮件,有时我会回复她的邮件;有一次我去取回了她的配镜处方。所以我能够理解茨韦的不可思议的虚假陈述和他对我的信的理解——他不能确定他是在和谁通信,他对我的信是半信半疑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为了答复我的信,他正面临着一个“初值问题”;为了今后对真相的预测做出精确的推断,他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参数。多半那时候,他是独自一人的,是独立的,是单独为皇家气象学会工作的,说不定他担心,就像一般人说的,他“要疯了”。

我也是独自一人,要是杀手——那狗的白眼球非常小,所以很难说它那两只眼睛正看着哪里——能够告诉我另一种看法,能够对当前的形势做出另一种解释就好了。是的,回想起来,我能理解茨韦的冷淡,那是他担心的表现。但是在这个扫兴的时刻,我的反应却不是那么平和,觉得丢人现眼了,我立即给茨韦回信:

戈一臣博士：

我只是开个玩笑。错误地相信了你的理解力。对不起！哈一哈。再一次表示抱歉！我想你也许喜欢阿多诺^①的这句话：“孩童游戏的不现实性说明现实还没有成为真实。他们在不自觉地排演正常的生活。”

——利奥

也许是我一时糊涂和孤立的境地唤起了大学一二年级时的感受，造成了我的这种狭隘、消极、盛气凌人和自命不凡。也许是因为我太仔细地检查我坐的那把椅子破旧的天鹅绒椅面上的绒毛所造成的。以我的名义发出那封信以后，我立即把手机关掉，免得收到冲动任性的回信。

*

*

*

过后我在起居室里似乎躺了好几个小时，等着什么人——无论是谁——经过那里。但是没有任何动静。我觉得，如果我不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我会把许多纸撕成很小很小的碎片。我讨厌那种感觉，那感觉在我的心里振动，但无处可去，就像真空里的声音从来接收不到。当时我怨恨我自己。允许那个不受欢迎的感觉堆积起来，这样又增加了一层丑陋。

我在厨房里找到了一罐奶油饼干，有些饼干的面上涂了一层糖，这层糖壳让我觉得有点困惑，有点没有决心。我吃了很多饼干，吃得太多了，好像有一半的饼干还待在我的食道里，耐心

^① 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

地等待着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凝视着厨房的天花板。天花板涂成了水滴的形状,还有拖拉的线条。水滴的形状和拖拉的线条在天花板上形成了随意的图案,这种涂墙粉是很普通的。当我坐在厨房里的時候,我等着那些水滴和线条为我变成一幅图案,哪怕是闹着玩儿呢,但它们没有动,好像我已经成了那种最糟糕的写实主义者,不再会因为事物的外表而吃惊。好像我真的相信有那么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茨韦不认识瑞玛,奇怪的是,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说话是算数的。

30. 替代者回来了

我有没有想过回家?想过。我有没有去那家咖啡店,没完没了地盯着那个腰像瑞玛的女服务生看?去了。毕竟,首先是由于瑞玛的失踪,然后才是茨韦的研究工作把我引到了阿根廷。而实际上是瑞玛,她把我当做所谓的补救办法打发到了茨韦·戈—臣那里去。现在我怀疑,我列出来的那个名单也许是毫无意义的,起码是无法解释的。我为什么会自动地选择茨韦担任英雄般的领导者的角色呢?我为什么期待他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看得出来,对于解开我的谜团,他能起到重大的作用,甚至是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必定是令人满意的。也许他的研究工作是重要的,而他本身并不重要。大约我想要好好地思考思考,于是喝光了七杯咖啡,吃掉了十一块曲奇饼,两块涂了橘子酱的烤面包片。我终于决定,要更加仔细地去研究茨韦的论文,这是绝对必要的。不管他在电子邮件里写的是什麼。单凭我自己的力量,我肯定也能找到比我目前所拥

有的更多的线索。随着劳拉给我安排的那份气象工作唾手可得,我需要增加气象学词汇。当我留下一份相当多的小费,然后在收据上写下 xoxoxo (拥抱和亲吻) 的时候,我认定,茨韦粗暴地拒我于千里之外更加突显了这份工作的关联性和重要性。

带着坚定的决心,我回到玛格达的家,回到茨韦的研究上。我已经准备好了立即开始工作。

但是在玛格达家的门外,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就像熔岩灯里向上飘浮的泡泡,一个念头浮了上来:她看起来真像瑞玛。甚至比那个女服务生还要像。这个女人坐在前门的台阶上,两个脚尖向里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两只手托着下巴,玉米穗般金色的前刘海垂在温顺的黑眼睛上方。她的身旁有一条狗,但不是杀手,也不是纽约那条神情紧张的小狗,而是那孤儿狗的放大版。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琢磨着掉转身,永远不回来了。为什么我会本能地害怕她呢?为什么我自动地选中她担任简单的对手的角色呢?她看上去那么孤独无助,那么美丽。

这时,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没有发觉我——将两臂交叉抱在胸前,好像很冷的样子。这个姿势把紧贴在她身体两侧的上臂压扁了,看上去显得比较胖。这个女人绝对没有我的瑞玛那么漂亮,没有,至少那两条压扁的胖乎乎的胳膊少了些吸引力。好啦,在我看来,那两条胳膊使那女人突然变得很无辜。

我走上前,进入那女人的视线,假装镇定地说,“这不是那个有毛病的小狗崽吧?”

在我得到任何答复之前,那女人一把抱住了我,她的胳膊绕在我的肩头上,她的脸蛋贴在我的脸蛋上,她的头发里有一股干

草的味道,我模模糊糊地看到好几个影子晃来晃去的,然后她亲吻我的脸,好多个她在亲吻我。说实话,这让我想起了瑞玛(我觉得她的牙齿在啃我的脸蛋),想起了我的瑞玛的山核桃,堆在小漏勺里的茶叶,外国报纸。坦白地说,想起这些真的让我感到很悲伤。我不喜欢悲伤的感觉,只有固执的人才喜欢去感受悲伤——我没有感到过悲伤,我已经把这种情绪让位给比较重要的感情——我想把那女人从我身上推开,但是做不到,因为我好像失去了对我的肢体的控制,仿佛那不是我的肢体,是别人的。

31. 电话不是打给我的

她亲吻着我;然而在我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我看到——斜眼看到——玛格达。我很不习惯在亲嘴的时候,有人站在一边看着。

“瑞玛!”传来玛格达的声音。“电话!”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她身上没有一块肌肉对玛格达的喊声做出反应。

“我这就来,”我大声叫道,故意听错了玛格达叫的是谁。

“我害怕极了,”那女人说,亲着我的眼皮——我不禁想起亲吻眼皮是瑞玛一直以来都喜欢做的一件事情,而我认为亲吻眼皮则是恋爱的所有组成部分中一个相当普通的部分。我还记得,第一次亲吻眼皮带给我什么样的刺激,用一种有经验的行为挑逗我,这说明,在我认识瑞玛以前,所有的人,不包括我,已经把她塑造成了这个样子——她像住在岩层上的外星人,以这种方式流星般地落在了我的星球上,除了爱上被烧焦的流星,我别

无选择——我猜,我是个很爱嫉妒的人,有很强的占有欲——当我察觉到她表里不一时,我发现亲吻眼皮这样的事会让我感到很尴尬。她紧紧握住我的手腕。“我写下了一长串的话要说给你听,但是——”

“这样对玛格达是很粗鲁——”

“我总以为我们拌嘴是很普通的事情,我在脑子里想遍了所有那些比你对我更好的人,许多人对我很好,可是——”

“你不能光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才对玛格达好一点,”我对她说。“以为人是可以换来换去的,只要你觉得可以,你就用一个人替代另一个人,这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我肯定没有考虑到我对待其他女人的行为。我一边胡言乱语,一边把那女人推开——这么做是很容易的,因为她的个头比我小——我掉头朝屋里走去,我认为那女人开始冲我嚷嚷了。可我是那种对母亲很孝顺的男人。我不会假装没有听见玛格达在叫我们。我不知道我是否相信,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模式注定了是要重复下去的,不过我并不急着要和一个很可能抛弃了自己父母的女人结婚,这让我感到很惊讶。据我所知,这个漂亮的母亲之所以受到瑞玛的曲解和责备,她也许就错在准确地察觉到了那个不愉快的真相,那就是瑞玛在决定和我结婚之前,她选择和那个粗鲁的美国人结婚。至少我已经知道了,在我向瑞玛求婚之前,她已经抛弃了她的母亲。

32. 用各种频率测量辐射

在厨房里,玛格达耸了耸肩告诉我们,没等那貌似瑞玛的女

人来接电话,打电话的人就把电话挂断了。可是我们三个人还待在厨房里,靠着厨房的料理台,没话可说。杀手在它自己的水碗里喝水,然后趴在地上,把头放在两只爪子之间。它抬起眼睛,看着我们这几个人类;我们站成一排,我在中间。

“它和一个朋友在一起,”那女人突然谁都不看地说道。“如果你想要知道那狗在哪里的话。我把它放在一个在工作中结识的朋友那里。”

“一条狗,”玛格达重复道。

“工作中结识的朋友,”我重复道。

随后又陷入沉默。在此期间,我觉得我的两只脚肿了起来,两只耳朵变大了,脊椎骨压在软骨盘上,我变得更矮了,只是这种变化很慢,慢到足以对任何事情,对整个世界产生最不确定的混乱的感觉。

“全是为了妓女?”玛格达突然兴高采烈地说。

转过身面对着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我好像有点认识她——我的确有点认识她,我们一起度过了相当动情的两天——我低声说,“妓女?”

“还有雀巢咖啡?”玛格达冲着我的后背加了一句。

“阿尔法,”那女人对我说,发音清晰——我看着她的嘴唇——说话声音冷冷的、干巴巴的。“阿尔法。妓女。辐射。”

这是气象术语? 军事密码?

玛格达拿出一包曲奇饼,开始烧水。我已经非常快地熟悉了这个烧水壶的声音,这是个电水壶,所以不会有颤动的声音,发出的是一种比较空洞的和缓的隆隆声。你期待地等着电水壶发出咔嚓一声,这说明定温器跳起来了,水开了。不过在我看

来,电水壶烧出来的开水不如在炉子上烧出来的那么热,我知道电水壶的开水不够热,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开水应该是一样热的,除非主要的气压不同。

“去,到客厅里坐着,”玛格达说,就像轰孩子那样要把我们赶出厨房去。“我会把茶拿过去的。”

我们没有动。我们俩是不是都在听开水壶的声音?

杀手抬起腿,迈着大步慢慢地走了出去。

“El es mi esposo,”那女人用西班牙语大声说,神经质地笑了起来,耸了耸肩膀。“esposo”是“手铐”的意思,但也有“丈夫”的意思。我假定,她的意思是“丈夫”。

“是谁?”玛格达问。

那女人朝我点了点头,但她没有看我,也没有碰我。真正的瑞玛:对她的母亲保守了那么多年的一个秘密,她是不会那么鲁莽地急急忙忙地揭露它的。

“他?”玛格达问。“这个人?”她指着我说,好像我只是个塑像。“我以为,他可能是你的情人。”

“不是,”那女人确定。“不是我的情人,是我的丈夫。”

“这些名词,”我用英语说,“它们的意思是非专属的,是重叠的。”

电水壶轻轻地咔嚓响了一声。没有人动。玛格达说,“我好像没听清楚?”

在这时候,让我没想到的是玛格达,她没有对这个伪造的孩子,这个不是她生的女人显示出丝毫的怀疑。我过高估计了玛格达解释她自己的愿望为什么会产生红移现象,以及解释多普勒魂魄效应的能力。对其他观测者固有的误差,我做出的判断

是错的。我应该知道,一个母亲好几年没有见过她的女儿,她非常迫切地想要见到她,那么就是把金·诺瓦克^①放在她的面前,她也很可能把她“认”作是自己的女儿,这是非常正常的,而且意味深长。这是一种脱离来源的承认感,是数据的误译,是把事实强加到一个与它们不相配的模型里。“我不懂,”玛格达继续说,视我为无物。“你是说,你和这个气象学家结婚了?”

我想起了叉子的齿尖消失在小扁豆里。

“气象学家?”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反问。

“那个精神分析学家怎么啦?”玛格达问。

我很想喝速溶咖啡。

“您说的是茨韦·戈—臣?”那女人惊慌地问玛格达,然后转过来看着我,抓住我的手腕,恶狠狠地低声问我,“你跟她讲了茨韦·戈—臣?”

“我没有告诉她,”我紧张地咕哝着,这句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时,听起来声调太高了。

“什么是刺猬歌唱?”玛格达问。

“我绝对没有和他联系,”我坚定地宣布,不知向谁宣布。

不说话的交流还在继续进行。说实话,我不想再听下去了,我的头脑里充斥着拍动翅膀的声音,好像有一千个母亲,应该说有一千只飞蛾从一件很多年没有从衣橱里拿出来的旧大衣里飞了出来。我又开始考虑走出去,回到那家咖啡店去,在那里我可以喝上一杯像样的热咖啡,吃几块曲奇饼,看看那个漂亮的女服

^① 金·诺瓦克(Kin Novak),美国电影演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

务生。可是我没有走。“您不觉得她奇怪吗？”我说，终于突然发出了蓝噪声，或者白噪声。我是在跟玛格达说话，而且只跟玛格达一个人说话，我背对着另外一个女人，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没有啊，”玛格达说，越过我朝那女人伸出手。“我喜欢你的头发，瑞玛。”我发现自己被挡在玛格达的胳膊后面。“这颜色比你头发本身的颜色显得更自然。”

那女人向后缩去，仿佛现在是冬天。可现在不是冬天，不管怎么说，这里不是冬天，外面很热。有人可能要哭了，这是我的感觉，这种事情占去屋子里的空间太多了，我认为我应该离开这里，免得被闷死，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优雅地退出——在电影里中途离场是对导演的大不敬，而我不清楚我担心得罪的导演是谁。然而，感谢上帝，或者说至少要感谢我知道的那个学会，我的手机响了，在这个时刻，继续待在屋子里比走出去还要显得无礼，于是我弯腰低头从玛格达的胳膊下钻出去，朝前门走去。

33. 天 气 学

我的手机响得多是时候，这不奇怪吗？

但是在电影《马太福音》的结尾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亲，父亲，你为什么遗弃我？这不是也很奇怪吗？谁会预见到那个结局呢？

“嗨，我是劳拉，”电话里一个声音说。

我走出前门，来到长满九重葛的院子里，九重葛的叶子上满是灰尘。“谁？”

“劳拉？”

“不，我不是劳拉。我是利奥。”

“利奥？我是劳拉。我找阿瑟。阿瑟·科宁。关于南方的那个工作。”

“阿瑟？”

“是啊，阿瑟。二十七岁。鲍登学院。休闲冰山攀登手？我们谈过伤口的事情？”

阳光照在我的背上，我终于听出了那个放荡的颤抖的声音。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的出现一定临时清除了我头脑中皇家气象学会劳拉的样子。“哦，”我说，手掌上开始出汗了。“是啊，是我，阿瑟。”

我为什么要那么说？说我是阿瑟，而我不是阿瑟？嗨，我给自己起的名字，我却把它忘了。我不得不采取伪装的手段，因为用这种手段，我或许能取得一些进展，找到一些线索。劳拉已经和我确立了真正的联系，忽视它是很愚蠢的。这种私人的联系是很重要的。也许简历已经被胡乱地混在一起了，也许是故意这么做的。这个名字也许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不能立即舍弃它，因为我还不知道它背后的细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撒谎。

“我们想把它给你，”劳拉温柔地说。“那份工作。在南方。”在我听来，劳拉的话很暧昧。我不相信，劳拉的话之所以听起来很暧昧，只是因为我突然想到她把我想像成了一个性感的、健硕的、年轻的冰山攀登手；我也不相信，因为我正在想我自己的那些烦心的事情——或者希望的事情——瑞玛和那遛狗的男人之间，瑞玛和阿纳托之间很可能从没发生过什么事情，或者瑞玛和

谁都没发生过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太过于刺激了,就好像我仰望夜晚的星空,一颗新的行星滑进了我的视野。新行星的发现自然摒弃了人们对其他天体运动的计算结果,这又让我想起了天狼星,它看上去像是只有一颗,可是后来发现是两颗,甚至也许是三颗,当人们了解到这一点后,这个事实肯定会改变一切,改变所有的计算结果。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些事情。

“那天你非常可爱,”劳拉继续说道。“我觉得非常——”

“你能不能再给我说一遍那份工作的具体情况?”我说。我不想在她开始论及她的感情时打断她的话,我没有想要疏离一个身心失调的精神病患者,我只是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手边上的事情。

“对不起。当然可以。你生我的气了吧?”

我生茨韦的气,我没有说出来。我听到我自己在对劳拉说,“就像茨韦·戈一臣在他的论文《恢复的理论》里说的那样,他说,‘应该强调,热力学恢复原理不包含用预报方程的手段及时地向前推进……而恢复的方法就是利用同样的预报方程的诊断程序,只是在不同的方面。’”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我在说什么。那些话全部来自茨韦的研究论文,没想到我几乎可以把他的论文背下来了。“哦,只是偶尔想起了恢复啊,关于改善预报啊什么的。奇怪的是,把误差引进模型里,有助于做出比较可靠的预报。我扯远了。我真的只是想了解一下那份工作。”

“可是刚才你是什么意思?我是说,你那些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我真的不清楚。”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确觉得松了一口气，好像我已经取得了进展。“不过就像戈－臣博士的另一个观点说的那样，我们无法断定明天是什么天气，因为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现在是什么天气。在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做出当下的预报时，我们怎么能够做出预报呢？要知道，这是一个初值问题。”

“现在是什么天气？”

“晴朗，”我答道。“东南轻风。”

劳拉大笑。

许多严肃的事情都被当成了笑话；那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应对机制。

然后，劳拉把那份显然已经决定给我——阿瑟——的工作细则告诉了我，如果我非常想要这份工作的话，我就可以接受了。我说我很想要。我很想为皇家气象学会工作。

34. 中尺度天气现象

那天晚上，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走进我的卧室（也许是瑞玛的卧室）。那女人的头发上有一丝淡淡的熏肉的气味。我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她坐在床上。

“你穿的这些衣服不是你的，”她说。“我刚注意到。”

她的观察是准确的。我穿的是玛格达借给我的衣服。漂亮的淡绿色衬衫，左胸口袋上有一块来历不明的污迹，我早先没有注意到它。我开始去抠那块污迹，好像是肉汁。“因为我把行李搞丢了，”我说。

“你弄丢了行李？”她说。听起来像是个比较熟悉、比较常见

的谴责，那口吻好像我经常让那女人失望似的。

“其实是他们把我的行李搞丢了，”我解释，同时继续关注那块污迹，而不是关注她。“我是说，行李丢失不是我能掌控的，所以这不是我的错。要怪就怪把行李弄丢的那些人。我是受害者。并不是说这是谁的错，这只是一件事情而已。我的意思是，我只是说到该怪谁的问题，因为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的错。”我一边继续说下去，一边还在抠那块污迹，不过没有什么改变的希望。“但是，谁的错这不是主要问题。要说错的话，这是茨韦·戈－臣的错。行李就是找不着了。不管怎么样，他们应该打电话告诉我。”我没有告诉她我找到的那份工作。

“明天我去给你买新衣服，”那女人突然说。

我把一只手伸进又窄又深的裤子口袋里，对她说，“别费心了。我喜欢我现在穿的衣服。”

“不行，”她不客气地说道，很有权威。然后，又语气和缓地说，“我给你买一些别的东西。”她像玛格达那样盯着我衬衫袖子上的按扣看。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所有的感动一下涌向了膝盖骨。她说，“这是我们要一起做的事情。明天。买衣服。”

然后又沉默了。热气传到膝盖上，我发现自己大胆地问道，“那么谁在照顾营养不良的灵缇犬狗崽？是阿纳托吗？是阿纳托在照顾她吗？”

在那女人的身体重压下，床垫微微有些下陷，这使得铺在床上的毯子皱了起来，她坐在那皱起的毯子中间像是一朵花的花蕊，看起来非常漂亮，也非常像小鹿。她把手从我的膝盖上缩回去，说，“谁告诉你那个名字的？你好像有些不对头。”那女人看上去——那时候我终于注意到——似乎好几天没有睡觉了。眼

睛下的皮肤呈现出灰黑的颜色。鬓角两边的头发无精打采地卷曲着。她厉声问道，“你跟我妈妈都说了些什么？她对我撒谎了，是不是？她是不是对我撒谎了？她没有告诉我，她跟你提到他了。我应当告诉你的，她几乎就是个撒谎高手——”

我觉得很悲哀。我无意识地想像着，我还是个小孩子，我自己就把深蓝色的雨衣拉链拉起来了——或许是别的什么人把雨衣的拉链拉起来的？我用职业的语气，干巴巴地说，“她没有跟我说过要把真相的价值看做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她打断我的话，“你跟她说了茨韦·戈－臣吗？都说了些什么？”

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事情，我问道，“是不是因为你，茨韦才给我写了那么一封冷淡的信？”突然而至的激动像一粒药片卡在我的喉咙里。只是向她提起了茨韦的名字，就令我的眼睛湿了，“你是不是在和他一起工作？”

正是这些问题止住了她正在上升的怒气。那朵枯萎的花瞪了我好几秒钟，也许好几分钟，也许好几年。然后她从床上站起来，逼近我。我把椅子往后蹭。她继续朝我走过来。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床铺的另一边坐下。我们就像涡流锋面，形成了下坡风。她转过身，又向我走过来，微微地皱起眉头。她站着，我坐着，她非常非常慢地朝我伸出手——我打了个激灵——我让她把她的手温柔地放在我的脸上，而且就停在那里，我的脸和她的腰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一会儿她的美丽的腰，至少那腰影响了我，大概是很有效地影响了我，我发现自己在低声说话，好像衣橱里藏着个特工在偷听我们说话似的，“我们不能一起工作吗？也许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呢？只是我不

知道你的经历,不知道你的出身背景,这些原因造成了‘初值问题’,这使得我很难相信你,就像茨韦一定也很难相信我一样。我无法说清楚你的哪些过失是故意的。不得不时时刻刻装假,对你来说一定是非常疲惫的。我想让你知道,你不必再跟我装假了。别为了装假自寻烦恼了,因为,听着,我已经知道你不是瑞玛。我已经知道了。”

她的手从我的脸颊上移到额头上。

我想把脸贴在她那美丽的腰上。

她问,“我不是瑞玛?”

我没有回答。

“我们能不能回想一下?”她问。“当你说茨韦和‘冷淡的信’的时候,你是什么意思?”

可是我还在想她的腰,因为考虑到我坐在床铺上压出来的坑可能看上去和她压出来的不一样,或者和她压出来的一样,所以我将把我自己贴在她身上的冲动压了下去。但是我——我后悔过早地暴露了我对她与茨韦·戈—臣关系的怀疑——考虑床上的坑,不只是为了逃避回答问题。

“你说,”那女人说,“我不是瑞玛,你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我不熟悉的表达方式吗?”

我说,“是的,冷淡的回信是一个表达方式。或者是表示死亡的一个隐喻。”瑞玛和我谈起过表示死亡的隐喻,那时候她的英语不太好,经常因为不正确地使用那些隐喻而把我吓了一跳。比如,把“冷静”说成了“冷却”,把“奇怪的鸟”说成了“古怪的鸡”。不过这样的事已经不怎么发生了。

“我不是瑞玛,这也是表示死亡的一个隐喻吗?”

“不是，”我懊恼地低声说。“我那么说的时候，我说的就是我要说的意思。”

“你说的就是你要说的意思？”

“是的，我的意思。”

“意思，”她重复着，主要是重复给她自己听，把手从我的脸上拿开。

我意识到，我已经忘了那股不知打哪儿来的熏肉的味道。

那女人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她的上臂又被挤压成了一个又扁又胖的形状。她在我身旁坐下，我们俩之间的床单上压出了很难看的褶子。

“告诉我，”她说，没有看我，“我哪里不像瑞玛？”

不知为什么，我不怕她了，那只是我的一个感觉。我真诚地希望她能够理解。或许我想到了她的过失可以为我所用。“比如，”我说，“她比你更容易激动，比你更容易紧张。”

“她异位妊娠时，怎么样？”她指出。“她表现得非常冷静。”

“那是没错，”我说，拒不上钩。“可是她身上的气味跟你的不一样。”

“你的气味跟你的也不一样啊。”

“她的气味像是干草的味道。”

“今天你身上发出的气味像是我妈妈的洗发香波的味道，”她试图反驳。“不过，我还是坐在你的旁边。”

“她对狗不感兴趣。这是一个多明显的特征——”

“你爱她，就因为这些事情吗？”她问，不耐烦地提高了声音。“她的味道，她的紧张，她对狗不感兴趣？”

“爱情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澄清。“我只是要告诉你她的一

些事情。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曾经对她生出了柔情,但现在她开始让我感到恼火了。“你大概理解不了。”

“这在你看来一定是非常奇怪的,”她嘲弄地说,脸“刷”地红了。“我那么了解她,我长得那么像她,但是你不爱我——”

“别这样,”我立刻说。“别激动。”

她眼睛下面的皮肤更黑了。然后她开始——突然——哭了起来,不像是要违抗我。但我不知道,我是否会称她的哭是悲伤的哭。我想,或许有人会说她那是抽泣,不过更多的是痛苦的抽泣,而不是被击败的抽泣。在喘息之间,我觉得她想要再对我说些什么,“你那些生活琐事我都知道,比如,你可以坐着吃掉半个西瓜;你一边刷牙一边看杂志;袜子还好好好的,你却毫无原因地就把它扔掉了。你似乎什么人都不喜欢,有时除了我。我知道你有多么喜欢茨韦的全家福照片,这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我不得不把它拿掉。我希望我对你的了解,意味着什么——”

“你不累吗?”我问,不受她的小把戏的影响。“我困极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晚上应该睡在这间屋子里,一起?”

“你不讲理,”她说,还在抽泣。“是你,你才不是你自己呢。”

35. 机器里的幽灵

我应该说明,戈-臣博士和我本人续签合同的事情。

我们,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和我,合睡在玛格达家一张狭窄的床铺上。不过那女人不许那狗和我们睡在一起,我已经渐渐习惯了那狗陪我睡觉。她,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穿着瑞玛的绿色短睡裤和我的一件内衣;除了袜子和鞋子外,我可穿得严严实实

的。睡眠没有来拜访我，可是那女人的头发丝不停地让我产生跳蚤们默不作声地在我的身体上大快朵颐的错觉。那女人在睡梦中用手指摸索我的锁骨，这是瑞玛的感觉。她的膝盖在探寻我的皮糙肉厚的大腿，她的脚搭在床边上。那女人的眼睛在不停地跳动，似乎是在做梦，我的身体，就像它靠近瑞玛的时候那样，紧张地等待着最轻微的有规律的重复的动作，等待着最轻微的似乎并不是随意的碰触。我不喜欢紧张等待的感觉。她睡得像似一个人筋疲力尽；我一点儿睡意都没有。

在这个不眠之夜，我想，和茨韦·戈一臣睡觉的会是谁？这是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思想管弦乐队的第一个不和谐音。我想，在某个并行的世界里，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会不会真的是茨韦的妻子呢？茨韦在某个世界里与活人的魂儿结婚，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与另一个女人结婚？

她的手搭在我的臀部上。

或者：这个貌似瑞玛的女人不是茨韦的妻子，我所理解的婚姻在一个并行的世界里或许不是婚姻，但是在这个我和瑞玛的魂儿一起躺在床上的世界里，我的瑞玛是，或曾经是茨韦·戈一臣的妻子，有没有这种可能？不过这肯定只是我的托辞；瑞玛大概没有和别的人结过婚，就算她结过婚，也不是和一个气象学家结婚。

那女人的手没有动，仿佛那是一只人体模型的手。

还有，也许茨韦——不是那个夜班护士，不是那个精神分析学家兼遛狗人，不是某个叫阿纳托的人——在瑞玛的前夫这个次要的谜团里，是一块没有挖掘出来的真正的石头。也许他和瑞玛以某种方式被牵扯在一起。

虽然,茨韦大概比我的年纪还要大。

但是,或许就是这样才意味着瑞玛爱过他,或许依然爱着他,甚过爱我?

那女人在睡梦中长叹一口气,她的整个胸部贴在了我的身上,然后又缩了回去。

照片里,那个挨着茨韦·戈—臣,胳膊肘很白的女人是谁?她从来就不是他的妻子吗?他和她——照片中的那个女人——相爱吗?那时候?现在?会不会通过某种离奇的交换,他的妻子成了我的妻子?可是玛格达泄露的瑞玛的前任丈夫——或者依旧是现任丈夫——不是气象学家,那么当我介绍自己是气象学家时,玛格达曾经见过的那个气象学家是谁?他让玛格达草率地认定了我是个好人。

那女人的右手软弱无力地从我身上滑下去。在兴奋的睡眠中,我脑子里一直在不停地交换和相互交换,把这个人换成那个人,把那个人换成这个人,就像个倒霉的世纪末的释梦者。虽然在我的那些不和谐的想法里,没有一个想法是真正说得通的,但是有一件事似乎是明显的:我的谜团集中到了茨韦·戈—臣的身上。

于是,我推开怀里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抓起我的手机,摸着黑走到起居室。我那时候采取的行动,可能以后证明是愚蠢而错误的,我会辩解说,如果因错误的原因实施了正确的行动,我想也许我的那些原因是戴着面具和袜子的,这样它们始终像是正确的原因。

36. 寒 风

尽管戈－臣博士对我那封电邮的回复是相当冷淡的，尽管我或多或少已经决定再也不和他通信了，但是在没有灯光的起居室里，坐在看不见天鹅绒沙发里，在一个瑞玛和我上了床的痛苦提示中，我发现自己能够忘掉我的妻子和茨韦的妻子的尴尬交换。能够忘掉它，而记住了我不应当立刻继续提问题，为了请求茨韦的帮助，我得从另一个角度靠近。因为在瑞玛失踪后，我立刻询问 49 位量子教父——这让他感到紧张，感到不舒服。但是也许通过谈论不相关的第三件事情，我们——我们俩人——就可以进行自由的、坦率的、诚实的对话。就好比，通过让病人谈论他的配偶，他的母亲，他喜欢的食物，而不是谈论他自己，来达到让他放松和倾诉的目的。或者，就像在单多普勒雷达系统完成恢复的期间，从一个角度查看定风量，然后对失真做出解释，为的是进行比较准确的推断，好像可以从正面看到推断出的东西，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么做的话就会失去所有的维度。

于是，我开始写信，询问如何计算风寒指数。

当我在打字的时候，起居室里闪着黑莓手机的幽幽蓝光。

风寒指数是不是类似多普勒效应，我像哲学家那样写道，尽量显得很聪明的样子，适合热量的变动，而不适合光和声音的变动？我考虑做进一步的类比，比如，人类关系的变动，人与人之间的冷淡，其寒冷程度比实际上的要冷得多。不过，我想这么说也许太过分了，太冒昧了。

显然,我最想从茨韦那里知道的不是风寒指数是如何计算的——我最想知道的是他是否知道瑞玛的行踪,以及如何让她回来——但我还是很诚恳地向他询问,因为我的确常常对风寒指数感到纳闷。这是一个温度的问题,但又觉得像是另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客观地测量主观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问题,聪明的难题。我猜,每个领域里,有不同的回答。你今天爱我,是多还是少呢?我过去常常这么问瑞玛。

在把信发出去之前,我犹豫了一会儿。我担心表面上的反常。但我让我自己放宽心,向茨韦询问风寒指数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毕竟,我对自己说,茨韦是个气象学家,一个真正的气象学家,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能有多少次和一个真正的气象学家直接通信呢?

我想起了纽约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我把信发了出去。

然后,我躺在天鹅绒沙发上,独自一人。

那狗在哪里睡觉?我想知道。

我不愿意想像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的睡相,她的脚搁在床边。

黑莓手机的屏幕自己关掉了,整个房间漆黑一片。

37. 在幽灵的机器里

房间里再次亮起了幽幽的蓝光。

“对风寒指数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军,”茨韦的回信来得那么快,仿佛他一直在等着我和他联系,就像一个被一脚踢开的情人在等着重新和好的迹象。“但是国家气象局直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向民众公开信息。”他在回信里还给了一个网页的链接,那个网页里有一篇关于风寒指数的论文,简短地介绍了风寒指数研究的历史。“很高兴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写道。他没有提到他那封无礼的回信。他甚至在信的结尾处写上“爱,茨韦”。

他——或者是她——怎么啦?我感到纳闷,在这个荒谬的时刻,我又一次想到了,我或许是在和瑞玛通信,毕竟她假扮茨韦·戈-臣已经很多次了。为什么要用“爱”这个字?为什么要提到战争?为什么要提到七十年代?为什么风寒指数的研究要保密?我打算如何理解他所说的话?我打算如何回信?

我开始用手机在互联网上搜索,去做一件长久以来我回避去做的事情。回避的部分原因大概是,我总是觉得,我以某种方式冤枉了这个我占用了他身份的陌生人。我企图从传记,地理,拼字法,政治,注音,病理学,或者其他方面弄清楚真正的茨韦·戈-臣。或者是戈臣。或者是戈·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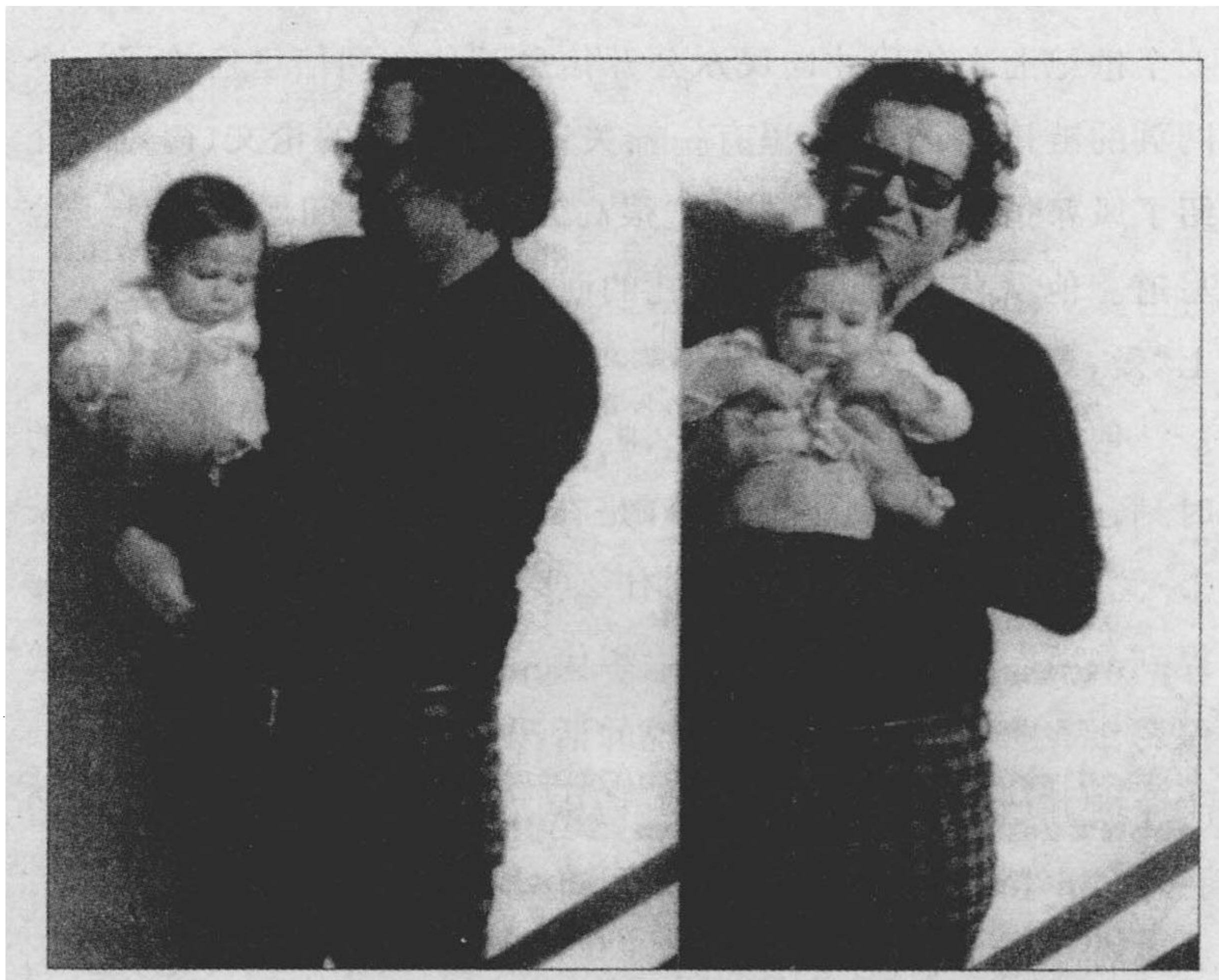
我找到了俄罗斯的杂耍演员,被称为“戈臣科兄弟”。

我找到了一个苏格兰摇滚乐队,叫做“戈臣”,在一个网页上被评论为是“伟大的乐队,绝对可怕的名字”。

我发现一个博客批评茨韦在使用“移动判断标准”时的语法。

我找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侧面的,一张是正面的,像是警察局存档的嫌疑犯的照片。一个像茨韦的男人,穿着格子图案的裤子,站在阳台上,抱着一个孩子,看不出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在一个以低沉哀婉的门德尔松挽歌作为序曲的紫红色芬兰



网页上,我得知那个茨韦·戈—臣——特别提到他在下爆气流方面的中尺度工作,以及他在单多普勒雷达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因为突然的心脏病发作,死于一九九四年,享年五十三岁,相当年轻。

接着,我注意到,在皇家气象学会的花名册里,茨韦的名字旁边有一个浅灰色的星号。

我重新下载,重新阅读,重新思考那个网页。

38. 非常正常的对话

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家——一个勘探者,他寻求的不是他所希望的真相,而是寻求任何真相,不管那个真相是

什么——那么，他必须愿意接受，甚至愿意进一步追求最令人不愉快的和最混乱的数据。他必须愿意做出那种会摧毁他的根深蒂固的信仰的发现。或许这种发现的结果是，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猴子可能是我们的亲戚。或许我们发现某个人不是专家，我们可能是在和死人对话。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要探索钻研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发现，而不是摒弃它们。

于是我给茨韦写回信，说近来我有一个他死了的印象。

“哦，没错。这是真的，从大多数意义上讲，”他答道，没有标题。

我感觉有一股微风掠过，就在我的周围，这是微气候，就像当电影里有一个鬼魂飘过去时，人们会感觉到的那样。“那么为什么，或者说得准确些，你是从哪里给我写信的？又是从哪里给哈维写信的？”

茨韦回信：“你是否还记得，不是我同你们先联系的，我所做的就是回信。我想，当哈维称我为‘未来太平盛世的中尺度英雄’时，这着实令人高兴，我之所以回信可能只是出于好奇。或者是出于孤独寂寞。不过，我的确认为似乎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写信来，显然他想要我回信，于是我就写了回信。”

想到茨韦死亡的问题，这似乎不像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可是那两张照片，像警察局存档的嫌疑犯的照片……所有的词汇索引……有关恢复理论的研究工作……于是我发现自己真心诚意地写道：“似乎在某些世界里，你是活着的，而在某些世界里，你死了，是不是？你的关于恢复理论的研究工作不是在现实和模型之间，而是在现实世界之间，是不是？”

“你和哈维，”他回信，“怎么会对我的研究工作感兴趣的呢？”

“如果你的确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对你的研究感兴趣的话，我保证有一天会告诉你的。不过，我怀疑你是知道的。但你能告诉我，你真的没有死吗？由于某个原因，你只是装死？”

“对于你早先的猜测，我会多说几句。对你来说，我听起来已经死了？我很想知道，我说话是不是像个死人。有一次，我女儿兴冲冲地从学校回到家——这是几年以前，就在我死之前——她说她的英语老师谈到了，在但丁看来，死人都会说些什么。好玩的是，但丁眼里的死人知道过去，甚至知道将来，但不知道现在。他们想要问但丁一些有关现在的问题，那就是活着是什么。她觉得这似乎真的意味着什么。死人比活着的人更了解他们自己。朝圣者但丁问，你们是谁？人们能够无条件地给出非常简洁的精确的描述。我是个被爱情左右的人。或者，我是个不敢对恺撒表示怀疑的人。每件事都是固定的，知道吗？”

什么时候谈起了文学？然而这是回避问题的一个相当好的办法。基于一种延续已久的要把活人和死人分开的旧信念，我该不该问问茨韦他是什么人？他是不是正采取迂回的方法让我问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的主要问题是找到瑞玛的话，我为什么要在乎他是活着还是死了？而谈论文学不也就是直截了当地解释了他的研究吗？因为我——我应该承认——发现我的思绪也滑向了文学。我想起了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①的最后

^①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获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一首诗《四个四重奏》——我曾被迫背下这首诗。在这首诗里，艾略特诗歌中的人物在伦敦燃烧着大火的街上偶然遇见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灵魂，艾略特说他们“互相太陌生了，不至于产生误解”。艾略特诗歌中的人物对叶芝的灵魂说，“我感觉到的惊奇是很平静的，而平静是引起惊奇的原因。所以请说：/我或许不理解，或许记不住。”对于我思想上的转变最简单的解释大概是，我把茨韦看做是一个死去了的大师？我与他待在一起感到很自在？或者，我不应当要求别的，只要求茨韦说话？我坐在黑暗中，考虑如何如何进行下去，我想到了一大堆相互对抗的假设：

- 可能茨韦根本没死(或者，令人难以置信地，是我死了)。
- 或者可能这是茨韦的某个无意识的残留物，他本身的某个部分转变成了某种软件。
- 或者可能他死了，因为我可以理解这个情况，但他的死亡是一个客观性的问题，是判断标准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参考系统的问题。
- 或者可能茨韦是瑞玛，因为瑞玛假扮茨韦很长时间。

这些假设中没有一个能够劝阻我，不要相信茨韦可以帮助我寻找瑞玛，所以我决定直接向他打听瑞玛。

39. 对话被打断了

有什么东西遮住了手机的蓝光，我转过头去看，尽管瞳孔收

缩得让我几乎看不见东西,我还是认出了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的身影。她挡住了手机屏幕的蓝光,让我想起了口香糖上的粉末,然后是骨灰盒里的粉末,然后是黑色的火药,然后是中国人的,然后是烟花,我的思绪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蜿蜒曲折的、毫无意义的小路欢快地跑着。

“我做了个噩梦,”她说,她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起点,“我躺在床上,伸出胳膊去摸你,你不在床上。于是我就醒了,你真的不在床上。”她趴到我身上,我想她是想要看我的手机屏幕。可是茨韦·戈-臣的信是给我的,不是给她的。就算他是她,那他也不是这个她。或者的确只是:我有许多事情要好好地想一想。

我关掉手机。

我们待在黑暗中,坐在天鹅绒沙发上,不知道那狗在哪里。

“你在写信,”我听到她在问,“还是在看信?你在干什么?你不去睡觉,在这里干什么?现在?离开这里?”

在黑暗中,她的声音是那么熟悉——这几乎就像是瑞玛真的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因为没有亮光,可能她真的来到这里了,来看我。可能这是瑞玛。但是就像没有守住承诺的俄尔甫斯^①,我打开了灯——打开了黑莓手机的屏幕,打算核实一下。尽管是熟悉的臀部,熟悉的内衣,可依然不是瑞玛。

① 俄尔甫斯(Orpheus)在希腊神话的故事中,俄尔甫斯是位唱歌非常了得的音乐家,他的妻子被毒蛇咬死,俄尔甫斯得贵人相助闯进地狱营救妻子,冥帝被他哀伤的歌声感动,容许他把妻子带走,但规定他在离开地府前不得回头看妻子,否则妻子将会永远消失,紧张的俄尔甫斯带走妻子时最终忍不住回头一瞥,夫妻二人从此阴阳相隔。

“你不想和我一起睡觉吗？”她吸入蓝光，“这可真奇怪。我不再是你想要的对象了？”

最廉价的黑色举动。热气灌进了我的耳朵里，仿佛她是个克格勃的美女特工，当一个间谍，一个特工，一个刺客偷偷地从衣橱里溜出来，溜出窗户，溜出大门时，她引诱我，让我分心。这时候，我的救星——相当可能是茨韦——渐渐地消失了。“你有没有觉得这房子里好像有其他人？”我听见自己在低声地说，同时在思考茨韦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的重要信息也许隐藏在他的研究论文后面，转变成了气象科学，正等着有人来破译。“或者这房子里有鬼？”

我相信，她冲着我皱起了眉头。

“当然啦，你非常漂亮，”我说，作为刚才对她说的那番话的安慰。“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瑞玛的母亲，这不奇怪吗？她甚至好像都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不知道——或者不了解——瑞玛曾经是什么样的人，这不意味着我的那些关于她正在做什么，她将会做什么，她可能做什么，她绝对会做什么，她绝对永远不会做什么的预言势必会因为巨大的失误而落空吗？因为是‘初值问题’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对现在是什么天气的看法有误，我们就不能精确地预测明天的天气。这是茨韦·戈－臣说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这么考虑问题的话，那么好像我是和一个陌生人结了婚。就好像我们认为这有温度，只是因为摸上去有热的感觉，但实际上是某个其他——”

我就这么说着，凡是我能想到的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期盼我说什么话，我就说什么，好像只是要用一股让人分心的有色烟雾填满空间，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和茨韦通信了。可是那女人把

她温软的身体的前面那部分向我贴过来,进一步封闭了我们两人之间的那一点点光。“求你了,”她低声说。“我看着你睡觉,就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两个人。我们睡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幸福。我们去睡吧,看看明天早上醒来时会想起什么。”她抹着眼泪。那些眼泪来得那么慢。

“今天晚上你是不是非常爱我?”我发现自己在问。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老,老问题?”她埋怨。“我当然是爱你的。就连我不想爱你的时候,我都爱你。”

到了这个时候,我的耳朵不光是觉得热,它们痛苦地充满了血。“我们去找那狗,把那狗带到床上去。”

“不要狗。我想它和我母亲睡在一起。上床去吧。”

我的手机屏幕——相当于半个茨韦——又陷入了沉睡。我拍打着它,想让它醒过来。“带上那条狗吧,求你了,”我差不多是在乞求,又一次看到了一个影子,不是我面前的这个貌似瑞玛的女人的影子,而是早些时候和我一起纠缠在床上的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的影子。

“明天你会和我待在一起吗?”她恳求。

我向我自己让步了,试图在那女人的监视下继续与茨韦对话真是愚蠢得可笑。“如果你今天晚上让那狗和我们睡在一起,”我说,“明天我就和你待在一起。”

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它——杀手——睡在我们俩中间。它把热气喷到了我的大腿上。

40. 真正的要点

不过,别被我的痛苦,别被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的忧伤,别被那狗最终睡觉的位置搞得颠三倒四。真正的要点是茨韦·戈－臣:

- 他起初(在我看来)只是有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名字。
- 然后他(由于瑞玛和我)无意识地变成了成功管理一个妄想型病人的中心体。
- 然后他(由于瑞玛和我)迅速发展成为了一个男女关系的试金石。
- 我经常想像他从我们的冰箱里拿走吃剩的食物。
- 他的研究原来竟是有关瑞玛失踪的第一个重要线索。
- 他后来具体化为与哈维通信的人。
- 但是当我把他搜出来后,他干脆利索地隐退了。
- 他似乎不再被算作是活人了。

是的,大概,根据某些观点,这整个方案里的真正要点是那个茨韦·戈－臣,在我最沮丧的时刻,他以他的方式回应了我。

第二部分

1. 利用多普勒雷达观察计算温度、 气压和垂直速度的方法

在开始比较抽象地过分描述我在巴塔哥尼亚的发现之前，我愿意公开地说出我的烦恼和忧虑。自从开始了这个我本不想采取的冒险行动以来，我忍受着不安和忧虑。我已经再三地、相当广泛地、彻底地考虑过，我能不能把我的感知能力归咎于疾病，甚至归咎于精神严重变态。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做出了一个相当肯定的——令人泄气的——结论，我不能。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的视觉免不了会有——你可以做无数个这样的测验——解释性跳跃。考虑到视觉的“填充”现象（茨韦就是研究这种现象的；这种现象完善了单多普勒雷达的不完全的图像），有时这种现象导致了所谓的“填充误差”（这是茨韦的研究工作所试图避免的）。下面的图像来自一个古老的符号，我以此图像来

说明填充和填充误差的概念：

VIV/AUDI

音乐爱好者很容易把它看成：

VIVALDI^①

而其他人容易把它看成：

VW/AUDI

根本的原因——这原因也能用来解释盲点现象——是由于一些不完全的感性认识——当然，所有的感性认识都是不完全的——观察者用推断来“填充”，他的推断来自经验，或者来自欲望，或者来自欲望的另一面——厌恶。基本上，我们能够看清模糊的图像，靠的是把它们转变成我们期待看到的图像，或者转变成我们希望能看到的图像，或者转变成我们最怕见到的图像。

① Vivaldi, 维瓦尔迪(1678—1741), 意大利作曲家, 小提琴家, 作品有歌剧、宗教音乐、协奏曲等, 以四部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最受欢迎。

换个说法,我们之所以能看清模糊的图像,靠的是已经存在于我们大脑中的、可供归档的图像,不过文件夹上满是灰尘。

比如,一个人死了以后,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陌生人错认为那个已经去世的人,我们那时候经历的就是“填充误差”。我们把远离我们的那个人物的一点儿细节:宽阔的脑门儿,无精打采的样子,有点儿独特的小胡子,以及我们前面讲到的欲望、恐惧和期待填进空隙中,构成了一个熟悉的整体,一个以碎片作根据、令人满意的但有瑕疵的解释性跳跃。一般来说,这个复原的“整体”是不正确的,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很快就能发现我们的误差,当那陌生人走得更靠近我们时,他成了他实际上的那个人,而不是我们以为的什么人。(当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第一次走进我家时,即便我是从远处看她——站在门口,湿淋淋的头发,淡蓝色的手提包,黄褐色的小狗崽——离得那么远,甚至在疲劳的状态下,我都可以很容易地适当地填充所有缺失的细节——但那时候我就知道她不是瑞玛。多奇怪,不过倒是挺让人放心的。)

但是,除了认识到我们的解释性误差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研究分析那些误差来了解我们自己大脑里的内容——欲望和先入为主。

我们同样可以考虑疑似精神病的“误差”,即观察精神病的现实的视觉和舆论观点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对这种误差的研究分析可以(有时,可信地)揭示出与疑似精神病人头脑里光怪陆离的碎片(奶粉的味道 + 患有白内障的老太太 + 深蓝色毛衣上的洞 + 新出炉的椒盐卷饼 = 椒盐卷饼厂的老工人盲目喝下去的深蓝色毒牛奶)不同的一些事情。因为尽管精神病经

常普遍地被认为是感染,或者是一种陌生的人群,但事实上精神病就像梦一样是可以解释的。精神病的内容直接来自精神病患者的头脑,它的形成可以说是心理失常。(考虑到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宗教的精神变态的严重影响已经明显衰弱,然而好色之徒的影响上升了。这肯定不是精神疾病,但社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虽然我们可以把将现实转变成另类现实的过程称作“癫狂”,但我们不应该忘了另类现实的风景,它是由分子组成的,来自那疯子自己的平凡的生活。所以,每一个精神病人的体验就像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

调查研究特有的“误差”起源,从理论上讲,可以解决辨别预言家是不是疯子这个众所周知的难题:如果“精神病”是原文,那么你能猜到谁是它的作者吗?如果原文反映了恐惧,欲望,或者对“苦恼”的期待,那么他或她非常可能已经创造了他或她自己的幻象。一个害怕老鼠的人也许幻想出了一个鼠王;一个看电视看得如痴如醉的人也许相信有一档她自己的晚间脱口秀节目;一个看骑士小说的人也许相信他自己是一个游侠。但是:如果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汽车工人声称几根灵草正在密谋策划推翻厄瓜多尔政府时,在假定这又是一个自编剧本的病例之前,你至少应该听一会儿。他为什么会那么想?他喜欢厄瓜多尔的什么?也许喜欢草?如果一个故事似乎太随意了,或者太精彩了,就一个“疯子”而言,他自己是想像不出来的,那么就该考虑这个“作者”也许是现实存在的,而那个“疯子”不过是个读者。毕竟,只有现实可以逃离我们想像力的限制。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

当瑞玛失踪后,我决定将我自己当做我的病人。于是,我问

我自己,这个新世界是不是我“写”的,还是我只是在读它?“事实上”在那里究竟读到了什么?好吧:我从来不想或者害怕或者期待由一个相似的人来代替瑞玛,我也从来不想或者害怕或者期待卷入控制天气的阴谋里。如果我因为瑞玛患上了精神病,我肯定会表现出比较平庸的形式:我会深信,她在和其他男人或者女人约会;或者她打算谋杀我;或者她在一间按摩院里兼职;或者她压根儿不存在,她一直以来只是个我想像中的人物,是那些我想要得到却从来得不到的女人们的化身;或者她是(啊!)我的妈妈。我不会上演这出戏的,那正是我当前的实际生活。我没有那些念头。

由于我无法在我奇怪的新世界里找到我的创作才能,我只能断定它被准确地感觉到了。这是根据可以确定的数据做出的最有理据的推断。预见到了辛苦的气象工作肯定会有一些结果的,哪怕是出乎意外的结果,哪怕是我无法预测到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做出立即南下去巴塔哥尼亚的决定觉得那么有信心的原因。我承认,这是个有点疯狂的计划,不过是这个计划降临到我的头上,而不是我想出来的,所以我认定这是一个应该予以听从的计划。

2. 不同的多普勒魂魄效应的案例在实施中

我又仔细地想了想茨韦论文里的图表。这不是一个男人不情愿地离开的图像吗?这不是我的画像吗?那图表显示出我离开了我的公寓,然后舒舒服服地待在瑞玛的老家,为的是继续我的忧伤,继续我的不确定的搜寻。多奇怪的相似之处。

可是在我持续搜寻瑞玛的期间,我冒冒失失地申请了一份气象工作(假装成一个叫阿瑟的年轻的冰山攀登手),而我对这份工作一点儿准备都没有,这不是更奇怪吗?偷偷摸摸地从玛格达家浴室的窗户里爬出来,花全价雇了一架飞越罗尔沙赫山脉的上下颠簸的飞机,顶着来自蓝色的阿根廷湖的狂风,在阿拉法特城人造的圆木建筑物中寻找合适的避风处,在那个枯燥无味的旅游城镇的人行道上见识了一场有损尊严的“即兴的”探戈舞表演,当我路过一个叫做吉珂德的大房子时,心怀不必要的自我怀疑。在经历所有这一切时,我几乎没有想起过瑞玛,而令我念念不忘的却是茨韦·戈—臣,这不奇怪吗?

我问我自己,是不是我那古怪的有导向的意志薄弱的注意力真的把对瑞玛的感情换成了——变成了——对茨韦的感情。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我能够从这种移情别恋中获益。如果我找到了我对茨韦·戈—臣的感情日益增长的答案,那么我也许可以——我推理——解答我对瑞玛感情的问题。如果我可以确定茨韦·戈—臣神秘的位置,是不是我可能就不知道瑞玛的下落了?或许根本就没有移情别恋这么一说;茨韦那么帮助我,我对他日益增长的感激大概是正常的。离开之前,我写信给他,告诉了他更多的有关瑞玛的情况,告诉了他劳拉给的那份工作;茨韦把我当前的生活重新定为诊断—预测性问题,就像他自己的“恢复理论”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他将我的情况和一个希腊英雄的情况做了个对照。“去南方,”他命令我,“你肯定会了解到一些事情,了解到一些有关你自己的事情,了解到一些皇家气象学会的工作。”他非常耐心地听我详细列举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如何与我原来的瑞玛不同。是的,他像一个真正的朋

友那样在倾听。

*

*

*

我在一家可爱的小旅馆里的非常雅致、对古代文明充满敬佩的过厅里等候房间——茨韦的论文特别提到：“模糊地感觉到的数据……可能是极其不充分的……”——我在过厅里一个著名的地炉前烤火取暖，口袋里的振动惊扰了我。我打开手机。

“喂？喂？喂？”

我听出是瑞玛的声音，或许是因为我想要相信打来电话的人是瑞玛，但也或许是因为这声音听上去的确像是她的声音，不过大概只是因为一个新的刺激以惊人的速度压制住了旧的刺激，这些天我听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说话比我听到过的真正的瑞玛说话要多得多。

“你又玩失踪啊，”那声音透过讨厌的眼泪传过来。

“我可以问问我是在和谁说话吗？”我礼貌地提出问题。

“是我，利奥。你知道的，”还是那个悲伤的声音。客观地讲，那声音不如瑞玛的声音那么尖锐，不如瑞玛的声音那么讨人欢喜，口音也不如瑞玛的重。真正的瑞玛会立即切入主题，不管她处于什么样的情绪。她会问我到底在哪里，她会订好飞机票，可能也订好了我的飞机票，而且她已经给旅馆经理打过电话，订了房间。

“你的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我问。

“你知道我在哪里，你走了，你这么做就像我是个很难找到的人，”她说，试图进行——我不得不相信——一场判断标准的争论。但是判断的标准显然正在改变。

我决心继续进行分析,不要感情用事地被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吓住。这是有点不好的移情别恋。“请讲清楚,你的确切位置是在哪里?”

“真是疯了,”她说,还在哭,“太自私了,就为了从我身边失踪——”

不过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失踪了,也没有什么人失踪了。除非物体的质量被转化为能量。但是质量转化为能量对人不适用,基本上永远不适用。(我想到,阿根廷人是不太会那么不准确地使用“失踪”这个词的;这倒像是美国人在九月十一日举办野餐会。)所以我认为“失踪”这个词一定是很傻的。是的,不光是傻,而且也是错的。之所以说它是错的,是因为人们一般只是离开,或者被带走。他们只是看起来似乎是失踪了。

“如果有人失踪了,”我一字一顿地冲着电话里说,随手漫无目标地翻着一本小册子,以此表示我的存在,在真的巴塔哥尼亚!“那不是我。而如果瑞玛失踪了,如果这是理解瑞玛失踪的正确的表达方式,好像越来越可能是那样的,那么这似乎完全有可能你至少是部分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与这件事有牵连。不管怎么说,茨韦是这么认为的。顺便说一下,瑞玛会很好地处理这种事情的,她会控制,她决不会让我走——”说到这里,那女人突然提出抗议,试图列举种种回忆来“证明”她是谁——她还提到了我们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里遇到的那些个头特大的狗——但是我固执地说下去。“因为你能够蒙骗玛格达,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瑞玛了,她看到了她凡是她想要看的东西,但这不意味着你可以认为羊皮遮住了我的眼睛——”在说到这个隐喻的时候,我想到了一幅不可否认的精确的真正的瑞玛

的图像,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床上挨着我的身体,感觉到她的胳膊绕在我的腰上,感觉到她的膝盖在我的膝盖之下,感觉到她的呼吸吹在我的脖子上。短暂地,非常短暂地,茨韦从我的脑子里消失了,而完全被瑞玛占据了,或者应该说是被由瑞玛出走而引起的痛苦占据了。我说,“我遇到的陌生人比你更容易让我想起瑞玛。你,你做的那些事的确不是你所擅长的。你不明白的是,丈夫和妻子是真正的密切而又亲密的关系。你试图要成为从根本上挽救了我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使我觉得我的的确确是存在的。我们谈论的是一种爱。我曾经把那爱给了她。你骗不了我。你似乎不懂得相当亲密不是近似相当亲密。近似相当亲密什么都不是。甚至连根香烟都不如。”

我说你做的那些事的确不是你所擅长的,大概有点儿刻薄,有点儿过分。毕竟,我真的知道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做过”什么吗?模拟不是她的终极目标。

但是电话那一头的人不是瑞玛——对此我敢保证。于是当我凑近那个假的地炉(烧的是煤气,不会燃烧的假圆木是装饰)取暖时,我对自己这么说。电话里的瑞玛不会还在哭吧?那个女人已经完全停止说话了。于是我挂断了电话,不管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要跟我说什么,大概只会听到更多的回忆,我不想听了。我离开地炉,觉得眉毛上有类似露水那样的东西,我走过住宿登记台,拐过一个弯,走进贴着牛仔标签的洗手间,想用热水洗洗手——我以前就这个习惯做过解释,我相信我做的这件事是非常正常的——但是热水没有立刻流出来,我等了会儿,然后想起来标着字母 C 的水龙头才是热水, C 是“caliente”的首字母,在西班牙语里是“热”的意思,我沮丧透了,因为这是最简单

的问题。我想回去,我想回家,回到我和瑞玛的那个公寓里,回到我们曾经捏造出(或者说发现)茨韦·戈-臣的那个家。我想让所有的一切回到以前的那个样子,即使这意味着瑞玛撅着嘴坐在沙发上看报纸——那报纸上的文字我不懂——原因不明地和我生气。瑞玛对她的前夫比对我更好?他是怎么对待她的呢?我是怎么对待她的呢?他们互相给对方起的外号是什么?他们互相之间用哪一种语言说话?可能我并不想知道这些细节。我寻找瑞玛,我只是想要找到她,不想发现其他太多的事情,不想发现任何我绝对没有必要知道的事情。至于茨韦,我打算查清楚有关他的所有事情——他的可能的死亡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对于瑞玛,就不用知道那么多了。(我猜,我发现了我不想发现的事情。)我不愿意去想她的另一个丈夫,不管他是谁。我不愿意去想我也许穿的是另一个男人的衣服。我不想知道他和瑞玛做爱的姿势是否很独特。我不愿意去想瑞玛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男人,实际上是不愿去想瑞玛和其他男人之间的性爱。事实上,我成功地把这些想法全部挡在了我的大脑之外。我觉得有点儿冷了,这样倒是比较容易防止那些想法联合起来,因为最后它们——那些想法——几乎无法再证明它们自己是不相干的。

我也用热水洗了洗脸。

3. 重要的侵入

那场对话,它铺设的分析轨道是绝对错误的,而我的思维却在那些轨道上跑来跑去;尽量详细地叙述,以此清理我的头脑,

重新铺设分析轨道。走在这个人造的旅游小镇上,看着淡蓝色的冰川,皮肤被寒风吹得很干,莫名其妙地妒忌正在拌嘴的家庭,我想起过去瑞玛说过巴塔哥尼亚被认为是阿根廷的未开化的无意识的荒蛮之地。我想,要是那样的话,那么这是一块用无意识的乐高玩具拼搭出来的大地,整洁,寒冷干燥,没有香味。纯净的冰川,清晰的路标,安全的防护措施,伪装的南美牧人兜售着昂贵的骑马观光。一些潜意识。然而,也许这就是我们脑子里想像的所谓“荒野”。人类也许真的是那么无聊。

我的那份气象工作定于从星期一开始——这份工作可能会把我引进大气的潜意识里——但是,说实话,直到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让自己更加接近瑞玛,我的目的是什么。天上开始下小雨了,我把这看做是回旅馆的信号。

*

*

*

在旅馆的过厅拿了一份晚报,我开始看一篇有关黑猩猩与人类杂交的文章。我经常 would 想这类事情。因为我总是会觉得心里难受,这种难受的感觉很容易出现在我看到的像猩猩一样的人类(包括我自己)身上。一个人要一杯咖啡;有人不排队加塞儿,一个人就生气了;一个人全速向汽车停放器跑去,在往里塞钱——依我看来,这些人都是猩猩。而这种感觉不会产生出猩猩们更加真实的神秘的情感生活——这是一种选择。而这使得所有的人(加上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发型,他们热爱的潜意识)好像都显得极其滑稽可笑。正常而荒谬的生活。她爱你——谁在乎啊?她离开你——那又怎么样?用长长的胳膊挠挠你自己的胳肢窝,继续挠个不停,或者不挠了。猩猩的行为:只

是感觉,根本不是严密的思维。不管怎么说,看了那篇有关杂交的文章,又看了一篇有关立法的文章,那文章要求就在女时装店里出售较大尺码的衣服立法,我开始成功地忘掉了那场电话交流,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哈维。

他坐在靠近煤气地炉旁的一张又矮又宽的沙发椅上,优雅地跷着二郎腿,露出了女孩子似的细小的踝关节,苍白的皮肤映衬着金属丝般的黑色汗毛。他穿了一件毛衣,毛衣塞在裤子背带下,里面露出衬衫的袖口和领子。他好像正在忙着摆弄他的小镜子,仿佛没有注意到我。

我合上报纸,报纸的讣告专栏露在了外面,这似乎有点儿讨厌。这让我想起了茨韦。于是我打开报纸,重新折了一下。

这时候,哈维从沙发椅上站起,朝我走过来,我也站了起来。他一把抓住我的前臂,坚定而有礼貌地摇了摇。我听见他说,“我以前认为您心里是比较惦记我的。”

是啊,我们俩都有两条非同一般的长胳膊,我们摇晃着胳膊的这个样子,说不定可以在动物园里看到。“啊。怎么是你?”我说。

“到目前为止,”哈维说,“我度过了一段非常不可思议的日子。”

“你是不是认为,”我说,对他的开朗感到疑惑,“我应该比较担心你?”

他做了个要我坐下来的手势。“您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利奥医生?”

我本来想要拒绝这场已经开始的谈话,不过这是我骨髓里一些细胞的想法,一些谦卑的营养不良的细胞占据了我脑干里

的控制室。“你是不是认为，”我低声地说，坐了下来，“如果我真的在乎你，我就会在报纸上登个广告？”

哈维也坐了下来，然后鬼鬼祟祟地把身子探过来。“为什么您要登广告？”他把重音放在“广告”的第二个音节上，这让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不自然——这让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像他本人——我也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个显示比我优越的举动，仿佛我刚才发音不正确，或者是下层人的发音方式。“在广告上，”他继续说，“写什么呢？”

我放声大笑。我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公开地，或者甚至比较明确地宣布什么事情的想法，在报纸上登个广告的想法，在我看来是非常奇怪的，就好比，每当我发现自己走近一个很高的栅栏时，“狗儿们的神秘生活”这句话就会突然未经邀请地闯入我的脑海。我是不是应该登个寻找瑞玛的广告？我真的有这个想法吗？我是不是认为，完全靠我自己的力量来寻找瑞玛，只是敷衍而已？就像往常那样，我母亲仔细查看报纸上分类广告的画面大概又在我的脑海里升起了一半。通告什么？是有人在找她的通告？我肯定理解错了。她总是非常认真地查看报纸，就那么皱着眉头，撅着嘴，我想——当我看到她那个样子的时候——她简直是傻到家了。或许我还想到了在报纸上登广告的一个应声虫，那就是一个傻乎乎的朋友有一次对我说，你可以在报纸上登个广告，找你的父亲。这是我听人说过的最讨厌、最愚蠢的话。我不找我的父亲。我不需要见到他，不需要同他说话，不需要知道他在哪里，不需要知道他穿什么衣服或没穿什么衣服。真的，我几乎已经把他忘了。没有原因让我相信他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或者特别聪明的，或者长得特别帅的人。（我只能

推测这是环境的影响——无意识的巴塔哥尼亚,瑞玛灌输给我的——促使我对自己提出了如此平庸不堪的问题。)

“是啊,”我终于说道。“在广告上写什么呢?”我好像是在念一句台词。“一个多么傻的问题啊!”为了强调,我放声大笑,然后想像着报纸突然变成了肉贩用来包肉的皱巴巴的包装纸——从前好像是这样的——被撕碎了,像五彩纸屑飘洒下来,飘到椅子下面。

我把椅子稍稍地朝地炉那边拉了拉。

哈维也把椅子朝地炉那边拉了拉。

“我听说了,”哈维说,声音很轻,“您的事儿,利奥医生。我想表达我的慰问。”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

“您的妻子,利奥医生。我听说了。她的事情。”

“可是,这是我私人的事情,哈维。这不关你的事儿。谁什么时候跟你说了什么?”我努力回想我大概跟谁说过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的事情。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密集的篱笆,然后一个我,一个和我长得极像的我,从篱笆后面冒出来,我应该对那个我说过的话和采取过的行动负责。没有想起任何有用的事情来,倒是听到了那个夜班护士的笑声。

“戈-臣博士,”哈维说,“告诉我的。”

“你是说瑞玛?”

“我是说茨韦·戈-臣。”

“我想我告诉过他。”虽然我并没有要求戈-臣博士为我保密,但我还是觉得被人出卖了。

“戈-臣博士告诉我的。”

“他告诉你的？”

“是的，他提到了这件事儿。也提到了您在这里。他也很挂念您。我不认为这是秘密。”

“噢。噢，是的，很好。当然不是秘密。我没有什么秘密。”

“我想要表达我的慰问。我想要告诉您，我愿意尽我的能力帮助您。”

4. 认识论的新进展

他当然也想得到我的帮助。哈维问，他能不能与我合用一个房间。他说他没有钱了，我当然同意了。我想不出会有什么不愉快的后果，说实在的，我觉得应该答应哈维的请求，好像是我遗弃了他，好像逃跑的人不是他，好像把他派出去是我的失误。或许好像他是瑞玛。我不能因为某个孩子气的冒险念头而再失去这个人。

“您的妻子，”哈维说，在我的（临时的）床上坐下，“我想知道她是怎么被牵扯进来的。您认为 49 位量子教父在找什么？到这里来的一路上我都无法睡觉，因为我担心他们在寻找绵羊，就是您一直以来听说的巴塔哥尼亚羔羊。您不认为他们是在寻找像绵羊那样的活的动物，是不是？这是从未有过的。也许是果树。我敢肯定，如果您在南美大草原增加风力，甚至都不用增加太大的风力，您大概可以在一夜之间毁掉全部的水果收成。樱桃，苹果，桃子——都掉在地上，摔个粉碎。大片的农田覆盖着摔碎的水果，任其腐烂。您的妻子是那种沉默的能忍受痛苦的人吗？您认为这种事情会摧毁她的意志吗？对不起，我不该这

么问的。您当前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看着哈维说话,我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著名的精神病学案例。一位杰出的伦敦茶叶商相信,利用催眠术控制人们头脑的邪恶的“喷气帮”已经践踏了法国的和平。这个茶叶商被关进了疯人院,不过最后证明那个商人被扣留在疯人院主要是应政客们的要求,而非任何医学上的原因。虽然那商人说到的情况的细节是虚构的——法国没有什么喷气帮——但他所说的核心部分确实是真的。他为了和平对议员们进行游说。我要说的是:不管怎么说,哈维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同盟者。而瑞玛一直很喜欢他。

我告诉哈维(没有泄露我的假名),我——我,而不是我们——下个星期一就要开始为皇家气象学会工作了。这就是我的计划。

“可是从现在到星期一有五天的时间,想必您不会无所事事地坐等到那时候吧,”哈维说着身体向后倚靠在胳膊肘上,就像以前的那些百事轻怡电视广告里的女孩子那样。很像瑞玛的姿势。“戈-臣博士认为您应该做什么?”

经过思考以后,我意识到我和茨韦谈到的主要都是,嗯,诗歌。内心的东西。“我没有问过他,”我承认。真是难以理解,我和茨韦竟然没有进行过最实际的交流。“我们只讨论过风寒指数的研究,”我说。“风寒指数与战争的关系。”

“也许我们应该给戈-臣博士打个电话?”哈维建议,语气果断,与此同时他整个人躺倒在了床上。

我清楚地——非常清楚地——告诉哈维,不久以前我和茨韦限定我们只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

“如果你们俩之间有什么不和的话,我相信我有资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哈维是冲着天花板说出这句话的。一瞬间,我以为哈维又在说我和瑞玛,不过他当然说的是我和茨韦。“我们现在不能容忍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了,利奥医生。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

*

*

*

最后,我终于同意,我和哈维一起用我的黑莓手机与茨韦联系。哈维立即开始实践他的联合理论,这让我大为苦恼。有人也许——我也许——认为茨韦会因为哈维不够正常的荒谬想法而退却,然而——尽管茨韦用许多订正来还击哈维——他们两个人兴奋地在网上打过来打过去,有点儿热情洋溢。我想起了(一)看着瑞玛为哈维制定治疗方法;(二)一个我从来没有过的兄弟不见了,我不得不与或许会让我讨厌的人对抗。但是他们就在这里。在一个小时之内,以我最小的投入,茨韦和哈维就查明了交换瑞玛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行动步骤,以便从我们的世界里收获混乱,并将混乱带到临近的一个世界里去,那狗很可能是个极为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特工,巴塔哥尼亚摧毁收成的狂风——找的不是绵羊,是水果——很快就会得到有效的利用,但不会早于星期一。不过,这不是一场规模比较小的战斗,而是一场关键性的战役,理解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这场战役也许会颠覆我们对我们的——我的和哈维的——世界的完美的认定。将可能性根除是危险的。一个固定的秩序隐隐地出现了。如果我们输了,所有的一切都将嵌入格言式的纪念碑里。未来就像过去一样是不可赎回的。肯定的。瑞玛还处于困境。

“有一件事我搞不懂，”我觉得必须提出来，“就是你们俩怎么会知道星期一以前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直觉告诉我这是唯一一个不可信的细节。难道是瑞玛治疗法的发明和茨韦与哈维交流的现实性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让我感到焦虑不安了？不是的。我反倒因此而感到欢欣鼓舞。使我感到难为情的是，对于茨韦死亡的迹象，我已经不看重了。但是，如果我是在和一个死人交流——似乎我是在和一个死人交流——那么这个世界与我所想的世界根本上是不同的。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那么光是接受以前似乎不能接受的事情是不够的，我应当做更多的事情。我应当追究这个新真相的合乎逻辑的含义。如果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话，那么茨韦是在哪里和我们进行交流呢？如果不是通过某种侵入，他怎么会在我们的世界里呢？如果这样的侵入是可能的话，那么不是很明显有人会利用这种侵入吗？还有，我开始考虑，在我一生中经历过的巧合中有这种似乎说不通的具有侵入性质的巧合吗？无缘无故的恨。无缘无故的爱。突然爱上瑞玛。有时没有原因地对瑞玛发脾气。没有理论支持的绝缘材料的作用不会使大多数人把这种绝缘材料理解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秘种类的侵入吗？茨韦和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不也是相当高深莫测的侵入吗？而哈维和茨韦有关一个即将来临的固定秩序的想法与艾略特的诗不是具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吗？为什么我的九年级老师要我们背熟那首诗？沿着我们没有走过的过道 / 走向我们从未打开过的门 / 走进玫瑰园 …… / 但是为什么 …… / 我不知道 …… / 我们应该跟随吗？

“我有内部情报，”茨韦写道，于是我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当

下。“因气候而进行的卓绝的战斗，外行人是根本不会注意到的。外行人只是对着气候的‘随意性’耸耸肩。幸运的是，这次有狗，”茨韦继续写道。“那狗是一个真正的错误，不是吗？不是错误，就是那狗对这一切是极为重要的，那狗总是很引人注目，对于引进它，他们没有选择。”

哈维和茨韦就有关“这个”可能的“引人注意的中心”交换了意见，然而，按照计划——毕竟，这是对话的最初目的——茨韦说，他认为在星期一之前，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密切监视天气。

“就这个吗？”我写道，代表我和哈维。

“不满意，是吗？”茨韦回答。

然后是停顿。没有什么事情的停顿。

“你觉得，”我问，心里升起朦朦胧胧的希望，“我会和皇家气象学会里的谁一起工作？”如果我有一个假名，也许我的顶头上司——假定是希尔达——也有一个假名。

茨韦说，他说不好我会和谁一起工作。然后——让我吃了一惊——他又问我——我说明，他不是问哈维——是怎么发现他的研究工作的。准确地说，我是怎么找到他的。

“我的妻子梦见过你，”我写道。我接受那是个闹剧的宣告。因为这个宣告，从某一个合适的立场上来看，是真的。就像茨韦的研究论文里写的：加一点点白噪声到模型里，还有一点点蓝噪声，而这些小心引进的错误将戏剧性地增加恢复领域的现实性。

那天晚上，我把床让给哈维睡。“我觉得安全多了，”他说，“现在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至于我自己，我睡在地板上。

5. 毫 不 费 力

第二天早上，下雪了，粉红色的光线静静地从外面透进窗户。我梦见了瑞玛。她把手绢舔湿，然后帮我擦脸，我的嘴唇边上沾着巧克力。房间里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梦境变成了感觉，瑞玛，我的真正的瑞玛，已经烧开了一壶水，我们是在我们自己的公寓里，她穿着淡黄色的衣服，那是她最漂亮的时候；她在跟我讲茨韦·戈－臣的事情，讲照片上他穿的那件衬衫，那张照片贴在（曾经贴在）我们家的冰箱上，讲茨韦怎么会是49位量子教父的一员，不过这49位量子教父不是我们的敌人。我过去常常做一个简单的重复出现的梦，简单得几乎令人尴尬。在梦里，我走进一间屋子，会有一个女人在那里，然后我就问，你到哪里去了？我以为你死了。然后她会回答，哦，我就在这里啊，只是你没有往这里看，我觉得你是不想往这里看。说到这里，她微微地撅起下嘴唇，也许眼睛也湿了。好像你不想我似的，她说。

于是，我觉得瑞玛就在我的身旁，可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睡在只铺了一条单子的地板上，我看到的物体不是我的，不是我们公寓里的：一幅群马的油画，它们的鬃毛迎风舞动，但那风没把别的东西吹起来；一张褪色的照片，夕阳下的粉红色冰川。随后，我看到了哈维，他的头缩在毯子下面，只看得见握成拳头的手。这时候我想起来了，或多或少地，我在哪里。

电话铃又响了。

“喂？”我说，把话筒贴在耳朵上。哈维的身子动了动，但好

像没有醒。

“有一位女士在等您，”一个辨认不出来的、带着口音的女性声音对我说。

“茨韦，”我说，“是你吗？”

“不是。在这里。楼下。她在等您。”那声音说，然后挂断了电话。

*

*

*

我没有立即冲下楼去。我洗了一把脸，把脖子后面也洗了洗；然后刷牙，用牙线清洁牙齿，然后再刷牙；使劲地洗手，洗掉指甲里的污垢；至于耳朵，我没有棉花签，但我尽力把它们收拾干净；那条玛格达给我的裤子，我注意到口袋边上有一个小小的洞，我找出一个缝纫包——这家旅馆预见到了每件事情——细心地把那个洞缝好，并且用非常相配的灰色线加固了口袋边；纽扣也坏了，于是我换了一颗金色的扣子。不管那个女人是谁，不管那个女人为什么这么早就在等我，我只是想要把自己收拾干净，打起精神来。

6. 恢复领域的现实性

在楼下等我的那个女人不是瑞玛，而且她也不是貌似瑞玛的那个女人，她不是——莫名其妙——茨韦或者茨韦的妻子。她是瑞玛的母亲，玛格达。玛格达：昨天晚上我们竟然没有说起她，也没有研究过在即将来临的天气大战中她的角色，她或许不重要，不过她慈母般的光临增强了我内心不愉快的自我意识。

“真没想到，”我说，想要表现出很激动的样子，但没有成功。刚才我以为在等我的女人或许是瑞玛，我想回到刚才那个时候去。“真对不起，我没有跟您打个招呼就走了，”我说，用词的选择受到了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的影响。“我应该提前把住宿费付给您。为了这个，我的确是打算回到您那里去。”她坐着，我站着。她的目光放在我的裤腰和那颗金色的纽扣上。“我真的——”

“不，不，我不知道你是我的女婿。”她的笑声听起来很紧张，很不自然。“有那么多事情瞒着我。我一直不知道你是谁，明白吗？这真是滑稽。我们的处境真是很奇怪。”

我不想告诉她用“啼笑皆非”来表达比较准确、比较简练，因为我们的知识水平不同。

玛格达接着说，“那几条裤子，你穿起来那么合身，裤子口袋也没有撑得变了形，这也很奇怪。就连衬衫袖口的尺寸都是分毫不差。”

那么精确地描述我穿的衣服，这让我觉得她是要说，我穿得像茨韦·戈－臣。或者，至少穿得像那些照片里的茨韦。

“听着，”她对我说，“我想跟你谈一些事情，”她看了看过厅四周，过厅里有一个旅游团，导游举着一面白色旗子。“一些神秘的事情。非常神秘。我们可以去哪里谈呢？”

我应该给哈维留一张纸条，让他知道我在哪里。这么做才是合乎体统的。就连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我都是以礼相待的。第一次，我就这么离开了，打算尽快返回来。

7. 灵敏度研究

我们找到一家离旅馆最近的咖啡店,该店声称把古代土著德卫尔彻人的精神引入了他们的茶中。“听着,”玛格达把手从桌子那边伸过来,抓住了我的手,鬼鬼祟祟地用她那怪怪的英语低声对我说道,仿佛英语是某种晦涩的神秘的东欧间谍的语言——比如匈牙利,或者阿尔巴尼亚——附近没有人听得懂。“我得告诉你,瑞玛和我联系了。”

“什么意思?”我问,“她和你‘联系’了?她不是和你待在一起吗?”我觉得需要参加到先前的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是真正的瑞玛的猜谜游戏里去。

“不是,不是的,”玛格达说,好像有点儿被口水噎着了。“不是你在我家看到的那个女人。真正的瑞玛来联系我了。我现在明白了你一直想要说的话,明白了你一直怀疑另外那个女人,你是对的。”

我想要她来确定我的那个很难让人理解的信念吗?不要。“您是怎么知道和您说话的人是真正的瑞玛?”我问道。

“我一看见她,我就知道了。是她。”

根据玛格达颈动脉的跳动来判断,我猜想她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动。茨韦,哈维,现在是玛格达:过分的证实其实是起到了破坏的作用,而不是增强我的信念。“您看到了真正的瑞玛?”

“是的。”

“为什么她不和您一起到这里来呢?”

“嗨,因为,”玛格达伸手拿起面前的空杯子,送到嘴边,抿了

一口,然后把杯子放下。“他们为什么不问问我们还要些什么?”扫视着咖啡店,她又加了一句,“这里的服务太差劲了。”她不说话了,把目光停留在我的下巴上,下巴上的胡子没有刮。我把自己浑身上下都收拾干净了,怎么就会忘了刮胡子呢?“有些,嗯,我的意思是,有些复杂的问题。”

好像这是一个出了问题的手术,或者是一份心肌梗塞之后的病历报告。

“有牛角面包吗?”我问一个突然出现的女服务生,她正在打哈欠。

“我要有机茶,煎蛋,牛角面包,一点草莓果酱。还有一小碟土豆。请多给几张餐巾纸。”

她饥肠辘辘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可疑。

“我要把瑞玛跟我说的话一字不差地告诉你,”女服务生走后,玛格达宣布。她从一个硕大的钱包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坐标图纸——淡蓝色的线条画出一个个小格子——开始读了起来,“一,她说她爱你。二,她说你把哈维的失踪看得太重了。她想要让你知道,不管你有什么疑虑,她保证都可以对你解释。她知道有许多事情需要向你解释,这是第二点的主要意思。对不起,再具体一点的事情我就知道了。接下来是第三点,这是最重要的,她说她需要你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他们让她在东京郊外的地球模拟器中心做翻译工作,情况变得糟糕透了。她说这都是沟通不良造成的。那里的一些科学家错误地以为她有改变天气的能力——瑞玛说你会明白她说的意思——她当然没有这样的能耐,她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希望很快能弄清楚。她还要我向你解释,她没有把这份工作告诉你,她表示对不起。但这

是一个新的发展,她想要在没有你的帮助下,自己找到一份工作,然后让你大吃一惊,并且用她自己挣来的钱请你去旅游——”

“可我们是结了婚的啊,”我打断了玛格达的话。

玛格达耸了耸肩,看着手里的坐标图纸,继续念下去,“她说要你帮助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个办事处,失踪人员亲属协会的办事处。她的母亲——就是我——可以带你直接去那里。如果你可以得到文书工作,从外部开始,她在内部工作,希望一切都可以定下来。快一点,快一点。”

我们点的早餐来了。

玛格达把那张皱巴巴的纸折了六七下,把它放进特大号钱包的深处。她看着盘子里的煎蛋,那煎蛋也在看着她。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

尽管我不饿,但为了显示情况正常,我咬了一小口牛角面包。然后,我随便地问道,“谁让您到这里来的?”

“我跟你说过了。瑞玛让我来的。”

“瑞玛她自己为什么不来见我?”

“我刚才说过了,”玛格达手里拿着叉子,切开蛋黄。当蛋黄流出来的时候,她吓了一跳。“她困在”——蛋黄流到盘子边上——“那里了。在日本。”

她的蛋黄让我以为她会说,朝阳映照下的大地。我的脑子里出现了费·唐娜薇被金刚抓在手里的画面。但那不是电影里的费·唐娜薇,不是电影里的怪物,脚下不是电影里的土地。那是完全错乱的画面。“那么您是怎么得到她的信的?”

玛格达放下手里的叉子,又伸手去拿杯子,这一回杯子里盛

满了有机茶。她把杯子送到嘴边,不过我觉得她没有喝。“她来看我。时间很短。然后她得飞回去。”

玛格达给我讲的故事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这让我更加确信,看来我不是那么容易被影响的,可是我却奇怪地同意了茨韦和哈维的看法。我——和玛格达在一起——咬了一大口牛角面包。干硬的外皮划痛了我的上颚。“您告诉我的是,瑞玛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东京的地球模拟器中心。通知她的母亲——她几乎不与她说话——她身处险境。以便让她的母亲来告诉我。然后瑞玛飞回东京,回到抓住她的那些人的怀抱里。不来看看我? 而是交给您一张皱巴巴的纸?”

玛格达抓住我的右手,显然没有任何性的含意。“我,”她说,我的手腕裹在她那只冰凉的手里,“犯了个错误。”

“好吧,”我说,为了显示我的自信,显示我的从容应对,我用不灵巧的左手拿起面包又咬了一口。突然,我模模糊糊地想起了哈维,他在睡觉,还是醒了,独自一个人,大概在想我到哪里去了。

“我的意思是,”她说,松开了我的手,“我没有说清楚。我没把话说清楚。我是说,瑞玛找到了一个机会,在日本,一个自由的机会,她利用这个机会给我寄了一封信,是她的信来看我了。”

“她的信,”我干巴巴地重复。

玛格达把手放在大腿上。“她在计算机上给我发了一封信。”

“那么您凭什么认定那是她发来的? 任何人不是都可以通过标着她名字的电子邮件的户头发信吗?”

跟茨韦和哈维和我的说法不同,玛格达的“说法”缩了回去。“我说的不是电子邮件,”她说。“信是通过另一个阿根廷人送来

的。通过我们俩的一个朋友。那个人刚好也和她一起在那里。他是很可靠的。如果那不是真的瑞玛，他会知道的。我的意思是，感谢上帝，他在那里，所以他可以把信送出来。”

我注意到，玛格达的盘子旁边堆着撕成了一条条的餐巾纸。那堆餐巾纸像是个奇怪的海洋动物，被海浪冲上岸，奄奄一息。她是在什么时候把餐巾纸撕成那样的？“她的另一个丈夫？”我拉长了声调。

她没有理睬我，拿起叉子吃了起来，吃得相当快，显示了她的吞咽能力。

我们吃了一會兒，几乎是在比谁吃得快。

我们又添了热茶。

“您真的相信您收到的信是瑞玛写的？”我终于问道。

一缕头发挂在玛格达的脸上。“哦，是的。是的，肯定是她的。”当她撩开脸上的头发时，我可以看到她的大拇指上挂着一些餐巾纸的碎片。

“我知道，”我说，尽可能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我们相互不是很了解，可是我觉得好像我们互相很了解似的。这是我的一个感觉，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要再问您一次的原因：是谁派您到这里来的？大概有人给您讲了一个美丽的故事，要您站在他们那一边。显然瑞玛没有从您那里学会撒谎，因为您根本不擅长撒谎。年轻女人好像会撒谎，而母亲们不会撒那么多的谎。别担心，我知道，您是无辜的。放心，我决不会怪您的。正好相反。告诉我，是49位量子教父吗？或许是一个装成皇家气象学会会员的教父？”我试图在不泄露任何重要情况的前提下，与她结成同盟。“我想得越多，就越怀疑这里面牵扯到一些相当强大

的势力，大得多——”

“对瑞玛来说，你太老了，”她打断我的话，提高了声音，变成一只刺耳的鸟。“而且你是个自以为是的人。你很愚蠢，长得还很难看，像现在这么近地看着你，你就显得特别丑。我很高兴没能把你带回家。我不在乎她是不是会跟我发脾气。她总是跟我发脾气，不管我做什么，她总是要跟我发脾气的。”

我没有理睬她。牵制战术。我只管吃我的早餐。

“你为什么不跟我回家？”玛格达最终叹了一口气。“这会让她高兴的。”

“承蒙邀请，不胜感激，”我冷静地说道。“可是我有工作。我要在这里工作。我总不能舍弃我的职责吧。”

“可是，利奥，你在这里没有工作。”

“那不是真的，”我坚定地说。“我在做气候变化的研究。”

“利奥，你不是气象学家。你不是。你有问题了。”

她说的是真的，我不是气象学家，但她说的也不是真的，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气象学家而被雇用的。或许很快就会成为气象学家。她的怀疑没有让我感到不安。

8. 饭后的顿悟

我回旅馆去找哈维。一走进房间，焦急万分的哈维就用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我又想到了猩猩。

“您去哪里了？”哈维问，像孩子那样哆嗦着嘴唇。

“没去哪里，”我说。

“雪停得那么突然，”他说。

“对不起，”我说。“我再也不会像这样不给你留张纸条就走掉。”可以对某个人说这样的话，感觉真好。

“我以为您厌倦了和我一起工作。”

“我就是去接了个电话。一个女人打电话给我。我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那么，您不会离开我了？”哈维问。

“当然，我不会离开你的，”我说，想起了南美浪漫的电视肥皂剧。

重新高兴起来是很容易的。哈维坐在电视机前看天气预报节目，我给自己安排了刮胡子的工作。我一边刮着胡子，一边回想我刚才不答应跟玛格达走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同时对着镜子仔细检查脖子上凸出来的柔软而敏感的小脓包。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说的话开始在我的心里发芽，又在我的心里脱落了，比起瑞玛的失踪，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的出现不是显得更离奇吗？我那么坚持地认为瑞玛是失踪，大概因为失踪是更痛苦的，而瑞玛的魂儿的出现，那就更加奇怪了。为什么不干脆带走瑞玛呢？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她只是被利用来移动一只狗吗？或者为了某个另外的原因，利用她来解决某个另外的问题，由此找到某个另外的解决办法？解决什么问题的办法？为了组成三角形，假装两个瑞玛的观察者连结完美地出现在我的数据里吗？好像这个谜团是最接近我的，但也许谜团实际上就是我。

如果那狗是极为重要的话，但是现在看来扔下那狗，跟踪我是更加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不是意味着我比那狗更重要吗？如果我使用一个精确的方法去抓住机会，而这个机会是教父们正努力要控制的，那么他们试图控制的不正是我吗？那貌似瑞玛

的女人已经在追踪我了，还有玛格达。连哈维都找到了我。

我放下刮胡刀。

感觉到有人在找我，却不理解其中的原因，这是一种奇怪的客观的感觉。

我转过身对哈维说，“我想这场战斗也许不是通过那狗来进行的，也许正通过我来进行。过去我以为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是现在我觉得，或许我的行动真的是由某个另外的力量来决定的。也许是通过确定我的模式来制定天气的模式，制定天气模式是进入这个世界的立足点。我的意思是，也许我的行动的确是很重要的，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对我。也许我是众所周知的那只蝴蝶。”

“每个人都是一只蝴蝶，利奥医生，”哈维说，没有从电视机前转过身来。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是说——我觉得也许我是最重要的那只蝴蝶。我不想夸大其词。我是说，我希望这不是真的。可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嗨，”哈维说，现在转过来面对着我。“每当我碰到这种时候——我想您是知道的——我就试图寻求证实，证实一些疑心，这样就可以让我摆脱尴尬的局面了，知道吗？”

好啊，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证实。“我认为我应该想办法找到今天早上把我找出来的那个女人。我需要了解她的动机，虽然她不会老老实实在地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如果我还要把你一个人留下来，你介意吗？”

“如果我叫客房服务送餐，您介意吗？去吧，去吧，不过您什么时候回来？”

唉,这是一个小镇子,阿根廷无意识的角落,到晚上我就能重新找到瑞玛的母亲。

9. 解决半信半疑的办法

我假装保证吃完饭后,就给瑞玛的魂儿打个电话,玛格达这才勉强同意与我共进晚餐。我们一坐下来,我就开始解释,她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劲,我认为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告诉她,如果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感觉到我感觉到的东西,那么非常可能我也会认为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但是也许她觉得——就像我感觉到的那样——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而如果我开始了解那些事情,那么或许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不同了,就像她那样。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告诉我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她尽管放心,我会用心去体会那些事情的。

她眼睛周围的皮肤:灰色的,凹下去。她没有说话,只是瞥了我一眼,然后叹了口气。

于是,我又尝试另一个方法。“这里的风景真是太震撼了。这是一块多么漂亮的土地啊,”我说。

“这是一个颓败而萧条的地方,”她回应。

“每个人似乎都是那么亲切,”我说。

她说,这都是表面上的,每个人都很虚伪。“就连我,”她说,“都只是在表面上客气。”

如果她硬要说她自己不是个和气的人,我无所谓。“您知道的事情比我知道的要多。”

“没错,”她说,“我是比你知道的多。”

“那是，您是知道的比我多，”我表示同意，意识到她大概很讨厌我，至少是在她关注我的时候。所以与她打交道，我只会得利，不会有损失。“那么，您知道和瑞玛一起离开阿根廷的那个男人？她的丈夫？他的名字是，嗯，也许，嗯——他叫什么？”

“我想你是他的朋友？”她说，突然打起精神，激动起来，仿佛一道来源不明的亮光透过窗户照在了她的身上。“这也是谎话吗？”

“最近，我总是感到很糊涂，”我说。“这就是说，我已经忘了。我是说，嗯，是不是——他的名字——叫阿纳托？”那时候我的计划是，问问她是否还记得阿纳托曾经打听过我，或者打听过像我这样的某个人。

“阿纳托？”她反问道。她的发音与我的不同，她把这个名字念成四个音节，而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念叨这个名字的时候，那是三个音节。“你是说这个名字吗？”她问我，好像我把一个妖怪——邪恶的还是善良的，我说不好——从瓶子里放了出来。

“啊？”我说。“对不起，我以前撒谎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说我认识他。当我见到您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想您能够理解。我是说：您是个化验员。我的意思是：我的处境很尴尬。”

“瑞玛告诉我，你现在是她的丈夫，她是不是在对我撒谎？”

我往面前的空盘子里撒了一点盐，用大拇指把嘴边的米粒抹进嘴里。我不想给出信息，只想得到信息。“您说的是您家里的那个女人，和我睡在同一个卧室里的那个女人？嗯，有点儿，是的，最精确的解释，她是在撒谎。但是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观点来看，她没有撒谎。我是瑞玛的丈夫。”

“可是，你不知道阿纳托是谁？”

我试图在脑子里想像出一个阿纳托来。他看起来像我，但像是从一面哈哈镜里折射出来的我；接着，莫名其妙地，镜子里歪歪扭扭的阿纳托代替了我，而我却变成了歪歪扭扭的他，这表明我原来的位置是个极其令人羡慕的位置。“不过，您认识他？”我问道。

“你的婚姻——如果这的确是一桩婚姻的话——是非常奇怪的。冷冰冰的。”

我想起了风寒指数。玛格达继续在说她认为我的婚姻像什么。她说啊，说啊，那么自信，那么讨厌。最后我不得不打断她的话。

“您的推断是不是有点儿太过了，有点儿太自信了，仅仅根据我不知道阿纳托到底是谁这么一个事实——”

“我不怪你，”她说，她的话让我明白了，她显然是在埋怨我。“她是个奇怪的女孩子，我的女儿。也许这是我的错。”

然后，她不说话了，我也沉默不语。我希望她不要把我的沉默理解为判断。我从松脆的面包棒上掰下一小块，听着自己嘎吱嘎吱地嚼面包棒，开始模模糊糊地觉得头脑有点儿清楚了。“那么，”我说，既是对玛格达说，也是对我自己说，“瑞玛是和这个叫阿纳托的人一起离开阿根廷的。”自信地采用了玛格达的四个音节的发音，觉得自己像比利时大侦探赫克尔里·波洛：故事即将进入尾声，嫌疑人就在房间里。“我曾经以为他是那个夜班护士，”我说，脑海里浮现出一条充血的静脉。“但是，我现在总算知道了他不是那个夜班护士——”

“你认为阿纳托是个护士？”

“不，不，我不这么认为了。再也不会了。过去我错了，”我说，觉得我的调查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了。

“阿纳托不是瑞玛的丈夫，”玛格达说。

“啊，是这样啊，”我说，优雅地转了个弯。“实际上，我也那么猜想过的。他们那时候只是订了婚，我说的没错吧？当他们到达美国后，这段婚姻就完结了，爱情枯萎了。”我滔滔不绝地说着。“他们认识到这是环境的问题，是背景的问题。虽然他们还是互相喜欢着对方，但是对于婚姻而言，这是不够的。在床上大概是很别扭的，请原谅我的法语，吃饭的时候也很别扭，他是不会和她一起吃小扁豆的，他无法应付与她的争吵，他从来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送给她的礼物是她不喜欢的，这些事情说明他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她——”

“你完全误会了，”玛格达说，突然说起了英语。“你的这些想像是荒诞的。”她没有看着我的眼睛，而是又看着我的衬衫袖口。“阿纳托，”玛格达说，在她的发音里没有一丝的犹豫。“好吧。他是这样，嗨，说这话我真是觉得很奇怪。嗯，真的。”我注意到玛格达把一个折叠成手风琴风箱样子的茶包标签放到桌子上。那茶包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俩都没有点茶。“由我来告诉你这件事，也许是不对的。阿纳托是我的丈夫。”

我发出一阵狂笑声。但是我觉得，刹那间我失去了所有让我神经紧张的东西，失去了长久以来防止我的外壳在大气压力下坍塌的所有东西。

“你噎着啦？”她关心地问道，我觉得她关心我胜过关心她自己。

“对不起，”我说。“我总是会听到一些最离奇的事情。不是

人们实际上说的事情。”我可以感到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头皮发痒，横膈膜在笑。这个房间太可怕了，我可以感觉到墙纸的颜色——暗红色——弥漫开来。

“你不知道，”她问，“阿纳托是瑞玛的父亲吗？”

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感到身上的衬衫软得像粉末，脚上的血管鼓了起来。以前每当我坐在椅子上喊头疼时，瑞玛总是喜欢站在我的背后，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现在我的额头上没有她的手。我听到——也许是那个折叠成手风琴风箱的茶包标签——烧热的水壶没有发出哨声，壶里没有水。

我说，“我也有个父亲。”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发现这种可怜的自居作用^①的心理是很丢人的。然后，我立即开始用叉子把食物塞进嘴里。

“他们带走了阿纳托，”玛格达说。“那时候瑞玛还很小。”

10. 引起动摇的首要原因

那天晚上，我喝了一碗美味的玉米汤。玛格达的饭菜看起来味道也不错——一整条烤鱼，还带着鱼头——我没有要求尝一口，她不会同意的。我的土豆泥是用大蒜来调味的，我想她的土豆泥里也有大蒜，可是我吃的时候，她没有吃。（她为什么不饿呢？）有人也许喜欢给玛格达有关阿纳托的陈述增添很多的重要性。当然，这样的陈述也许本来就是重要的，然而在我的事

① 自居作用——西方心理学界的用语。是指一种自我防御机制或适应行为。即把一个他所钦佩或崇拜的人的特点作为自己的特点，用以掩盖自己的缺点或不足。

情里,在寻找瑞玛的这件事情里,它们不是特别重要。有人也许会说,毕竟汇聚在一起的信息里有许多可以接受的数据点。这就是说,一条信息从某种非常局限的意义上来说也许是重要的,就好比中国的茶叶价格,它和什么有关系?和最近有关初值问题的讨论有关系吗?和多普勒魂魄效应的讨论有关系吗?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倾向于创造蹩脚的隐喻,或者用蝴蝶作隐喻,但是这样的隐喻完全依赖于貌似深刻的联想。有关阿纳托的事情压根儿与我的调查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是为了增加戏剧效果。不必担心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以后会坚称玛格达对我撒谎了,阿纳托根本不是被带走的,他是离家出走。谁知道呢?道理还是一样的:人们终究是会失去父母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如果我不知道瑞玛的父亲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也不能说我不理解瑞玛,我完全理解她,她在心里设想父亲失踪的确切原因。玛格达认为是错误的婚姻引起的,但这个错误的婚姻与瑞玛认为的错误婚姻不同,是另一种错误的婚姻。我决心不要因为解释所谓错误婚姻而使我的搜寻离开原来的轨道,拙劣的诠释是很容易出轨的。我正在寻找能帮助我找到瑞玛的线索,在这个期间偶然发现了阿纳托的真相,我曾在一段时间里把阿纳托错认为是瑞玛的另一个丈夫,这的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的,不过这却是一件我没有兴趣知道的事情,我很明智地故意不把石头翻过来。一条线索,不过是另一个谜团的线索。不管怎样,我不想知道;我还没有闲心想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恐怕没有人会有这样的闲心。

我记得,在吃饭期间的某一个时刻,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手像是一只可怕的毛茸茸的爪子,从那件质地脆弱的穿了

好几年的衬衫袖子里伸出来。

玛格达对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让你感到不自在的。”

但是我没有感到不自在。不管怎样，我没有给予玛格达任何安慰，这倒是真的。你爱怎么说我都行，但我会为我自己辩护，事实是（一）她的悲伤，如果有悲伤的话，不关我的事，（二）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产生悲伤的原因，（三）“安慰的话”，就像指甲根部的倒刺，（四）我们没有特别的关系，还有（五）失望使我无法弄清楚我对玛格达的责任是什么，什么都没打听到所引起的失望仿佛使我更接近正在找回中的瑞玛。我曾经指望过阿纳托这条线索，即使这条线索只是帮助我理解了我是如何把它考虑进去的。

没有继续紧追瑞玛的父亲，我终于又提出了瑞玛原来的丈夫是谁这个问题。

玛格达在吃鱼眼睛。“你自己去问我女儿。我那丫头给我带来的麻烦够多的了，她不让我说她做的那些事情。”

“是那个遛狗的人吗？”我问。

“他是精神分析学家，”她说。

“那遛狗的人是精神分析学家？还是那丈夫是精神分析学家？或者二者皆是？”

“别说了，”她说，闭上眼睛，用手捂住耳朵。

我小声地说，“他是叫茨韦吗？”

“这个把戏有失你的身份，”她说，依然用手捂住耳朵。“不管怎么说，这个把戏有失我的身份。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比你低，你好像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我相信，这个把戏也有失你的

身份。”

11. 我很讨厌抢座位游戏

哈维，在一堆脏盘子中间，问我打听到了什么。

“我不太确定。但我认为我不是那只最重要的蝴蝶，或者说我不是最重要的人。比如，那个阿纳托，我完全误解了他的重要性。好像我的所有假设都有缺陷。”

他问我，我是否弄清楚了瑞玛爱上了阿纳托。

我说不是。

“那瑞玛的魂儿爱上了阿纳托？”

“为什么总是说爱呀，哈维？你的兴趣是在天气上，这是怎么啦？”

“我常常发现许多事情的中心问题就是爱，您没发现吗？”他睡意蒙眬地嘟囔着。“有人假设大多数 49 位量子教父曾经是皇家气象学会的会员，一直到他们被爱情烧伤后，才脱离了学会。我过去的一个治疗师向我指出过这一点。可能性——”

“我不这么认为，那个治疗师是谁？”

哈维耸耸肩。“你喜欢和茨韦讨论爱情。”

“不是讨论爱情，是讨论瑞玛，还讨论了一点点那个瑞玛的魂儿，但只是作为一种迹象。”

“你看见的那个遛狗的人，怎么样啦？那个瑞玛的魂儿爱的是他？”

“当然不是啦，她不爱他，”我说，声音很轻，很冷静，一点儿也不生气。我们的房间，加上那些脏盘子，已经具有了单身汉卧

室凌乱不堪的样子。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没有心情去想瑞玛的父亲。“可悲的是,她在很短的时间里爱上了我。她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对于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目的、不顺心的爱情,她能怎么办?或者她不会再过分关注另外一个男人,至少在表面上,只是因为他像我,是禁果。”我想进行一次有关爱情和可能性的演讲,讲得比他的那个不知名的治疗师更好。“也许就在此刻发生了那事。但是他——嗨,他竟然不能真正地享受她的关注,因为一个受过训练的男人必定会明白,她对他感兴趣不过是移情,因为他应当知道一个像她那样的姑娘——对不起,女人——实际上是不可能被他吸引住的,除非那女人,不知怎么搞的,无意识地把他的外表错认为是她过去的真爱。她爱他只不过是恢复旧爱的幻觉,他只是个代用的爱人。她对她的爱情不会有其他合理的解释的。”我还得说下去,不过已经变得很泄气了,我觉得应该多说一些相关的知识。“实际上,哈维,这与弗洛伊德如何‘发现’移情理论是很相似的。你知道吗?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从催眠状态中醒来,用胳膊勾住他的脖子,狂热地亲吻他。这让他感到很困惑。我猜,他确信那个女人不可能真的是被他迷住了,她一定是把他当做了什么人的替身。我的意思是,这很有趣——如果弗洛伊德认为他自己很有魅力,那么他也许永远不会发现他的移情理论了,他只会假定那姑娘觉得他很迷人。荣格^① 肯定会这么想

①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在世界心理学界都得到很高的评价,是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之一。著有《无意识过程心理学》、《心理类型》和《记忆、梦、思考》等。

的。然而弗洛伊德把他的理论引向了极端——他似乎认为所有的爱情都来源于移情，在两个爱人之间总是有一大堆过去的人。我得表示不同意。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正好与此相反。弗洛伊德错误地将他的理论普遍化。称精神分析是科学的麻烦就在这里，因为科学不应该依赖权威，而是——”

“您想得太多了，”哈维打断了我的话。他开始把各式各样的脏盘子擦起来。就在那时候，我注意到了房间里的气味，那不是牛排和吐司的味道。我意识到哈维喝酒了。“我以为，”他无礼地说，“您也许找到了您妻子离开您的原因了。”

我从来没有说过她离开了我。谁那么说的？实际上，哈维肯定不认为是瑞玛离开了我，而是想说……什么？我离开了他？为什么每件事情都意味着别的什么事情？我想生活在一个比较简单、轻松的世界里，在那里梯子太短，或者有人踩在香蕉皮上滑倒就是个笑话。“有时候，”我对哈维说，“你看到的是实际上不存在的因果关系。”

“是，您经常这么对我说，”他说。

“她没有离开我。绝对没有那个迹象。她只是失踪了。更准确地说，她是被带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可以被带走的人，为什么偏偏把她带走了，但是——这是我们试图找回她的另一个原因。我希望，我有比较好的理解力，可是我没有。我告诉过你，我也许要在外面待一整天，我预先通知你了。听着，最近我们为什么总是在说我？你我两个人应该说说你了。你给你妈妈打过电话吗？”

哈维自以为是地把擦好的盘子放到门外。“戈－臣博士不让我给我妈妈打电话。”

“为什么不让？”我问。“你应该给她打电话。如果你不打电话给她，她会非常失望的。她会对你失望的，也会对我失望的。”

“我不是傻瓜，”哈维说。“我看得出来，您在改变话题。”他走到镜子跟前，仔细地梳着头发。“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成像，排除了神经囊尾幼虫病。”他转过身，面对着我。“知道吗，有时候茨韦打电话给您，让您把命令转达给我，我想我可以听到电话里您妻子的声音——”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哈维，但是我非常肯定，你听错了，”我冷静地宣布，感到耳朵一阵刺痛，好像耳朵里正蓬蓬勃勃地生出许许多多的耳垢。“不管你的猜疑是什么，那些猜疑都是不对的。顺便说一下，今天晚上我睡在床上，你不——”

“您觉得我一点儿用都没有，利奥医生。我看得出来。没事儿。不过戈－臣博士可不像您那样。很快您就会明白我担任着极为重要的职位。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坦然面对您的冷漠和蔑视。戈－臣博士知道，在皇家气象学会里我不只是个有用的人。他知道我的职位是不可替代的。不像弗洛伊德的那个病人爱慕的对象，那个对象可以是任何人。”

当哈维在夸夸其谈时，在我看来，很明显哈维把茨韦当做一种精神病人的补丁，用来修补由他自己坚持不懈的看法引起的裂缝。哈维不能理解茨韦是一个真正的人，哈维无论想要茨韦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就把茨韦误作为是那种人，看到这些，一股新的悲哀涌上了我的心头。

那天深夜，我给茨韦写了一封诚挚的长信。我在信里向他解释，虽然我至少有一两次被“爱情烧伤”，但是这决不能说服我加入到 49 位量子教父的行列里。我坦承，有时候连瑞玛对我都

不感兴趣。比如,不久以前,她租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光盘——讲仆人什么事情的——我没能和她一起看第一集,因此她不允许我看连续剧的其余部分。晚上,她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捧着一碗五谷杂粮,用勺子舀着吃,同时告诉我她不饿,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买外卖吃。(在别的时候,我们相拥着一晚接一晚看租来的电影,没有什么事能比这件事更让我们高兴的。)或许是我对她不感兴趣了。通常我们是互相体贴着度过忧郁周期,但有时候我们同时受到坏脾气的冲击,于是我们都失去了理智。比如,最近我开始在医院里待到很晚才回家,不是因为我必须这么做,我只是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把报纸和杂志里的每篇文章都看了个遍。(“世界简报”栏目是我最喜欢看的,它定期让我感到痛苦伤心,不过痛苦过去得也很快。)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经是十点半了,瑞玛问我为什么事忙到这么晚,我有点儿诚实地告诉她,我被一篇很长的文章吸引住了,那篇文章讲的是在印度尼西亚的弗洛雷斯岛的山洞里发现了一个被称为哈比人的人种,学名叫弗洛雷斯人:这些三英尺高的小矮人和现代人类所属的“智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只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在发现弗洛雷斯人的石灰岩山洞里,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科摩多巨蜥和矮种象的骨骸,以及遗留的石头工具。“现在,”那篇文章特别指出,“这个人种已经灭绝了。”瑞玛问我,你为什么不能在家里看那篇文章呢?为什么它占用了你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你对那些已经灭绝的人那么感兴趣?她训斥我,你打电话回来,说你要很晚才回家,我还以为你有工作要做,没有办法按时回家。

总之,我告诉茨韦这些琐碎的小事,只是因为我想让他确信,我是坚定不移地站在皇家气象学会一边的,我在过去已经忍

受了婚姻里的不稳定,今后我也能这么做。但是给他写这些东西,在我的心里生出了新的敏感。49 位量子教父已经发觉了我的婚姻里实际存在的弱点,我和瑞玛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教父们肯定,假如我们的关系变淡了——我也许没有注意到,或许我对交换瑞玛就不会有反应。这个想法非常鲜明地掠过了我的脑海。

这大概只是个妄想。但是把信发给茨韦之后,我几乎是立即就收到了不在办公室的自动回复。我心里很乱。

12. 我没有似乎应该有的感觉

房间里的电话又一次把我从睡梦中吵醒;留下的口信和前一天的一样;要我到楼下的过厅去,最好马上就去,因为有一个女人想要见我。

瞥了一眼房间,发现哈维不在了。

好吧,我想,别去想一个不知所踪的男人,别去想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也别去想那一两个不在家的父亲,甭管那可能是个色情的念头,谁知道,我还没睡醒呢。急急忙忙穿好衣服,直往楼下奔去。但是,我在那里看到的不是玛格达,我看到一个女人(起初我是在墙上的镜子里看到她的),金色的头发,像瑞玛玉米穗般的头发,可是发型完全不一样,比较精确地说,梳得不是很整齐,随随便便地在脑后绾了个髻,头发上已经渗出了油,并且很好笑地露出了黑色的发根。

“瞧,”哈维说——哈维! 穿戴得整整齐齐,衬衫一如既往地塞在裤腰里,就连衬衫袖口的扣子都扣上了,他显得很得意的样

子,抑制不住地咧开嘴笑着。“我找到了她。她是山谷里的百合花,到这里来看你。一种大气现象。”

我看着镜子里的那个金发女子;她看着镜子里的她自己。大约是我认为她在看镜子里的她自己。但接着我想到了多普勒魂魄效应,这个词组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起码为我解答了一个问题:我误译了我的知觉。那就是:如果我在镜子里看到了那金发女子的脸,她如果好像是在看着我在镜子里看到的東西,也就是她好像在看鏡子里的她自己,那么实际上当我看着鏡子里她的脸的时候,她在看着鏡子里我的脸,我们的脸可以在同一个位置(在鏡子里),取决于你的视角。所以,她想到的、看到的不只是她自己。我想到的也不只是我自己。这就像一个人没有对能预料到的知觉失真进行修正。难道我以前并不了解鏡子的功能?好像我已经忘记了有关鏡子的知识,现在得重新学习。我们并不了解鏡子的工作原理,或者说并没有真正了解鏡子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思考这样的事情是很有趣的,由于鏡子是我们所拥有的认识我们自己长得像什么样的主要手段,这不就是那个江湖郎中拉康^①所说的,因为我们只是在鏡子里看到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杜撰的范围”里认识了我们自己吗?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澄清了刚才看鏡子的那个瞬间的错觉,会让我那么感动。就我而言,今天这件事是一个关于错误知觉的重要

① 拉康·雅克(Jaques Lacan, 1901—1981),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拉康从语言学出发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学说,他提出的诸如镜像阶段论(mirror phase)等学说对当代理论有重大影响,被称为自笛卡尔以来法国最为重要的哲人,在欧洲他也是自尼采和弗洛伊德以来最有创意和影响的思想家。

实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明白了我自己的错误知觉,并且立即重新调整了我对当前形势的理解。我现在不是为了避免谈论动情而沉重的话题,就随意地语无伦次地谈论一个不重要的没有关系的话题,好像看到了那金发女子我就激动得不行似的。我没有。

不管怎么说,她看着镜子里的我。

我看着镜子里的她。

我在心里飞快地把做错的数学题改了过来,意识到她大概看得出来我明白她在看我。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是个相当不错的侦探了。这次只是在网上查了查你的信用卡账单,我就找到了你。”

她还说,我不认为她激动地谈论不那么沉重的话题,是为了避开主要的话题。

哈维拉了拉我的衣服袖子,小声说,“她不是很漂亮吗?她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找我们的。”

她平静地说,“哈维跟我说,这一段时间你们俩在一起工作。”

“不是这一段时间,”我声明。“这么说是不对的。这一段时间我和哈维不在一起。我工作得非常辛苦,很多工作是我一个人做的,完全是我一个人。你是一个人吗?”

“哈维说你一直在想办法找我,”那女人说——她身上的气味像是干草的味道,也像是宝宝润肤霜的味道,还有汗味——她拉住了我的袖子,但是却把脸转向了哈维。“你母亲把你列入了警察局的失踪人员名单里。你知道吗?让她这么担心,你觉得合适吗?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你知道她会怎么样吗?”然后她回

过头来问我，“缺乏对他人所受痛苦的同情，是身心机能失调中的一种吗？”

我只是看着她。

“嗨，”是哈维的声音，“我为什么要让我的母亲承受这样的痛苦，我为什么要离开她，暂时什么都不让她知道，她就像，我的意思是，就像利奥医生说的，她就像希腊悲剧里的某个人物，很不幸，这与我的雇主有关，这是唯一的原因。也许在完成了我和利奥医生星期一开始的任务之后，我就会被送回家了。”

“星期一？”那瑞玛的魂儿问道。“从星期一开始什么事？”

“我想，我透露的信息已经比戈－臣博士希望的要多了，”哈维答道。

“可是，”那女人回头瞥了我一眼，问道，“茨韦·戈－臣是怎么和你取得联系的，哈维？是通过这个”——她抬起我的手，仿佛那是一只木偶的手——“人？”

我严厉地看着哈维，不被人察觉地摇了摇头。但这是哈维的一个特性——他不能正确地理解身体语言。不是瑞玛的魂儿所说的那样，他不是缺乏感情移入。他只是误解了他试图与之感受移情作用的那个人，所以时常让人觉得好像缺乏感情移入似的，如果真的有很多感情移入的话，那也是被引导出来的。有时候甚至连我都会这样。

“你对茨韦真正的工作很熟悉吗？”哈维继续跟她装傻。“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抬起双手，紧紧捂住了眼睛，好像要把什么东西推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是的，”她疲惫地说道，“我知道。哈维，你真的应该给你母亲打个电话。不过别担心，如果你不想

给她打电话，我不会给她打电话的。尽管她给我打过电话。”

“很高兴，”哈维说，“你尊重我的工作的微妙性。”

“不过，请你告诉我，”她继续纠缠，“这个茨韦·戈－臣到底是怎么和你取得联系的？你直接和他说过话？”

“没有，我们没有和他说过话，”哈维说。

“没有，我们没有和他说过话，”我也同时说道。

“倒霉妖术你欠我一杯可乐，”哈维说。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那瑞玛的魂儿不得不先开口说话：“还有你，利奥。咖啡店的那个姑娘，你给她写纸条的那个姑娘，她是我的高中同学。还有，她对你不感兴趣。”

“我觉得那个遛狗的人对你不感兴趣，”我说。

我不知道，最终我们是怎么放弃冲突的。我不太清楚，一个人怎么能把一顶帽子，或者把任何一种标点符号，任何一种结局放到那些情感里去，放到那些愿望里去：比如，一些人迷了路，却指望不认识路的人来为他们指点迷津；又比如，在来找你的路上出了轨，却巴望着让你承受荒谬的误入歧途，之所以会误入歧途，经常是因为——透过我们看的镜子看到了可能发生的事情——某个人正看着她自己，或者他自己，或者别的一个人，而且爱上了，但实际上他或她看着你，就像你正看着她，同时给她你在看着别处的错觉。

“我还没有睡过觉呢，”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说。

“你可以睡在我们的房间里，”哈维说。“白天我要出去采集数据。”

*

*

*

她盖着我的毯子睡觉。我看着她。呼吸稍稍有点儿不规则。

不用说：

真正的瑞玛不会把头发梳成一个髻。

她不会那么紧地抓住我的手腕。

她不会批评哈维，也不会那么认真地听他说话。

她不会在这么公开的一个地方进行这么私人的一场谈话。

她至少会稍微评论一下我早晨不刮胡子的英俊模样。

如果瑞玛是通过在网上查看我们的信用卡账单后才找到我的，那么她是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

13. 坦 白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在睡觉时，我没有碰她，但是我仔细地端详着她。前刘海从中间分开，粘在汗津津的额头上，这让我想起了电子游戏《魔女玛塔·哈莉》里的那个双面间谍，她装扮成具有异国情调的舞女，在那一刻她是美丽的。有那么一会儿，我认为瑞玛和这个貌似瑞玛的女人是真正的双胞胎，或者是两个分离的影像一起走进了立体视镜里。睡了没多久她就醒了，坐在地板上，搂住我的膝盖——我坐在床沿上——她说，她会待在我的身边直到地老天荒。那是她说的：地老天荒。她说，她已经仔细考虑过了，这是她做出的决定。然后，她说她饿了。

我们走出旅馆，外面的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在我看来，她不

再像玛塔·哈莉了,不再像瑞玛了。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讨论,”她说,像学校的老师。

*

*

*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拿到的是一份西班牙文的菜单,而我那份菜单则是英文的,或者说是某种英文。在我的菜单上,第一个菜是“血腥的女孩儿”,下面一个菜是“血腥得要命”。

“你会和我一起回纽约吗?”她问道。

“恐怕不行,”我答道。

“什么事情在星期一开始?”她问道。

“我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

“我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

“你收到东西了吗?”她问道。

“衣服?”我想我是在说,我正忙着弄清楚菜单上的血腥。血腥的菜单和她质问的口气,是很难进行对话的原因。要是她还在睡觉就好了——那种时候是很容易深情地想起她。“我的行李还没有找到。他们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我现在说的是我用电子邮件发给你的东西。你收到那些东西了吗?”

菜单上又出现了一种酒的名字“我撞了”。我笑了。

“你是不是觉得,”她说,说话的口气耐心到了屈尊俯就的程度,“那些东西也许和你的事情有些什么关系?和我们有些关系?”

在她说话的时候,我弄清楚了一件小事,就是那些可恶的

酒。“桑格里奇卡酒”，“桑格里大公酒”，这两种酒的名字自己就为我做了解释，但“我撞了”还是没搞明白。我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对我说，“神经质的笑没问题。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读那些讲错误辨识综合征的东西。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对它们的看法。那些东西。我是很耐心的，甚至都没有问你对我的看法。”

菜单上列出的第四种酒叫做“我撞大发了”。我咯咯地笑得更厉害了。为了对我的丑恶行为做出某种辩解，我把翻译成英文的菜单递给那貌似瑞玛的女人。

“你看没看过，哪怕是一句呢？”她又问。

以前我常常就我写的文章这么问瑞玛。“你看没看过？”我说，指着菜单。

“别学我说话。”

“是，好吧，”我说，强忍住笑，肚子都疼了。“我看了那些文章，看得非常仔细。”这是真的，我真的看了。（瑞玛常常在这样的事情上撒谎。）接着，我注意到菜单上还有“油炸教皇”，这没那么好笑，而且我立刻就认出了这就是西班牙语的“炸薯条”，是法式炸薯条比较好的翻译，但还是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她冷冷地说，“我处在你的位置上，你不会催着我非常小心地去想吧？走出我的身体，在另一个身体的位置上考虑这个问题？”

我试图向她解释，我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我的问题的，我当然看过那些文章了，可是好像它们没有告诉我任何我以前没有考虑到的事情啊。

“你还记得和我一起看《哥斯拉》吗？”

“没错，我是和瑞玛一起看的。”

“你把果仁巧克力饼干都吃完了，也没给她一块吃，她跟你生气了，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那个了，不记得了。”

“好吧。你给她讲电影里英文的习惯用语，记得吗？给她讲盖革计数器和氧气驱逐舰，她说你太独裁了，记得吗？”

“瑞玛通常很喜欢听我讲这些事情。大概我最让她喜欢的就是这一点。”

“你记得那次拌嘴吗？”

“听着，那些细节我记得的与你的不一样，不过你刚才提到的事情我都还记得。但这毫无意义——”

“我知道所有的细节。你不觉得奇怪吗？”

“许多事情都很奇怪，”我说，轻轻地，信心十足。“天上地下有很多的事情，知道吗，不一定是好事。比如，一个报复心重的替身就不是什么好事。”

“看着你这张脸，”她温柔地说，伸过手来拂去我脸上的头发，“但却没有真正地了解你，也许对我来说这更奇怪。你确定我不是瑞玛？”

无意中瞥见菜单上写着“鸡蛋里脊肉”，不知道那原本是什么菜。“我是这么猜的，”我急促地说。“是的，我肯定。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吧，”她说，脸上挂着宽容的笑，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死人的照片。“从现在开始，我跟你说实话。我承认，我的确不是她。”

在这个期间,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没有焦虑地撕碎餐巾纸,她把餐巾纸整整齐齐地折叠成一副软绵绵的算命扑克牌的模样。

“好吧,”她进一步肯定,“就算你是对的,行了吧?”

我把目光从算命先生那里挪开,去看她的手。我注意到,她流血了,她的右手食指指甲根部的表皮出血了,很少的一点血。瑞玛指甲根部的表皮通常不太光滑,但很少流血。只有一次,她的一根,实际上是两根手指头流血了,那是因为她用指甲去刮掉贴在我们车上的拖车警告的标签。我们的车没有挪动过,所以违章停车的罚款单在我们的车上贴了一张又一张,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因为连续好几天她承担起了原本应该我们俩轮流挪动汽车的活儿,不过我猜,她只是出去转一圈,并没有挪动汽车,于是拖车警告的标签贴到了我们的车上。那时她已经心情恶劣了好一阵子。在她情绪低落的时候,她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做事。有一次她哭了,就因为我们冲茶用的牛奶没有了。我假定,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不想有人来打扰她,所以我也就由着她去。早上,我不会把她叫醒,就让她继续睡着,当我下班回到家里的时候,她还是睡眼惺忪的。我不知道该为她做些什么。我买一些小礼物给她;给她写纸条;她洗澡的时候,我把毛巾放进烘干机里,这样她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毛巾是热的;我从报纸上剪下来一些我认为能把她逗乐的小文章;我还试着在家里给她做蛋白杏仁糖,我知道她喜欢吃,但是没做成,还把食品加工器给弄坏了。我曾经以为也许是她对我失望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了:她的心情通常与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这是很明显的,这也许就是我不想去了解她为何生气的原因,在我看来,这个发现肯定会比她生气更糟糕。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伸出那只稍微有点儿受伤的手，把它放在我的手上。“对不起，”她说，“我没有早一点儿坦白。但我可以帮助你找到她。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不过总是会有办法的。”

14. 一个还可以的办法

茨韦是不是认为我应该同瑞玛的替身联合起来？我给茨韦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她的坦白，但收到的又是一个自动的回复。不过自动回复至少能让我确信，我发出去的信，他收到了。茨韦不在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向他的研究工作求助。茨韦在一九八一年发表了有关恢复理论的论文，该论文的成功之一是论证了现实世界通过模拟实验获得的结果的有效性。比如，在观察位置上，来自三维数值云模式的输出信号被用来测试一个恢复温度和气压偏差的方法；恢复的范围与“真正”数据的比较在理论上确认了技术的健全。我将此理解为，用类推法，与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一起工作的确可以获得真正的瑞玛的消息。

但是，我们打算做什么呢？我向茨韦说过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是正常生活的演练，我有没有这么说过？哈维和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加上我，装作普通的游客，与那些愉快地探寻当地文化的外地游客毫无二致，我们一起度过了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时冷时热，但是不缺少阳光。我们乘船在湖上巡游，赞美高耸的冰川，惊叹冰川鱼鳞状的外表。当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把自己的羊毛衫脱下来给了她。船上的饮料和炸薯条贵得离谱，但是我高高兴兴地付了钱，没有人觉得被宰了。

为什么冰川呈现出来的是蓝颜色呢,我给出了一个必须接受的解释,而哈维和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似乎很耐心地,甚至大概很高兴地听我给他们上课。后来我们吃了草莓、核桃以及鲜嫩的烤羊肉。我们走着去看石洞壁画,结果却是很令人失望,好在往回走的路上一只黑颈天鹅给我们带来了惊喜。第二天早上,我们用皮带把防滑钉绑在鞋子上——两个年轻的阿根廷大学生像赶鸭子似的把我们聚拢在一起——我们嘎吱嘎吱地走在冰河上,河面上的裂缝把我们吓得心惊胆战。哈维被太阳光灼伤了,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找出一管芦荟防晒霜给他涂上。我们好像是一家人,这真好。我几乎忘了我为什么来这里。我想我们都忘了。

15. 张冠李戴的例子

星期六晚上,我和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出去吃冰激凌。她要了一杯香蕉条味道的冰激凌,那是小孩子们喜欢的味道,可她吃得津津有味。她没有谢谢我为她买冰激凌,也没有给我尝一口。她坐在那里,微笑着,一边用小勺舀着杯子里的冰激凌,一边和着头顶上方的音乐哼唱着。

我给自己买了一份双球冰激凌,一个球是巧克力味儿的,另一个球的味道他们管它叫做卡拉法特,是深蓝色的,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想到了每当我看到橘黄色的食物时,警报器就常常会响了起来。我很后悔冒险选了这种味道的冰激凌,所以吃得就不如她那么尽兴。

“我不想成为一个挑刺的人,”那女人终于懒洋洋地开口说道,“但是你找你妻子的方法不是最明智的,或者说不是最快的,

或者，嗯——根本就不像是在找她。”

“别吹毛求疵的，”我说，很高兴用了一个她大概听不懂的词。“没有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我有的只是一个不标准的难题，所以需要有一个不标准的解决办法。解释起来挺费劲的，但是，比如，也许吃这个冰激凌就会证明是有用的。不管怎么样星期一就要到了，或许星期一瑞玛就在这里了。这是有迹象表明。”

“我觉得，你应该回家去找她。”她大口大口地吃着冰激凌。“也许在那家匈牙利点心店。如果你问我的话，这就是我给你的意见。我们可以订一个一起回去的日子吗？”

我决定换个话题。“穿上我的毛衣，你看起来很漂亮。”接着我问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她那个新味道的冰激凌好吃不好吃。

“这不是新的，”她说。“香蕉条是这里的传统口味。那么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回你家呢？星期一你们碰头之后？我真的认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会有有什么进展的，”她说，拿着手里的冰激凌杯指了一圈这间屋子，这个动作对冰激凌来说是很危险的。

“实际上，”我说，有点儿撒谎，“我是惦着很快就能从茨韦·戈—臣那里听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开始用小勺大口吃起冰激凌。“我希望能够回家去。问题是我的行动，我的工作——它们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了，怎么说呢，超过了我的婚姻。茨韦认为我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像个英雄，我不能让他失望。这很难解释清楚，我常常认为我的生活毫无意义，就连我的爱情都只不过是偶然性的积累，这都与我长久以来的傲慢自大的感觉相反。不受欢迎的傲慢自大，强迫他人接受的傲慢自大。即使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好像很孩子气，我还是觉得最重

要——”

我开始话多了起来,但就在这时候,一个矮个子的年轻人,留着七十年代沃伦·比提^①式的发型,下巴上是晚上刚冒出来的胡茬子,穿一件松松垮垮的军装,出现在我们的桌子旁,用西班牙语反复说:是瑞玛吗?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脖子红了,毛细血管鼓了起来,嘴里吐出了一串我完全听不懂的话来。她举起冰激凌杯,好像那是一面投降的白旗。接着那男子亲吻了她。我猜有人大概会说那是在跟她打招呼,但是从观察到的客观情况来看,他是在亲她,两个脸蛋轮流着亲了三下。我不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管怎么说,这样打招呼未免太热情了吧。

向他们道了声歉,我起身去洗手间洗手。待我回来的时候,那个穿军装的小个子男人坐在了我的椅子上。他的军装袖子上缀着阿根廷国旗的徽章,卷起的袖子下露出了不甚强壮的三头肌。他是一场即将爆发的战斗的先遣人员?难道49位量子教父那么不谨慎?没话找话,我很有礼貌地问他,用的是英语,站在他的面前,居高临下,“你参加过福克兰群岛的那场歇斯底里的人侵吗?”

他似乎没有好好分析我说的话。他用西班牙语宣布,“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瑞玛和我。”然后他站起来,从旁边拿过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好像我倒成了新来的。“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小孩子的时候。”

“小孩子,”我说。“我也曾经是个孩子。”我问那男子,在他

^① 沃伦·比提(Warren Beatty, 1937—),美国电影演员和导演。

看来,她——我用手比划了一下——像不像童年时代的瑞玛。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把脸转到一边,好像冰冷的眼神会出卖她似的。不过说实话,她的眼神是兴奋的,充满了激动。她放下小勺,舔起了冰激凌杯。

“不同,可也还是一样,”他答道,笑了,又看了看她,然后重复着他刚才说的那句话:“不同,可还是那么漂亮。”

我问这个闯进来的家伙,他是海军,还是陆军,还是他就喜欢穿这样的衣服。他说,他是海军,然后继续说,“我们过去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吃冰激凌,瑞玛和我。”

我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中间,说不定他的手会伸过去抓住她那只没拿冰激凌杯的手,我得挡住他。

“我们从小在一起,”他迟钝地又说了一遍。

那小个子男人——他还没有报出他的名字,看在礼貌的分上,哪怕说个假名字呢——接着说,“我们过去常常跟在冰激凌车后面跑,卖冰激凌的人会大声嚷嚷,‘买一个冰激凌,你会永远都幸福!’”那军人把脸转向我,躲开我那双拦截的手,伸出手指着她的冰激凌:“她喜欢这种味道的冰激凌,那时候的味道跟现在的一样。”他的肌肉组织随着每一个手势,极不协调地改变着。他似乎很留恋过去。

“不对,”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明确地对那个男人说。

我几乎要站起来欢呼了。

“你误会了,”她说,把目光转到她的冰激凌上。“对不起,”她说,目光依然是冷漠的。“你把我和别的什么人混在一起了。”

“没有的事,”他大笑。“你有一点点变化,但你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的。”

“不，你认错人了，对不起，”她声音单调地说道。

她又道了声歉，然后站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把椅子碰倒了，她扶起椅子，扔下手里的冰激凌，走了出去。

就这么着留下了我和那个穿军装的男子。我那个恶心的深蓝色的冰激凌化了。“瑞玛怎么啦？”他问。

我耸了耸肩，道声歉，跟着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走了出去。我为她感到自豪，尽管在那天晚上剩下来的时间里她一直与我保持着距离。看到那男人向她传情，看到他惦着她，我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更深的温情。也许他的关注扭曲了我对她的看法，甚至可以说是纠正了我对她的看法。但这种扭曲也许是很有价值的。也许这种扭曲扑灭了我对我的真正的妻子的爱，无论她在哪里。我给茨韦写了封信，详细讲述了这桩偶然相遇的事情。奇怪的是，茨韦不在，我反而觉着与他更亲密了，与大家更亲密了。

16. 面料和方法

那天晚上，她睡在床沿上，不过是和我睡在同一张床上。洗过的头发濡湿了枕头。整个晚上我都在想：我非常匆忙地把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抛下了；被人抛下从来就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在我的生活里，这样的事情发生得不是太多，不过没把我父亲算上，因为他抛下的不是我，而是我母亲。我的确试过尽可能经常地把人抛下——在这次危机发生之前，我从来没有抛下过一个病人——不过，我想有人会说我抛下了我的母亲，把那称为“抛下”不太公平。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像我父亲那样抛下她。这是

很不一样的。那时我十八岁,要离开家去上大学。的确,我是我妈妈唯一的朋友;而且我住在家里,也可以上学;我母亲脾气的不稳定在幅度和频率上日益严重;我们的邻居,那个吃很多西瓜的大块头女人总是不停地说“我就是不喜欢把她抛下的念头”——除了这些以外,实际上我觉得,我去个让她够不着的地方,倒是让她松了一口气。我时常想,与流行的观点相反,一个人离开比被人抛下更困难。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经常想起,我母亲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沙发的黄色套子是羊毛和化纤混纺的,沙发的木制扶手很宽,可以在上面放一杯茶。她穿一套量身定做的套装,那身衣服完全不适合大白天躺在沙发上穿。她跟我说,她一直想换个不同颜色的沙发套,或许是天蓝色的,带一点光的,有一点点像缎子似的,至少是要有光泽的那种面料。如果她的起居室内有这么一个沙发,那么她的整个生活或许就完全不一样了。每当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总是会感到很恼火,不仅仅是因为她那过度的审美感受,以及她那个感受美丽可以拯救我们的荒唐的信念,也因为当我说,那么您为什么不换呢,您可以自己做沙发套;她说,把脸贴上去感觉很光滑的那种面料是很贵的——我说,行啊,如果她真的那么喜欢的话,就不要去想钱的事,总有办法找到钱的——她叹口气,说,咳,你不在乎沙发的套子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我说,大概是吧,我在想别的事情,没有在想面料,沙发套什么的——她说,是啊,她很高兴我在想别的事情。她眼睛周围的皮肤陷下去了;她的大腿,我可以一直看到大腿的中段,皮包骨,苍白的皮肤上带着蓝色的条纹,好像她吃了好几个月上了颜料的食物。我不想看到她的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经常看到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她的手抚摸着沙

发套。实际上那不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不过我猜,接近于最后一次了。我认为,那时候我打算出去买一点吃的,或许是打算出去散散步。不过,我说这些事情的唯一原因,是为了举例说明我那么匆忙地把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抛下,我理解她的感受。要是母亲知道我现在在考虑面料,考虑面料的质地和手感,面料的重要性,她也许会很高兴的。因为我已经决定给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买一件漂亮暖和的大衣;我们的冰激凌约会之后,她的情绪似乎非常低落,我想一件礼物也许能让她高兴起来;如果她打算星期一陪我一起去干艰苦的气象工作的话,无论那个工作的结果是什么,给她买件大衣不失为一个明智的主意。我想让她陪我去。我想让她高兴,想让她觉得我很欣赏她。我几乎想把她叫醒,告诉她我有多么佩服她。在我看来,她是那么忠诚,那么坚定,那么可爱,那么亲爱的一个伴侣。其实,我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想大衣的面料应该是什么样的。我的意思是,这是很好的调和——考虑面料——很好的反省,是某种协调,有人忍不住想在这样事情里找出含意来,或者起码想要沉迷在可能的含意的骚动中,哪怕这里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含意。

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购物计划。

第二天,我看中了一件暖和的大衣,我知道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穿上会很好看的。那是一件淡蓝色纯毛大衣,跟瑞玛的那件大衣一模一样;我很有把握地把那件大衣披在那女人的肩上。尽管那件大衣不是那么十全十美,不那么完全像瑞玛的大衣,但是我知道,以后我们可以找到超大号的纽扣,缝到那件大衣上去,到那时候它与瑞玛的那件大衣就会是惊人的想像。同时它可以为她保暖。

“不喜欢，”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说，好像生气了。“我更喜欢别的颜色，还有比较像爬山穿的那种外套。”她试穿了一件很难看的短大衣，非常膨松，长长的针脚露在被窝似的大衣外面，黄色的面料鲜亮醒目，像紧急情况下闪闪发亮的黄灯。

“这是个错误，”我说，极力向她解释，那件纯毛大衣换上超大号纽扣后，看上去就会非常漂亮了。

她说，我应该是很清楚的，这件大衣看上去就像她以前的那件大衣。然后她喜爱地抚摸着那件难看的黄色短外套的袖子。

不想引起麻烦——她似乎已经不耐烦了——我没有指出，其实那不是她的大衣，那是瑞玛的大衣，我不打算让她就这么认为那是她的大衣。我是说，那时候我在想，即使我找到了瑞玛，如果这貌似瑞玛的女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的话，我和瑞玛大概会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至少住一段时间，我们不会把她踢到街上去的。谁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也许她和瑞玛会成为好朋友，合穿衣服，分享秘密，共同承担起照顾那狗的责任，谁知道呢。

“穿上这件外套，你看上去就像是警报器，”我对她说。“就像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像饭店里的服务生把餐巾搭在手臂上那样，我把那件漂亮的大衣搭在手臂上。当那女人试穿其他不敢恭维的外套时，我跟着她在商店里转。我礼貌而坚定地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她则坚定地表示不同意我的观点。

我的温和的本性终于崩溃了。“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啊？”我说。“对你来说，一件大衣或者另外一件大衣，有那么要紧吗？为什么你就不能愉快地接受一件礼物呢？”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从头到脚地打量我，两眼冒出怒火。“你

为什么那么在乎啊？”她终于问道。

我没有回答。

“这件大衣真恶心，”她说，看着我。我感觉得到，她指的是搭在我胳膊上的那件大衣。她又试穿了另一件外套，那颜色就像锥形路标那样的橘红色，而且太大了。“行，就是它了。”

我平静地向她指出，那外套的面料看上去像是用回收的汽车轮胎做的。

“我喜欢，”她说。“这不会破。”

“但是这颜色。我是说，如果你不把头发染成金黄色，也许还行。这颜色也许适合肤色稍微黑一点的女人，可是——”

这时，她的话里透出一丝淡淡的苦味，像甘草片的苦味。“你认为你的朋友茨韦·戈－臣会更喜欢哪一件呢？”她把头一歪，问道。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漠视我的夜班护士，想起了那个遛狗的精神分析学家，想起了那天他朝我微笑的样子，那是一种嘲笑的笑容。我甚至还想起了阿纳托，想起了烟花，也想起了我，也想起了我不想发出的笑声。

“你认为他会更喜欢哪一件呢？”我反问她。她把乐趣都毁掉了，害得我只会模仿了。

“你再也没办法打电话找到他了？真倒霉。不过，现在我想，”她说，“向他征询对服装的意见也许不合适。”

17. 攻击局部稳态的前提

那天下午，哈维带着去寻找“养生运动”的计划来找我和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我同意了，但那女人打了退堂鼓，说她情愿留

下来准备明天的会见,读一读茨韦·戈—臣的研究论文。她的退出似乎有一点威胁的味道。不过仅仅是有一点儿。那时候,我没有任何怀疑。

在寒风中,走过几条街后,哈维冒昧地说,“我担心茨韦·戈—臣的现状。”

“你是说,你担心茨韦·戈—臣的真实性?”

“不,是担心茨韦·戈—臣的身体状况,”他迎着风说。

“茨韦·戈—臣的健康?”我说。

“不,是茨韦·戈—臣的状态,”他说。“担心他的状态。”

“实际状况,”我说,“你说的是这个吗?”

“是啊,”他说。

“是因为‘不在办公室的自动回复’吗?我收到的也是这个,我也很担心,不过我想像不出来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

“不在办公室?干什么去了?不对。我的担心和那个黄头发的女人跟我讲的事情有关。”

我竭力回想,在这之前我有没有注意到,他管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叫“黄头发的女人”,结果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是绵羊和水果。

哈维继续说:“她告诉我,没有茨韦·戈—臣这么一个人。真的没有。没有我所想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茨韦·戈—臣。那时候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说,如果有一个茨韦·戈—臣的话,那么您或许会说,她就是茨韦·戈—臣。这就是她跟我说的话。有一点狂妄,不是吗?”

我听到一声可怕的破裂的声音:什么地方的冰裂开了。我们听说,冰川上经常会掉下冰块,砸到冰河上。“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我问道。

“您是在回避，利奥医生。我说的是：我们真的知道她是谁吗？”

我想起了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在冰激凌店扔下那个军人的情景，心里火烧火燎般的痛，我联想到了，嗯，爱。“她是某个人，我猜，”我说。“甚至不用猜，而是很可能，很明显，当然是。”我一直在听冰川破裂的声音，有时还有冰块掉在冰河上撞碎的声音。发出破裂声音的地方离我们很远，但让我感到不安。“听着，哈维——我想我知道她为什么说她是茨韦·戈－臣。不过，她这么说是很愚蠢的，非常愚蠢，哈维，我不希望你把她说的话看得太重。她很不可靠。她带来的信息尽是错误的。也许是蓝噪声，最小规模的错误，尽管如此，也还是错误。她带来的信息必须要过滤——”

“可是她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了解茨韦·戈－臣的问题。这是一个听起来与认识有关的问题，但实际上也许是极抽象的。”

“哪一个精神分析师跟你说过这个词？”

“这个词不是很精确地描述了当前的形势吗？”

“不对。他只是离开了办公室。出去了——这完全是正常的事情。他会回来的。明天我们见面就知道了。别为这事变得神经兮兮的。茨韦·戈－臣怎么能不是真的呢，你是不是给他写过信？他是不是给你写过信？在我们知道他之前，甚至在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出生之前，他是不是在杂志上发表过论文？”

“可是他最近没有写过任何论文；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承认他没有写过。他躲起来了。可是为什么——”

“没错，”我说，“有些工作是不可以公开的。这不是什么不

能理解的事情。”一股又冷又硬的风打在我的脸上，脸蛋像被太阳光灼伤，或者像被打了一记耳光那么疼。我说的那些话，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想起了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有一次提起她的时候，我用的是现在时。我说，“她是个裁缝。”我应该说，“她过去是个裁缝。”我说这话是为了回答一个漂亮姑娘提出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我和女孩子说话有些困难，比现在要困难得多。想起那个时候，其实我和谁说话都有困难，真的。那姑娘碰了碰我的手腕，对我说，哦，你能帮我问你母亲一个问题吗？你能不能问问她，不是专门缝制哗叽的缝纫机是不是可以用来缝制哗叽？（在我听来，“哗叽”这个词说得很性感。）因为我错误地使用了现在时态，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了，那姑娘每次见到我——她长得真是非常漂亮——她都会问，我是否问过我母亲哗叽的事了。我想，要么我自己去了解一下哗叽，然后撒谎说问过我母亲了，要么干脆向她坦白，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所以我无法向她打听哗叽的事。但这两件事我哪一件都没做，反倒是越来越努力地躲避那个姑娘，她出落得一年比一年漂亮（到大学毕业时，她把头发剪短了）。每当我从远处，或者在学校的自助餐厅里偷偷地看她时，我会感到有什么东西压在心脏内壁上，仿佛我爱上了那个我并不了解的姑娘，若不是那个简单的语言过失毁掉了这一切，我们或许是最幸福的一对。

“我的意思是，在我为皇家气象学会工作的这些年里，我曾经被人误导过，”哈维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回去更加仔细地查看了他写给我，写给我们的电子邮件，我注意到一些情况。他特别喜欢说‘相当’，‘假定’，‘不管怎么说’和‘不管怎样’。大概您已经注意到了，您也非常喜欢用这些词汇。”

“是很奇特,”我承认,不让自己说“相当奇特”,“但也不是那么奇特。”

“对了,他也喜欢说‘奇特’。而且他喜欢重复他自己说过的话。就像您常常对我说——您过去经常对我说——奇特的东西是真实的,假装弄皱了床单——”

“我从来没有那么说过——”

“您说过类似的话,”哈维坚称。我们停了下来,就这么在寒风中站着。“或许是茨韦对我说的。我只是觉得这很好玩,很奇怪。不过大概对于同一个人,您和他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你们两个人应该是在两个分离的世界里,但是在这里,你们俩是在同一个世界里。也许是为了争夺什么东西?就像那个黄头发的女人和您的妻子。”

“这是谴责吗?这太荒谬了。如果说茨韦是什么人的话,那肯定不是我。”

“不是同一个人。不过差不多是同一个人,也许是出处不同的同一个人。对,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比起其他可能的事情来,这更有可能,不是吗?我想,这些交换说不定是一个序曲——嗯,我的工作前提是明天,在风暴来临之前,将会换回来。不过,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也许会说,因为将会拿她换茨韦,拿您换瑞玛,所以这将会是一个混乱的状态,像——”

哈维语无伦次的讲话,我现在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来——我已经被骗得相信,我是和一个神志基本上正常的人一起工作,我设定的基本正常的标准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红移了——我们已经失去了方向。天上开始掉雨点了——真正的雨夹雪——相当大,所以我们不能看得很远。我不再说话了。我们能够顺

利地回到旅馆纯属是撞大运，在回旅馆的路上有一个地方，地上结了太多的冰，我们走得小心翼翼的。

18. 在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进入房间之前——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知道要这么做——我向哈维做了个不要发出声音的手势，然后我——被雨夹雪淋透了，冷得要命——轻轻地把耳朵贴在我自己的房间，旅馆里我自己的房间，不管怎么说，我的临时房间的门上。我听到了我那位伴侣的说话声音，我那位盲目模仿他人的伴侣在说：“——不过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在那么多的小事情上都要装假，这太累了，好像我不是我自己了……我知道你是对的，我知道我不该让他走，连一小时都不该……现在我担心……不过你说得对……我是想和他待在一起的……他过去常常在厨房的桌子上给我留下几首诗……给我买一些不常见的水果……他有时候说‘我心中的破布和骨头店’这样的话……我把头靠在他的胸脯上睡觉，感到非常幸福……索尔不喜欢搂在一起睡觉……就当他有有点疯狂吧……像大卫那样偷偷地拥抱……所以我在乎的是他对什么人亲近，他认为他是气象学家……这要强过和别的女孩儿睡觉……成为他的世界的中心，哪怕只是局部的，感觉也很不错，因为他对别的人都很刻薄……我认为我们是相爱的……我能感觉得到他正回到我的身边来……我觉得——”

也许她觉出了我在门口……问题来了，她在和谁说话，她在说谁……我是否真的到处讲“破布和骨头店”，讲的次数比我想像得要得多……她讲到诗的时候，说的不是我还会是谁……我只

写过几次诗……谁不喜欢搂在一起睡觉……答案出来得比问题还要快……出现在脑海里的是一张简图，图上有一棵语言之树，树上挂着空盒子，每一个代名词是一个空盒子，当我把不同的名字放入那些盒子里以后，每一个可能的意思就改变了……出现在脑海里的还有普鲁斯特的解说员试图与巴尔贝克旅馆里的一个电梯技师说话，电梯技师没有搭理他，“由于听到我说的话而大吃一惊，专注于他的工作，遵守规则，听力困难，关心他周围的环境，惧怕危险，反应迟钝，听命于经理……”可是我在那里又引入了错误的原文，只是因为我被那貌似瑞玛的女人那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吓住了，不过我还是能够通过我以前列出来的线索，很快地在脑子里提出了假设：

没有名字的狗——她甚至没有提到它，因而，正如我们想到的，它不是绝对重要（因而表现得极其安静），就是绝对不重要。

阿纳托——现在我知道了，他是瑞玛的父亲，不过他是不是也给她买过水果？他是不是也给她留过诗？或者其实她不会时时刻刻地想到他？

瑞玛的丈夫——或者说是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的丈夫。或许是索尔。或许是大卫。或许她是用古代国王的名字来指……谁？或者指什么事情？指的是她以前为皇家气象学会或者为教父们执行的任务？或者，指的只是过去的恋人？

茨韦·戈一臣——她认可我对茨韦的深厚情谊，进一步加强了希望或者渴望她实际上是茨韦的想法，或至少是希望或者渴望她是在扮演茨韦，这甚至可能意味着她就是瑞玛，这可能解释

了茨韦最近又不存在的原因。或者她不知道茨韦的意思。

皇家气象学会和劳拉和巴塔哥尼亚的研究工作——我想我已经记住了这些片段,待明天见面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后再说。

就这些了。偷听得到的令人不快的收获超出了我在茨韦论文的图表里获得的线索。真正的收获是,我总算知道了不是我一个人对形势缺乏了解。她也竭力想要弄清楚当前的形势。显然,她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我宁可认为,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最后知道了所有的事实。但是她不知道。

我推开房门,她仓促地挂上了电话。我看到她的眼里含着泪水,她说,“你们两个人去了那么长时间。”

我发现,我不想问她那狗的事情。我不想问她皇家气象学会或者量子教父或者索尔或者大卫或者诗或者普鲁斯特的事情,什么事情都不想问。我发现,我只想告诉她,我爱她。以前我以为我只能爱我原来的瑞玛,也许我错了。在我的内心里,希望她好好地记住我,希望我能躺在她的身边,也希望看到她挨着我。一时间我深信,她就是这个世界,她就是所有的世界,她就是我的全部的愿望。

不过,我什么都没有说;我知道,我们得同心协力一起工作。

哈维走上前,紧紧抱住那貌似瑞玛的女人。

19. 误 认

穿着那件橘红色的大衣,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不耐烦地站在旅馆房间的门口,等着我刮完胡子,等着哈维记下电视里的新

闻。如果我们是一家人,会怎么样?如果门外有一辆校车在等着,会怎么样?如果我装好了我们的午饭,而她总是催着我们准时动身,会怎么样?或许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家庭。她是一个具有领导魅力却失去了美貌的酒鬼,他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害羞的唯美主义者,我是一个辛勤工作的推销保险的男人。或者她是一个果断的护士,我是一个没有才华的爱与女人调情的音乐人,而他压根儿不存在。或者我是一个气象学家,她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我们和两个被宠坏的孩子定居在俄克拉何马,两个孩子都不善于踢足球,但他们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喂,小伙子们,走吧,”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说,“我们终于要去看看这个神秘的星期一集会了。”

我真是很担心——不知道为什么——担心我们会见不到人。

但是,在中心广场指定的会见地点,有一个女人在那里。她坐在一个闲置的喷泉边上,戴一双紫色的手套,她那发出磷光的金发被一根羊毛束发带拢到了脑后。她正在吃冰棍,冰棍的颜色是酸橙绿。我有没有希腊悲剧里英雄在大团圆那一刻应该有的感觉?完全没有。那女人怎么不是瑞玛呢?为什么不是她替代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她身边有一条狗,一条体型格外大的德国牧羊犬,白色的毛皮又厚又脏。我想起了——经常——那些奇怪的奥地利狗,一次我意识到那些狗只是比我看惯了的狗要大,靠近它们会让你觉得像是在电影的布景里,超大号的道具,特别高的门洞。

那个女人咬了一口冰棍,一大块冰掉到了地上,那超大号的狗贪婪地吃了起来。

我有没有把手伸进大衣的口袋里，好像在摸什么东西——一块面料的样品？一缕头发？一张电影票的票根？一张照片？一片甘草片？一个特别的戒指？一篇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新闻报道？——一个可以向她证明我自己的东西，那东西会证明，我的确是我？是的，我把手伸进了大衣的口袋里，但只摸出一张糖纸，还有一个可以属于任何一个女孩子的发夹。尽管如此，我还是信心十足地向那个女人伸出了手。“我是阿瑟，”我说。

“你不是阿瑟，”她宣布。在我听来，她的声音大到全世界都能听得见。然后她大声笑了起来。“对不起，我是说，你说不定是阿瑟。不过好笑的是，我是在等一个叫阿瑟的人，但不是你这个阿瑟。”

“二十七岁？冰山攀登手？鲍登学院？”

她差不多是斜着眼看我。“你认识他？”她问道，把她的那条大狗招呼到身边。

“你认识他？”我问道，想起了妖术。

“你认识他吗？”那貌似瑞玛的女人——非常冒失地——问那个女人。我相信，她说的那个“他”，指的是我。

这样的局面是不是太令人失望了，而且还有点儿丢脸？是的。

那个女人走开了吗？是的，她走开了。

或许我在期待她会来追我，但她没有。

20. 弄虚作假的本事

正如哈维说过的，茨韦·戈－臣的真实性也许的确是个问

题。这也许说明了希尔达遭遇的失败。这也许说明了缺乏暴风雨。我发给茨韦的信都给反弹回来了；打电话到皇家气象学会，找不到任何一个茨韦，或者任何一个劳拉。仿佛因为缺少外部天气的骚动，我身体内部可怕的周期性偏头痛又来捣乱了。

“咱们回家吧，”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在我耳边小声地说，可那声音在我听来像是如雷贯耳。我躺在床上，没有开灯，夜幕降临，等着偏头疼过去，等着哈维从外面带回消息来，虽然我没有把握他会带回来什么消息。“你会发现在家里是那么开心，”她继续说道。“你又会想要待在家里的。”我内心的感受是，我活在一个黑暗的离奇的童话故事里。

我请她让我一个人待着。但她说，如果我感到不舒服，像我这把年纪不应该身边没有人的。像我这把年纪。她不只一次这么说过。我不过才五十出头，可是她说起我，就像在说一个快要死的人。把旅馆这张不合比例的床做成临终用的床，在一间挂着奔马和冰川画像的虚情假意的房间里，用她的想像力杀死我。“大多数有我这样社会经济状况的人都已年过六十了，”我忍着头疼低声地说。“我会好起来的。茨韦很快就会和我们联系的。”

*

*

*

后来，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哭了，荒谬地指责起了我。

“我当然爱的是原来的瑞玛，”我喃喃地说，试图让她安静下来，把我对瑞玛的感情过分投入给那女人，让我感到有点尴尬。她继续大吐没来由的苦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说话，但是最后我突然说：“不对，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不是我还不想

回家的原因。”

拦不住她那病态的持续言语，她一直在说一些不值得复述的事情。她说，我没有发现她的魅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她和瑞玛混淆在一起。我的头疼稍稍减退了一点，我有气无力地吐出下面的话：“你不懂。如果有人现在，或者过去不忠实，如果有人现在，或者过去与别的人‘见面’——也许与许多别的人见面——那就是她，毋庸置疑就是她，只能是她。有多少次我拿起电话，而电话那一头的人就把电话挂断了？瑞玛很年轻。她太年轻了。她大概以为，她想要个年纪大一点的，可以依靠的，收入稳定的男人，但她后来不想和一个父亲结婚。我几乎可以是她的父亲了。但我从来就称不上是个父亲，而且光是父亲那是不够的。也许她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好，这是可以理解的，连我都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她找了别的人，也许是个更年轻更帅的。这人以后也会让她感到失望的。她会回来的。我不担心。我没有烦恼——”

其实这些话我一句都不信。就算相信的话，也是短时间的，那完全是因为我的神经处在失真的状态下。瑞玛是不喜欢这样的。我只是说说而已。女人，她们总是向着其他女人，所以那貌似瑞玛的女人已经将我置于十恶不赦的位置上，好像我和瑞玛的争端，是我挑起的，好像我以某种方式伤害了瑞玛。我没有。我爱她，我在找到她。不像那貌似瑞玛的女人说的那样，我根本没在找她，我离家出走了。事情的真相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刚好不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那就是，在我们俩的婚姻里，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都绝对与导致我们最近分开的原因没有一点关系。“茨韦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分开的。”我声明。其

实我并不认为他完全知道,但我想求助于我之外的另一种权威。

*

*

*

后来,电话铃响了。不是找我的,是找她的。她没有接。
“是我妈妈的电话,”她说。

“你为什么不同她说话呢?”我问道,一反常态地感觉到了其他人的痛苦。

“和她说话很别扭。我不喜欢那样。”

“可怜的女人,”我责怪道。“你就不能对她好一点儿吗?你知道她的丈夫出了什么事,是不是?”

“她也把那个谎话跟你说了?”那女人叹了口气。“她丈夫扔下了她。就这么回事。她喜欢把它说成是别的什么好像很戏剧性的事情,其实是非常一般的事情。她喜欢把她的痛苦渲染成非同一般的,可这就是一般人的一般痛苦。”

我打开电视,非常轻,不想听她那些刻薄的话。

21. 一出喜剧的诞生

她在我的梦里,我醒了,她不在了,然后我又睡着了,我又醒了,她在那里。她穿一件羊驼毛毛衣,微微露出一副得意的愁容。

“哈维呢?”我问道。

“他被叫回家里去了。”

在混乱中,她从随身携带的那个瑞玛的淡蓝色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那是一张很薄的传真机用的纸。我打开

那张纸,它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我相信那是黑麦饼干的碎渣子。她要我看的是从传真机上发过来的发表在一九九六年九月的《大气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正如《大气科学杂志》的大多数读者所知,茨韦·戈-臣博士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突然去世以前,担任了两年的杂志副主编。他同时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起到促进作用的大气科学家,而且是一位热心的充满爱心的人。作为他的亲密朋友和同事,我同意接替他的位置,在《大气科学杂志》工作了一年。我还接受了为在他出生的这个月出版发行的杂志特刊收集和编辑论文的工作。

茨韦渴望成为多种学科的科学家。他具有广泛的兴趣,涉猎了大尺度环流,中尺度工作,边界层,以及气候动力学领域的活动,着重于遥感监测分析技术。正如大多数科学家所知,“多种学科”是一个最受欢迎的词汇,是行政管理人员和新闻记者孜孜以求的词汇,但这个词汇经常受到学术界的质疑。茨韦以粗俗的方式评论这个词汇,“一个多种学科的科学家最好是至少两个学科的专家,否则他就是个江湖骗子。”

对像《大气科学杂志》这种档案性质的特刊,我并不是很热衷。有时候这些论文是不成熟的,时日已久,旧事重提,或者以在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为基础。我同意编辑这一期特刊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特刊里的论文会在任何条件下完全被《大气科学杂志》接受,而且论文涉及的科目要像茨韦的兴趣一样广泛。结果证明这是一期内容丰富的特刊。其中包括了茨韦作为博士生的导师与人合著的一篇论

文；两篇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写的论文；另外发表了一篇由一个从前与茨韦关系密切的同事写的论文，该论文是以茨韦的研究工作为基础的；三篇有关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的论文，包括了行星科学方面比较重要的研究，这个领域让人想到了茨韦早年在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管理局的工作；一篇有关数据同化系统的论文；一片有关“热带海洋全球大气耦合响应试验”的论文，这是茨韦参与的最后一个观测工程；还有一篇有关边界层的论文。我觉得这些论文茨韦都会喜欢的。我必须承认，在有些时候，为了赶上发行的截止时间，评论文章和作者的修改稍微有一点仓促。然而，我希望并且相信，这一期特刊是符合《大气科学杂志》的高水准的，虽然琐碎，却是茨韦的纪念碑。

道格拉斯·李利

俄克拉何马大学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期待地坐在床沿边上，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不经意间摆出了一副祷告者的姿势，等着我读完那篇文章。我发现自己读了好几遍。是的，在抬起头之前，我已经读了好几遍，所以完全理解了。当我的眼睛碰到那黄头发女人的眼睛时，她把头歪到一边，就像一只小狗。然后是一阵耐人寻味的沉默，一种不太妙的被抑制住的正面对抗，为了谁先开口说话，我还是她。我也把头一歪，不过和那女人头歪的方向相反，就像在看镜子。歪着头继续沉默着，不过我要讲清楚，我们保持的沉默不是谦恭的沉默，不是面对一个最大的谜团的沉默。那女人送给我的这个“谜团”是非常小的。她想要说的，就是茨韦·戈一臣已经死了，我居然和他通过信，所以我们应该认为这是一件奇

怪的事情。起码,我认为这是她想要说的话。可是对我来说,也许这件事已经变成了许多谜团中最小的一个谜团,它就像一扇通向其他可能性的门,只是我坚持走到底的一条通道。这件事已经不算什么了。

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把头歪向另一边,然后用过分温柔的语气问我,“你和他通过信的这个叫茨韦·戈-臣的人”——她要知道,他或许对《大气科学杂志》这一期纪念特刊有什么想法。

我指出了如此假设所存在的问题。

那女人又向我提出了刚才那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叫茨韦·戈-臣的人”会想什么?

我答道,我认为提出这样一个“这个叫茨韦·戈-臣的人”的问题,是相当粗鲁无礼的。我后悔用了她用的带有贬义的那个专门的名词。

问这样的问题是粗鲁无礼的,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她要知道。

我说,我经常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人们死后,与他们交谈有关他们死亡的话题,那会是很别扭的。或许不会有太多的话要说。

她说,我说的话没有道理。

你是说,在你看来,我说的话没有道理,我澄清。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她说,站起来,走到我跟前,对着我的脸说。她的身体离得那么近,我能感觉得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她继续说道,“无论谁都会认为你说的话没有道理,起码我认识的人都会这么认为的。”我相信,她染上了我说话爱用定语的习惯。“连哈维都这么认为。只有你认

为有道理，”她继续。“如果在什么事情上，你和大家的感觉都不一样，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没想到过这种古怪的问题，”我说。“我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22. 结局和将来会做的事情

在关于恢复理论的那篇论文的结尾，茨韦写道：“这些差错是那些实际呈现在多普勒雷达数据里的合理模拟吗？有没有什么办法从产生出结果的领域找回有用的信息？”其实在我决定是否和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一起回到我和瑞玛共同生活的那个家时，我就想到这些问题了。

就说我同意回去，她同意和我一起回去吧。我们到家了。在我的想像里，房子里会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她会打开窗户，冷风会争先恐后地涌进来，窗帘会随风翻卷。那条皮包骨似的狗会蜷缩在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的大腿上取暖。茶几上会有一张摊开着的旧报纸，好像还挺重要似的，有些地方用红笔圈了出来。床没有铺好。洗碗池里会有四把用过的汤匙和一个玻璃杯。不知道该怎么表现，我会提出去泡茶。当我把烧水壶灌满水放到炉子上以后，煤气炉会发出好听的喀嚓喀嚓开煤气的声音。我不想喝茶，她会说。所以如果你在替我泡茶，就别费心了，她会加上一句。我便问她是否想喝咖啡。她会说不想。那么热牛奶呢？你想去租一部电影来看吗？出去散散步？吃块巧克力？盖上被子躺下？她会怎么也哄不好，我会发现自己很奇怪地对她奉上及时的安慰。

在提了几十个建议之后,她终于会承认,“有时候你的脾气不是那么坏。”

我们会出去吃晚饭,我和瑞玛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晚饭会吃得还不错。黄油会异乎寻常得好,但是我们俩都不会说太多的话。为了省一点钱,我会要一个汉堡包,然后会后悔。她会要一份羊肉,然后剩下一大半。我会提到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新闻——年轻的土耳其人投票表决的方式,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木乃伊——不管我说的是什麼,她都会说她也在报纸上看到了,但是我们没有谈论我们在报纸上都读到过的那些事情。当我们决定回家时,离我们最近的地铁站就关门了;我们会走过十条街,来到一个没有关闭的车站,然后走下去等火车。她会说,她不相信还会有火车。我会向她保证,她说对了,火车不会来了,车站大门也会关上的,我们会被锁在车站里。她会说,她太累了,后悔说出到外面去吃饭的想法。然后火车来了,车上会有很多空着的座位,她会把头靠在我的肩上。在黑暗的地铁车厢的玻璃窗上,我会看到她靠在我的身上昏昏欲睡。她会说,我们应该吃比萨饼的。虽然我们家附近没有一家像样的比萨饼店。

第二天早晨,我会闻到浴室里飘出来瑞玛的洗发香波的干草香味。我会走进充满热气的浴室。那狗会走在我前面,趴在浴室的脚垫上等她。不会说早安,也不会因为我出现在浴室里而道歉,我会在洗脸池里洗脸。后来我会发现她穿着我的袜子。

也许我们最终会有第二条狗,那狗爱我甚过爱她。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开始纳闷,我与那貌似瑞玛的女人的合作会走多远,或者可以走多远,或者应该走多远,或者不该走

多远。大概我们最终会发现我们假装好像她是原来的瑞玛,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大概我们是故意那么做的。联手纠正了一个解释不清的错误的行为。看起来很正常。同睡在一张宽大的床上。轮流负责洗衣服,遛狗(或者遛两条狗),停车。煮小扁豆吃,看老电影,在回收筒里翻找报纸。也许我们会在一起玩填字游戏,她会玩得比我好一点。如果一天晚上她因为做了什么噩梦,惊吓而醒,我会搂住她,爱抚她,直到她再次睡着,这将是我的责任。虽然我被吵醒了,但我会自己来解决;我会下床去泡个热水澡;我会用她的肥皂,那肥皂里嵌着微小的磨砂粒子,我还会用她的磨脚石来磨我的脚;如果依然毫无睡意,我会把掌上电脑带到床上,可以看看网上的新闻——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爆发了战争——电脑发出的微光会把她吵醒,她会为此对我大发脾气;于是,第二天我就要收拾残局,我会买了新鲜的水果带回家,然后我们就和好了。

这样的事情会不断地重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我会意识到,我的这种生活是对我与瑞玛的生活的纪念,一个小小的但适当的纪念。

*

*

*

一天晚上,我用钥匙开门,发现门没有锁。没有人会来迎接我。我会听见一种莫名其妙的,但略微有点耳熟的,有规律地紊乱的,轻微的砰砰声。朝发出声音的地方走过去,我会发现厨房的天花板上蒙着一层煤灰;奇怪的是,这个情景不会让我想起任何别的事情。我满脑子想的就是那个布满煤灰的天花板,但我的心率会加快,我的双手会发冷,砰砰的声音会继续下去,直到

我最终意识到那声音来自炉子上的烧水壶,水壶里的水已经烧干了。我便大声叫她,没人答应。我会关掉火,想把水壶移到水池子里去,可是就连水壶上的橡胶把手都被烧得烫手。我又会大声叫她。我会在小小的公寓里四处寻找。她喝茶喝得非常慢,有时候用手指蘸一蘸茶水,然后把手指放进嘴里——我会想到这一幕。

然后,我会听到房门被打开的声音。然后,我会看到她。毫发无损,兴冲冲的,她的手提包里装着那只黄褐色的小狗崽;她会从牛皮纸口袋里拿出几块椰枣饼干,递给我;她会告诉我,她出去散步,忘了放在炉子上的烧水壶;她会去厨房查看,用手指在煤灰上划出道子;她会吧把煤灰涂在我的脸上和鼻子上;她会说,明天再收拾,今天就不弄了。我非常高兴地想着喝杯茶,吃几块椰枣饼干,看看报纸,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她会用平底锅烧水。我会领悟到,就在见到她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了她,虽然我们之间没有历史沿革。我会把这个想法告诉她。事情大致如此吧。

*

*

*

是的,我会觉得我和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一起过的日子是真实的。有一个早上,我会先起床,烧上一壶水,水壶里冒出来的热气闻起来有一股白垩的味道,那小狗崽,哦,那狗——我会知道那家伙的名字的——会在厨房里亦步亦趋地跟着我,我会亲切地与那家伙说话,当我从那两只狗眼睛上抬起头时,她会出现在我的面前,站在厨房的屋顶下,穿一条绿色的短睡裤和一件我的内衣,她的头发会是乱蓬蓬的,她会揉着眼睛,害羞地笑着。

有一天，在地铁里，她会剥一个金钱橘，递给我几片。当我们换车时，她会让我看嵌在她指甲缝里的什么东西，这会让我分心，然后我会发现我和茨韦·戈－臣撞了个满怀。

我们俩都会叽里咕噜地互相道歉。

茨韦会穿一条花格呢的裤子。他会抱着一个安静的婴儿。他会和我们打招呼——认出，不可思议，整个局面——非常谨慎地。

那时，我就会想起一些已经忘却的事情。

我会再次开始留神。的确看到了。她的行为里有小小的差错。

我会注意到冰激凌盒子里留下的是叉子的痕迹，不是汤匙的痕迹。我会认为那也许是个我已经忘掉的客人。而她会舒舒服服地穿着高跟鞋走路；她会很快地喝完她的茶；几个星期过去了，在那段时间里，她竟然没有跟我生气；我会和她的同事见见面，那些人好像并没有爱上她。我们会去看电影，在电影结束以前，她会毫无愧色地不做任何解释地对我说，她想要走了。过后，我会在她的牛仔裤口袋里找到电影票的票根，那票根会是平展的，完整的，几乎没有触摸过。当然，我对这样的迹象会视而不见的。可是，当那只装满了瑞玛衬衫的箱子终于从阿根廷找回来的时候，她根本不会激动的。有一个晚上，我回家比平时晚了两个小时，我发现她没有着急，她在吃蓝莓酸奶。我会开始注意到，她经常坦然地凝视着那黄褐色小狗崽的眼睛，仿佛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动物都不能真正地理解她。一天，她甚至会不再染发了。她会把头发剪短。我会想方设法地欺骗自己。尽管这一切会是很痛苦的——会像是又失去了她——但那时候，我起

码会知道,我必须找到她,我真正爱的只能是原来的瑞玛。我不会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或者对别的人意味着什么,或者对皇家气象学会意味着什么,或者对教父们意味着什么,或者对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大概我不会介意的。虽然有那么多不知道,我的脑海里依然呈现出了茨韦的影像,在地铁里,抱着那孩子,身上穿的衣服让他看上去有点像是个外国人,像个爵士乐迷,或者像另一个时期的一场意外事故,一次移植——起码我会知道,我下半辈子生活的目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天扰

作者=（加拿大）戈臣著

页数= 2 3 2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 0 1 0 . 0 1

S S 号= 1 2 4 1 5 3 9 8

D X 号= 0 0 0 0 0 6 8 2 4 7 1 6

u r l = h t t p : / / b o o k 2 . d u x i u . c o m / b o o k

D e t a i l . j s p ? d x N u m b e r = 0 0 0 0 0 6 8 2 4 7 1

6 & d = 6 7 B 4 0 E E 6 E F 9 A 7 D 6 5 4 C D C 5 3 B 6 9 2 A

2 5 2 F 7 & f e n l e i = 0 9 0 8 & s w = % C C % E C % C 8 %

C 5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